The Invisible Committee

L'insurrection qui vient

L'insurrection

革命將至

資本主義崩壞宣言
&推翻手册

隱形委員會

9 789868 711228 00290

革命將至：
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

作者	隱形委員會
譯者	隱形委員會：台灣分部
執行、企畫、行銷發行	隱形委員會：台灣分部
封面設計	王志弘
內文版型設計	黃瑪琍
排版	宸遠彩藝
印刷	崎威彩藝
定價	290元
ISBN	978-986-87112-2-8
出版日期	2011年7月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	行人文化實驗室
發行人	廖美立
總編輯	周易正
地址	10049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0號10樓
電話	886-2-2395-8665
傳真	886-2-2395-8579
郵政劃撥	50137426
網址	http://flaneur.tw
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886-2-8990-2588

Copyright ©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07
Copyright licensed by La Fabrique- Éditions
Arranged with Dakai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Flaneu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ming of "*The Coming of Insurrection*": Notes on a Politics of Neocommunism' is licensed by Andy Merrifield, arranged through Pion Limited, www.envplan.com.
〈將至的《革命將至》：新共產主義政治評註〉由Andy Merrifield授權同意行人文化實驗室翻譯使用，並感謝Pion Limited之協助。www.envplan.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隱形委員會 著；
隱形委員會：台灣分部 譯.—初版.—臺北市：行人：2011.07
200面；14.8 x 21公分
譯自：L'insurrection qui vient
ISBN 978-986-87112-2-8（平裝）
1. 資本主義
541.96 100010818

革命將至

資本主義崩壞宣言

& 推翻手冊

隱形委員會

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

u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visible

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comité invisible

L'insurrection qui vient

comité invisible

目錄

9 導論　無論從哪個角度……

我們已陷入絕境，未來不再有未來。在各地發生的暴動，無關種族、階級或城鄉，而是對現實的全面反對。所有用「社會」來思考、定義的社會問題都註定無法解決。國家只能動用警察，人民只能更為激烈。

第一部　我們所身陷的世界

19 第一圈　I AM WHAT I AM

I AM WHAT I AM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統治口號。我越想做我自己，越感覺空虛。我越想談我自己，越無話可說。我越追求自我，越疲累不堪。於是我像殘障，用部落格、財產、名聲、八卦作為我的義肢，永遠處與半毀損與半衰弱的狀態。

27 第二圈　異鄉人

我們都是流亡者。「社會」已經是詐騙才會用的辭彙：學校只是為了教育國家的主體，家庭是讓人退化的幻影，親密關係還不如色情工業。如今，「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的正確意義是：學會如何在街頭開戰、如何占領空屋、如何瘋狂相愛、如何搶劫商店。

37 第三圈　工作是唯一的秩序

今天，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生產以滿足需求，還不如說是為了生產生產者和消費者。工作本身並不恐怖，恐怖的是它有效地在幾個世紀之內消滅了工作之外的一切，工作的秩序就是唯一的世界秩序。於是我們參與自我剝削，讓自己「好用」，連打炮都在強調生產力。

CONTENTS

49

第四圈　不斷延伸的都會邊緣

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我們擁有的是大都會。混雜著輕快的曲調、伸縮警棍和棉花糖，權力的監控完美地融入了商品的景觀。貧民區是唯一還有活力、讓人還能活下去的地方，失業群眾讓這些廢棄的空屋再度活過來，用郊區的黑話和火焰，綻放出比拉丁區更耀眼的光芒。

63

第五圈　經濟改革方案的碎裂聲

我們終於懂得這個道理：經濟並沒有陷入危機，經濟本身就是危機；就業機會並沒有萎縮，而是工作量太大；令人喘不過氣的，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經濟成長。我們都是經濟的產物，一代又一代地被馴服、被改造成自動生產又樂於消費的主體。經濟是一種政治。

75

第六圈　環境問題是二十一世紀經濟的王道

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是建立在管理上。他們說：如果我們還想挽救美好的文明生活。唯有減少消費，才能繼續消費。這就是當今世界的邏輯，滿口保證要和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其實只是延續了過去的歷史。

89

第七圈　我們揹著的這具屍體

我們面對的不是社會危機，而是文明滅亡；我們身上揹著一具屍體，但無法就這樣擺脫它。文明是否已死，那是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決定。決定是種政治行動。讓我們決定文明已死，連同它的死法也包括在內：只有決定，才能將我們背上的屍體卸下。

第二部　為新世界而戰

上路吧！ 105

六十年來的生活，已經將我們麻痺，削弱我們對現實的決斷力。不需期待、憤怒，我們處於文明崩塌當中，現在必須拿定主意了。

聚首 109

在我們身邊發生、經歷的才是真理，而對真理的堅持終能讓我們找到朋友。當人們聚首、相處融洽並決定一起結伴而行，這個過程就是公社。當某些人擺脫個人束縛，開始一切只靠他們自己、開始衡量他們在現實中的實力時，公社就慢慢成形。

組織起來 117

公社，會改變工作與生活的關係，會盡可能為每個人釋放最多的自由時間。不是不需要工作，而是不需要為生活而工作。自由時間讓我們去學習，一切關於社會生活的直覺。然後以生活實踐開始建立國家看不到的地域，並且建立起統治者看不到的身分。

揭竿而起 133

不存在和平的起義。武力是必要的。真正的示威抗爭必須是「野蠻的」，無需向警察局報備，能夠選擇戰場，讓我們能夠繞過禁區並避免直接衝突。我們還能決定路線，牽著警察（包含工團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鼻子走，而不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CONTENTS

目錄

後記　火焰燃燒的街頭…… 151

廣播電台不斷地向反抗者報告政府武力的撤退狀況，一枚火箭破開了克萊沃監獄的圍牆。已經無法確切地說「事件」開始之後，究竟過去了幾個月還是幾年。首相呼籲冷靜，看來卻無比孤單。

再版後記　定調 153

這場戰爭也是語言的戰爭。如果人們花了如此大的力氣，以恐怖主義的理由，將幾個年輕共產主義農夫關起來，只因為認定他們參與《革命將至》的編輯與撰寫，這不是為了「思想罪」的罪名，而是因為他們正代表一種行動與思想都體現在生存裡的作風，或更確切地說，他們將字詞、行為與生活堅固地連結。

附錄　將至的《革命將至》：新共產主義政治評註——安迪．瑪利菲爾德　撰 169

馬克思理論家安迪．瑪利菲爾德為這本重要書籍作了詳盡的註解：「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某個地方扎根，試圖主張它自己，從悲傷的大地中破土而出，向上伸展，脫離肥料的餘燼，從舊世界的分崩離析中冒出頭來，綻放、重生。這就是未來社群的理論，一份革命宣言，一個預告資本主義滅亡的歷史記錄。」

Introduction

我們已陷入絕境，未來不再有未來。
在各地發生的暴動，
無關種族、階級或城鄉，
而是對現實的全面反對。
所有用「社會」來思考、定義的社會問題都註定無法解決。
國家只能動用警察，人民只能更為激烈。

導論

無論從哪個角度……

Sous quelque angle...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現狀已陷入絕境。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在那些滿懷希望的人們面前，現狀抽空了希望的支撐。那些滿口聲稱掌握了解決辦法的人，一下子就被證明滿口胡言。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狀況只會越來越糟。「未來不再有未來」是這個時代的至理名言，在全然正常的表面下，它達到了當年龐克精神[1]的高度。

代議政治形成了一個封閉的階層。從左派到右派，無論看似能幹的老手或貞潔的處女，同樣出自廉價的偽裝，他們站在同樣的商品陳列架上、彼此交換著從情報中心得來的最新消息。那些依舊去投票的人，似乎只是為了用反對票把投票箱塞爆而已。人們不免懷疑，正是為了反對投票本身，大家才繼續投票。任何既有的辦法都無法解決這種情況。人民即使處在一片沉默當中，比起搶著要統治人民的那群小丑來說，也顯得無比地成熟。巴黎美麗城[2]區的隨便一位老北非移民說出來的話，也比那些所謂的官僚發言來得更有智慧。社會壓力鍋的鍋蓋被牢牢地蓋上了，然而鍋內的壓力正在不斷升高。人民對阿根廷政黨的那一聲吶喊「全部都該下台！」[3]，現在變成幽靈，揮之不去地糾纏著政客的腦袋。

1 編註：龐克文化具有顛覆性的無政府主義精神。

2 編註：美麗城（Belleville）為巴黎聚集多種族移民的貧民區。

3 編註：二〇〇一年底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總統因民眾抗議被迫下台。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縱火事件[4]在所有人的心裡投下一道不斷延伸的陰影。這幾把揭開節慶序幕的火焰，是對於過去這信口開河的十年進行的一次清洗。媒體編造了一則「郊區對抗共和國[5]」的童話故事，儘管很動聽，卻並不真實。被縱火的建築一直擴散到市中心，只是消息被有效地封鎖了。在連鎖效應下，巴塞隆納也被燒掉了幾條街，然而除了當地居民外，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甚至在那之後，法國也沒有停止發生火災。我們可以在嫌犯裡找到形形色色的面孔，他們的共通點不在於階級、種族或區域，而是對現實社會的恨。整件事的新奇之處並非「郊區暴動」——這早在一九八〇年就已經不是新聞了[6]——而是它和以往的暴動形態之間產生了決裂：暴動者不再聽從任何人，無論是長輩還是有能力讓一切回歸正常的地方組織。任何反種族歧視團體都無法在這起事件裡發揮作用，只因為媒體的不耐煩、造假和選擇性的不報導，才假裝這件事有個了結。這一連串的夜間突襲、匿名攻擊、直接的破壞行動中，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它將政治和政治性之間的裂口拉開到最大限度。任何人都無法輕易否定這場攻擊的嚴重性，它除了恐嚇之外，沒有任何訴求、任何主張；它完全衝著政治而來。除非是瞎了

4 編註：二〇〇五年兩名巴黎青少年因故觸電而亡，消息傳出後引發十一月一連串縱火事件。

5 編註：係指法國政府。

6 譯註：法國自一九七〇年代起便不斷有和警方產生衝突的事件，以一九八〇年在維勒班（Villeurbaine）發生的暴動規模最大。

眼，才看不到在這種對政治的全盤拒絕裡面，有著一切最政治性的東西，也才會無視於三十年來的青年獨立運動。人們像失落的孩童一樣，把裝飾社會的擺設燒個精光，而且這個社會心裡清楚得很，它與巴黎公社末期的巴黎古蹟已經沒有什麼兩樣。[7]

沒有任何社會方案足以對付當前的情況。首先，這個由階層、機構和泡沫般的個人組成的空泛集合體，這個我們用反話稱之為「社會」的東西，是非常脆弱的；其次，我們失去了傳達共同經驗的語言。一旦我們沒有可以彼此分享的語言，我們就沒有可以彼此分享的財富。啟蒙運動的抗爭歷經了半個世紀，法國大革命才可能發生，勞工運動接著抗爭了一個世紀，才孕育出強勢的「福利國家」。抗爭創造出新秩序所需要的語言。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歐洲成為一塊沒錢的大陸，它偷偷地在利多連鎖超市[8]裡買東西，為了還能繼續出國旅遊而參加廉價旅遊團。以社會語言所提出的任何「問題」都沒有解決辦法。「退休」問題、「經濟不穩定」問題、「青少年」問題和他們的「暴力」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懸而未決，人們只曉得動用警力防止社會問題演變成抗爭行動，以免這些行動最終釀成不可收拾的問題。草率處理

7 編註：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巴黎公社下令放火燒毀巴黎。隨後政府軍展開報復，屠殺約數十萬人。

8 編註：為德國平價連鎖超級市場。

獨居老人的方式令人不敢恭維，然而老人自己卻沒有發言權。有些人發現，比起維持表面的和諧，採取犯罪的手段不會比較可恥，並且更為有效，於是他們再也不肯繳械投降，更何況監獄也不再用熱愛社會那一套為犯人洗腦了。退休員工是充滿憤怒的一群，他們對於刪減退休金不再逆來順受，看到有一大部分的年輕人拒絕工作則更是氣得要命。最後，當類似暴動的情況一旦發生，任何補助津貼的發放都將無助於推動新的政策、新的條約、新的和平。因為社會的情感早已變得非常稀薄了。

說到解決辦法，不許任何狀況發生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警察對國土的分區監控，只會越來越嚴重。警方已經出面證實，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他們在塞納－聖德尼省(Seine-Saint-Denis)上空出動了一架負責監控的無人駕駛飛機，這比所有人道主義的煙霧彈都更令我們看清未來。警方還特別強調這架飛機沒有配備武器，這反倒暴露出我們踏上了什麼樣的不歸路。國土將

以現代社會的語言所提出的任何問題，都註定無法解決。

被切割成越來越密不透風的區塊。座落在「敏感城區」邊緣的高速公路便是一道隱形的圍牆，恰好把它和高級別墅區分隔開來。不管天真的共和國主義者們怎麼想，「以社群為單位」的城區治理方式是公認最有效的辦法。在這場越來越詭譎、越來越失真、越來越眩目的解構當中，這塊土地上的繁華大都會和主要市中心繼續過著它們的浮華生活。它們用七彩光芒照耀整個星球，與此同時，犯罪防治大隊和私人保全公司的巡邏隊伍——簡而言之就是民兵——在越來越粗暴的法令掩護之下無盡地繁衍。

這條現狀的死胡同到處都遇得到，只是沒有人承認。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文人被攪和在一塊，他們各有自己的一套專業說詞，也很專業地無法達成任何結論。只要聽聽這個時代的歌曲、小資產階級細訴心情的「新香頌」小品，再聽聽饒舌樂團mafia K'1 Fry[9]的宣戰歌曲，就知道和平共存已經接近尾聲，決定性的時刻即將來臨。

這本書由一個想像的群體共同署名。它的編輯群並非作者群。這群人只是想把這個時代的陳腔濫調、那些圍著酒吧桌子或在臥房門內的竊竊私語整理一番。他們所做的，只是要凝視絕對的真相；普遍的壓抑情緒，充斥在

9 譯註：創立於一九九五年的饒舌樂團，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

精神病院和絕望的眼神裡。他們把自己當作抄寫現況的工人。危急時刻所享有的特權，就是公理正義會合乎邏輯地趁機將一切推向革命。我們只需要說出眼前所看到的，而不是去逃避任何結果。

Premier partie

第一部

我們所身陷的世界

Premier cercle

第一圈 I AM WHAT I AM

I AM WHAT I AM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統治口號。

我越想做我自己，越感覺空虛。

我越想談我自己，越無話可說。

我越追求自我，越疲累不堪。

於是我像殘障，用部落格、財產、名聲、八卦作為我的義肢，

永遠處與半毀損與半衰弱的狀態。

「I AM WHAT I AM.」這是行銷為這個世界舉行的最後獻祭，廣告進化的終極階段，遠遠領先所有叫你要與眾不同、要做自己、要喝百事可樂的激勵話語。這些概念歷經數十年的變化，只是為了完成純粹的同語反覆。我＝我。他對著健身俱樂部的鏡子，奔跑在跑步機上。她開著她的Smart小汽車下班回家。這樣的兩個人能彼此相遇嗎？

「我就是我。」我的身體屬於我。我是我，而你是你，但是一切越來越不對勁了。大眾被擬人化。生命、工作、不幸的遭遇，乃至於所有狀態都被個體化。精神分裂四處蔓延。憂鬱症節節逼近。原子化將人化成罹患妄想症的細碎微粒。接觸人群令人歇斯底里。我越想做我自己，越感覺空虛。我越想談我自己，越無話可說。我越追求自我，越疲累不堪。我和你，我們看守著我們的自我，就像看守著無聊的櫃台。我們從事著一樁怪異的買賣，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推銷員，變成了擬人化的代言人——雖然這更接近把人肢解的過程。我們或多或少假裝是毫不勉強地在擔保自己，直到破產為止。

與此同時，我管理。追求自我、我的部落格、我的房子、最新流行的廢話、閨房祕辛和狗屁八卦等等，管理這一切用來支撐起我的義肢！如果說，

「社會」還沒有變成一個完全抽象的東西，它大概也只是別人供應我撐起存在的骨架，讓我起碼還有個樣子，儘管這個樣子只是把我拼裝起來的零件總和，用來交換我的身分認同。如今，殘障是公民身分的典型。曾經剝削殘障的機構組織，現在卻為殘障爭取「生存津貼」[1]，這一切是有跡可循的。

「當個有頭有臉的人物」，這道命令無所不在，讓人覺得自慚形穢、覺得需要這個社會。命令人要更堅強，是為了製造這道命令繼續被服從所需的軟弱，軟弱到一切似乎都有某方面需要被治療，不管是工作，還是愛情。每天人們問候彼此「還好嗎？」互相取暖，感覺卻像是一群病人在管理對方。今天的社會交往是由成千上萬的保溫箱、密密麻麻的避難所組成的，似乎待在裡面總比在外頭吹冷風好。然而，裡面的一切都是假的，因為取暖只不過是藉口。待在裡面不會有任何好轉，因為我們被暗中安排好只能靠在一起發抖。只有讓每顆社會原子保持恢復健康的幻覺，這個社會才能維持下去。這個社會是一座水力發電廠，在眼眶打轉的淚水就是它取之不盡的泉源。

1 譯註：主張廢除各式補助，綜合各式政府補助的社會福利。

> 我們感到不安，
>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盲目信仰一個永恆的我。

「I AM WHAT I AM.」沒有任何統治者發明過比這句話更無可挑剔的口號。當前的秩序和規範嚴守著一個祕密，就是把個人的自我維持在一種永遠有一半損毀、另一半慢性衰竭的狀態。耗弱的我、抑鬱的我、自我批評的我、虛擬的我，這個我其實是不斷在適應的主體，被一種建立在革新、科技加速淘汰、社會秩序陷入混亂、順從被普遍化的生產模式所需求。這個我是最貪婪的消費者，但是弔詭的，這個我也最具有生產力，以最旺盛的精力和慾望撲向最沒有計畫的未來，使得這個我逐漸退化到剛出生的幼兒期。

那麼，「我是誰」呢？一條漂浮著牛奶、氣味、故事、聲音、愛、兒歌、物體、姿態、觀念、印象、眼神、歌曲和食物的河流，從童年開始穿越了我。我是誰呢？無論如何，我和許多地方、許多苦難、許多祖先、許多朋友、許多愛情、許多事件、許多語言、許多回憶擺脫不了關係，可是很明顯的，這許許多多的東西並不是我。所有使我依存於這個世界的連繫、

所有組成我的關係、所有充滿我的力量，這些東西交織而成的並不是認同——就像人們迫使我出示的身分一般——而是存在，獨特的、共享的、活生生的存在，這個在不同場所不同時刻現身，開口說「我」的存在。我們感到不安，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盲目信仰著一個永恆的我，對於塑造我們的一切反而不太在意。

於是，我們頭暈目眩地看到上海的一棟摩天大樓高高掛起Reebok的那句話：「I AM WHAT I AM」。西方世界向四面八方進攻，化身為它最疼愛的那匹特洛伊木馬，在我和世界之間、個體和群體之間、束縛和自由之間製造要命的矛盾。自由並不是擺脫一切束縛的姿態，而是面對束縛、展開行動的實踐能力，能夠在各種關係中游刃有餘，將它們重組或是打理一番。只有當人們放棄改變家庭那令人洩氣的運作方式、或是根本不知道怎麼辦時，家庭才會顯得如此像個家庭，換句話說，如此像個地獄。把自己連根拔除的自由一直都是自由的幽靈。當我們甩開了阻擋我們的人，我們同時也失去了對他施加影響力的機會。

所以說，「I AM WHAT I AM」不單只是一個謊言、一種廣告戰術，更是

一場軍事戰爭、一聲作戰口號，攻向所有存在於人們之間的東西，所有不分你我的行動，所有我們之間隱密的連結，所有荒涼的戰地上僅有的障礙物，所有我們賴以存在的事物，所有世界上還未被高速公路、遊樂園或新市鎮完全覆蓋的地帶：這場戰爭讓世界只剩下純粹的無聊，沒有激情、百依百順地成為一個荒蕪、冰冷的空間，只剩下被精密控管的身體，讓如分子般排列組合的汽車、美好的商品在其上快速通過。

法國是對抗憂鬱症的天堂，舒解心理鬱悶的樂園，精神病的聖城麥加，但也是全歐洲平均每小時生產力的冠軍。疾病、勞累、抑鬱都可以被視為必須根治的個人症狀，它們讓現行制度得以維繫，讓我對愚蠢的規範逆來順受，讓我的義肢獲得改良。它們代替我選擇什麼是適當、合群、有益的癖好，什麼又是最好乖乖丟掉的東西。「你知道，總得做些改變。」可是，我個人的身心問題既可以被當作事實看待，也可以將「我」這個假設徹底瓦解。就這樣，個人問題一下子變成抵抗眼前這場戰爭的行動依據。它變成造反的能量核心，對抗所有讓我們殘廢、把我們規格化的陰謀。「我」並不是

我們遭受的危機，而是我們尋求自我表達的形式。人們總是要把我們切分成許多個有限的、分裂的、可以被分類和量化統計的我，簡而言之，就是可以被控制的我；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是創造物，都在我們的相似處裡混雜著獨特性，我們都以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共同組成這個世界的樣貌。和我們從小被灌輸的說法相反，聰明才智不應該被用在適應社會上，否則這種聰明，也只是奴隸的聰明。只有在想要馴服我們的人看來，我們的不適應才成為問題。其實，不適應為我們指引了一個開端，一個新共犯結構的交會點。它讓我們看到一片殘破的景象，雖然看起來和這個社會精心捏造的幻覺如此不同，但卻更貼近我們可以互相分享的共同經驗。

我們並不消沉，我們只是在罷工。對於拒絕振作的人來說，「消沉」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過渡，是跟現狀說再見，是邁開偏行的步伐以閃避政治的收編。從那開始，就再也不需要妥協——只有醫療體系和警察才需

聰明才智不應該被用在適應社會上，否則這種聰明，也只是奴隸的聰明。

要表面的和解。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毫不猶豫地餵過動兒吃利他能[2]，從各方面強化我們對藥物的依賴，甚至計畫從三歲起即早治療「行為偏差」的問題。這全都是因為，「我」的假設已經布滿了裂痕。

2 譯註：利他能（Ritalin）原為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

Deuxième cercle

第二圈 異鄉人

我們都是流亡者。

「社會」已經是詐騙才會用的辭彙：

學校只是為了教育國家的主體，

家庭是讓人退化的幻影，親密關係還不如色情工業。

如今，「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的正確意義是：

學會如何在街頭開戰、如何占領空屋、如何瘋狂相愛、如何搶劫商店。

一個宣布進入警戒狀態，以對抗十五歲青少年的政府。一個把足球隊員當神明膜拜的國家。一位躺在醫院病床上、抱怨自己成了「暴力事件」受害者的警察。一個達成禁止民眾自行建造樹屋決議的市政府。在謝勒市（Chelles），兩個十歲的孩子因兒童遊樂中心的縱火案而被控告。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充滿了怎麼想也想不到的各種怪誕的情況。可是，媒體卻只會營造一種義不容辭的憤怒情緒，故意把這些本來很好笑的新聞處理得讓人笑不出來。

對於所有新聞最愛引爆的嚴重「問題」，我們都可以用笑得東倒西歪來回應。從法國最老掉牙的移民問題開始：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移民問題」。誰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成長？誰住在自己成長的地方？誰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誰還在自己的祖先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生活？這個時代的孩子是誰的小孩，是電視的還是他們父母的？真相是，我們全都是被連根拔除的一群，我們全都無家可歸，並且伴隨而來的是前所未見的觀光旅遊熱，和無法甩脫的痛苦。我們的歷史就是殖民史、移民史、戰爭史、流亡史，是一切生根立足的基礎皆被毀壞的歷史。在這部歷史裡，我們變成這個世界的異鄉人、

我們自己家庭裡的訪客。教育剝奪了我們的語言，綜藝節目剝奪了我們的歌，色情工業剝奪了我們的肉體，警察剝奪了我們的城市，薪資剝奪了我們的朋友。這還不夠，在法國，國家權力長期進行著兇猛的個體化工程，從最年輕的時候就將人們予以評比、分類、規訓、隔絕，憑著一股衝動將所有超出掌控的團結組織全部搗碎，只剩下幻影般的公民身分，讓人誤以為偉大的共和國是唯一的歸屬。比起其他國家，法國人是最貧乏、最可悲的人。法國人對外國人的恨，交雜著對自己身為異鄉人的恨。對於「城邦」，他心懷嫉妒又十分恐懼，因為他對於失去的一切感到悔恨；他無法不去羨慕那些所謂「被流放」的社區，那裡還頑強地存在著一些社群生活、一些人和人之間的連繫、一些非國家的團結精神、一種非正式的經濟模式、一種尚未與組織者完全分離的組織。然而，我們依舊無可挽回地失去了一切，於是感覺自己是個法國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羞辱移民，反對那些其實跟我一樣、但是看起來比我更像異鄉人的人。移民在這個國家占有一個奇怪的主權地位：如果他們不在法國，法國人恐怕也不存在了。

法國的學校製造了法國，而非相反。我們活在一個極度學院化的國家，每個人想起大學聯考的過程，都覺得是一生當中的重要時刻。有些人到了退休後，都還會跟你提起四十年前他們在什麼樣的一場考試中落榜，又如何因此搞砸了他們的職業、他們的一輩子。一個半世紀以來，偉大共和國的學校塑造了一種國家化的主體性，使得每個人都被個別管理。於是，只要有公平的機會，人人都接受挑選和競爭。人人都期望在人生的競賽中表現優良，得到獎賞。人人都學會在獲得之前，先請求許可。人人都無話可說地尊敬文化、紀律和班上的第一名。即便他們依戀具有批判性又有名的知識分子、堅決反對資本主義，也只是彰顯了他們對於學校的愛。隨著教育機構的衰落，這種主體性的國家建設每天都在一點一滴地崩潰。近二十年來，民間學校和街頭文化的興起，使得國立學校和虛有其表的國家文化相形失色，對於法國的普式信仰造成空前的嚴重創傷。在這點上，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意見一致，連討論都省下了。只要想想如勒．費里(Jules Ferry)這個名字，我們就可以知道學校有多麼的可疑——這個法國現代教育改革的推動者，同時也是血腥鎮壓巴黎公社時期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總理、法國殖民擴張的理

論家。

至於我們，當看著那些不知道從哪個「社區治安委員會」冒出來的老師、在晚間八點的新聞節目上哭哭啼啼地說他們的學校被燒掉了的時候，我們想起了小時候有過多少次同樣的慾望。當聽著某位左派知識分子大罵那些成群結隊的青少年是野蠻人，指責他們對街上的路人叫囂、搶劫商店櫥窗裡的東西、縱火燒車、跟鎮暴警察玩貓捉老鼠遊戲的時候，我們想起了一九六〇年代的郊區青少年，他們穿著象徵搖滾精神的黑色皮夾克四處遊蕩，甚至還想起了第一次大戰之前的「美好年代」，那時人們稱呼流氓為阿帕契(apaches)。一九〇七年，一位塞納省(Seine)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此寫道：「近年來流行以阿帕契一詞，泛指所有危險人物、有前科的幫派組織、社會的公敵、沒有國家和家庭觀念的人、逃避義務者，這些人隨時都會犯下膽大妄為的罪行，危害到個人及其財產的安全。」這群遊手好閒、把社區的名字據為己有、和警察對峙的非法之徒，是法國式的、被個體化的良好公民的噩夢：他們體現了所有法式公民所拋棄的東西，所有法式公民無法企及的快樂。在一個兒童開心地歌唱、卻被警告「你小心挨揍」的國

家裡，在一個學校的閹割手術大批製造出一代又一代馴良僱員的國家裡，存在是一種放肆。有「千面大盜」、「頭號公敵」之稱的法國黑幫分子梅林（Mesrine），他的光環之所以能在死後繼續發亮，不只是因為他的見義勇為，而是因為他曾對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報復的東西，持續採取報復行動。或是說，因為我們從未直接地去報復什麼，我們總是在繞路、在拖延。不用懷疑，法國人有的是一千種暗中傷人的卑鄙手段、花樣百出的惡意毀謗、冷酷的兇狠和含毒的禮貌，他永遠不停地在報復一切，報復他被碾得粉碎——雖然他被碾得心甘情願。是時候了，不要再對大財主唯唯諾諾，對警察大聲罵幹吧！在這方面，某些團體的那股直截了當的敵意，只不過是比別人更不加修飾地表達了這種糟糕的氣氛、糟糕的精神狀態，並且渴望在一場毀滅之中，解救這個日趨衰竭的國家。

把一群生活在一起的異鄉人稱之為「社會」（société），簡直是一種詐騙行為，就連社會學家們都打算報廢這個養活了他們一個世紀的概念。如今，他們偏愛使用網絡（*réseau*）這個隱喻，來描述受到精密控制的孤獨個體彼此

連結的方式，以及在「同事」、「死黨」、「關係」、「來往」或「奇遇」等各種狀況底下，人們之間微弱的互動行為。不過，這些網絡仍然有可能凝聚成一個階層，在這個階層裡，人們只以暗碼溝通，身分認同只是一場不斷重組的遊戲。

要在現有的社會關係中，把一切奄奄一息的事物列舉出來，根本是浪費時間。人們呼喊著家庭和伴侶關係的回歸，可是回歸的和當初離去的並不是同一個家庭。回歸家庭只是加深了無所不在的分裂——而那正是家庭急於掩蓋的真相——家庭因此變成了謊言。每個人都心知肚明，每一年的家庭節日都比往年過得更加慘澹，一邊尷尬看著大家徒勞地擠出勉強的笑容，一邊感覺彷彿餐桌上擺著一具屍體、大家卻視而不見。從勾引到離婚，從同居到重組家庭，每個人都感受得到家庭是個不幸的幻影，可是多數人還是認為，沒有了這道幻影會更加不幸。家庭代表的不全然是老媽令人窒息的管東管西、或老爸打在嘴邊的幾巴掌，而是一種人只要有了軟綿綿的依靠、就會退化到幼兒一般的懶散，一種什麼都親切熟悉的狀態，一個無憂無慮的

> 所有社會形式的瓦解，讓我們可以狂野地進行一場大眾的實驗。

時刻，讓人忘記這個世界正在無可阻止地崩毀。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只是「找到一位好老闆」的一種委婉說法。我們想要在原生家庭般的熟悉感中尋找一個藉口，用來反制那股幾乎將我們撕裂的外力，彷彿只要有人看著我們長大，我們就可以像遺忘童年創傷一樣，安心地不去理會任何重大的變動。面對外力的腐蝕，我們必須自保。

親密關係是這場社會大崩壞的最後一個階段。它是人性沙漠中的綠洲。戴著「親密」的護身符，我們在這片綠洲當中尋找一切在當代社會關係裡早已消失的事物：人情味、純樸、真實感、一種沒有劇場也沒有觀眾的生活。然而，一旦戀愛退燒，「親密」便卸下了它的偽裝：它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項發明，說著女性雜誌和心理學的語言，它是人們還沒把戀愛談膩之前僅有的武裝策略。跟別的地方比起來，親密關係並沒有更真實，一樣充斥著謊言和怪異的法規。就算我們運氣好，在親密關係裡找到某種真實感，我們

在和眾人分享這份感覺的同時，必然超出了親密關係的形式：讓人彼此相愛的一切，也會讓人變得可愛，並讓眼中只有對方的兩人世界被瓦解。

事實上，所有社會形式的瓦解，是一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對我們來說是個絕佳的狀況，讓我們可以狂野地進行一場大眾的實驗，部署新的組織，尋求新的合作。大家口中「不負責任的父母」，正好驅使我們迎戰這個世界，提前在我們體內培養出一種清醒的意識，預見即將發生的美麗暴動。在今天，性器官遭受嚴重的磨損，陽剛和陰柔都只剩下爬滿蛀蟲的外衣，色情工業三十年來不斷地推陳出新，已經耗盡了所有叛逆和解放的誘惑力；這時候，在親密關係的死亡中，我們看見一種具有號召力的集體感性正在誕生。在親屬關係裡無條件被接受的一切，我們都將拿來作為政治串連的骨幹，就像吉普賽人的營地一樣能夠防堵國家的干預。無止盡的國家補助，只是逼著走投無路的家長扶養無產階級化的後代，它無法成為一種有利於社會反叛的資助管道。「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當然，這句話的意思也可以是：學會如何在街頭開戰、如何占領空屋、如何不工作、如何瘋狂地彼此相愛、如何搶劫商店。

Troisième cercle

第三圈

工作是唯一的秩序

今天，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生產以滿足需求，
還不如說是為了生產生產者和消費者。
工作本身並不恐怖，
恐怖的是它有效地在幾個世紀之內消滅了工作之外的一切，
工作的秩序就是唯一的世界秩序。
於是我們參與自我剝削，讓自己「好用」，連打炮都在強調生產力。

在法國，沒有比工作更錯綜複雜的問題了。也沒有任何一種關係，比工作關係更讓法國人扭曲畸形。去安達魯西亞吧，去阿爾及利亞吧，去那不勒斯吧，在那裡人們打從心底藐視工作。去德國吧，去美國吧，去日本吧，在那裡人們崇拜工作。沒錯，情況也有所改變。就像日本有御宅族、德國有快活失業族，而安達魯西亞也有工作狂。但這只是一時的奇景而已。在法國，我們以雙手雙腳爬向階級的頂峰，私底下卻喜歡拍自己馬屁地說不在乎那一點地位。被工作淹沒時，我們會加班到晚上十點，但我們也會毫不遲疑地這裡一點、那裡一點地偷走辦公室的文具用品，或是到倉庫裡把準備轉賣的二手零件帶一些回家。我們討厭老闆，卻不惜代價想成為員工。有工作是種榮耀，但工作卻是奴性的標記。總之，法國是完美的歇斯底里症臨床解說圖。我們愛著我們討厭的東西，我們討厭我們愛的東西。每個人心裡都明白，當他失去了工作，他等於同時失去了他的受害者和主人，這時候歇斯底里會發作到令他陷入癱瘓和極度的混亂。而且，通常他好不了。

在法國這個極度講究政治的國家，工業權力總是屈服於國家權力。經濟活動一直被多疑又拘泥的政府部門硬塞入制式的框架內。一個大老闆若非

出身於國家的貴族階層——所謂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和國家行政學院（ENA）打造出來的菁英，那麼在幕後操作的權力世界裡，他便只配當個可悲的賤民。賽車手出身的法國大亨貝爾納・塔比（Bernard Tapie）就是他們的悲劇英雄，這位老兄曾在商業、政治、媒體上獲得巨大成功，後來因為涉及法國足球賽的賄賂案而入獄：今天飽受奉承，明天送進監牢，永世成為賤民。即使他現在還擁有自己的一片舞台，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法國觀眾看著他就像在看一隻怪物，他們觀賞著這齣引人入勝的無恥劇碼，同時保持著安全距離，小心不要被他波及。儘管一九八〇年代的法國企業一度很張狂，然而法國從來就沒有企業崇拜。誰要是寫了一本詆毀企業的書，保證登上暢銷冠軍。企業主管們雖然老愛在公眾面前炫耀他們的風采、說些漂亮的空話，在他們四周依舊存在著一道冷笑的封鎖線、一汪睥睨的海洋、無邊無際的譏諷。企業家不是自己人。總的來說，在被厭惡的等級裡，他比警察還討厭。當個公務員，起碼是在不顧一切地對抗那些操盤交易的金童們和私有化，是大家認定的好工作。我們也許嫉妒企業家擁有那些原本不屬於他們的財富，但我們不羨慕他們的職業。

正是基於這種精神官能症到達了頂點，一任又一任的政府可以持續向失業議題宣戰，企圖發動「就業戰役」；然而同時，那些失業的前高階主管們正抓著他們的手機，紮營塞納河畔，窩在世界醫生組織提供的帳篷中。國家就業局(ANPE)用盡了所有在統計學上作假的花招，大量地註銷失業人口的登記數字，還是難以將失業人數壓低到兩百萬人以下。面對隨時可能會發生的社會大爆炸，最低收入補助(RMI)[1]和職業資訊中心所提供的唯一保障，就是寄寄津貼通知單，發發就業情報。當這一切正在發生，法國人的精神統御法變得和穩定的國家政策一樣重要，只有兩者連手演出工黨杜撰的故事，故事才能延續下去。

很抱歉，我們對這種故事他媽的不感興趣。

我們所屬的世代，是沒有這個虛構也活得非常好的世代。這是一個從不指望退休、也不信任勞動法的世代，更別說相信有工作權這回事。這並不是一個「不穩定」的世代，就像那些最激進的左派分子所樂於理論化的那樣，因為不穩定是相對於工作的領域而言，或者這麼說更符合現在的狀況：是相對於正在瓦解的工作而言。我們承認賺錢是必要的，無論用什麼方法都

1 編註：最低收入補助為法國社會救助項目，是法國社會保護體的重要特色。

行，因為沒錢就是萬萬不能，但是我們並不覺得非工作不可。於是，我們再也不工作了：我們幹活。公司並不是我們存在的場所，我們只是偶爾經過。我們不是犬儒，我們只是對自己被過度濫用有所保留。那些關於動機、優勢、個人投資的言論，只是主管們用來對付大混亂的一套人性化的處理方式，我們只當耳邊風。大家都說對大企業感到失望，因為大企業不但沒有加冕我們父母的忠誠，還隨隨便便地遣散他們。大家都在說謊。只有曾經懷抱希望，才會感到失望。我們對大企業從來不抱任何期望：我們早就發現企業是怎麼一回事，它的把戲就是以多變的形式設下安撫人心的騙局。我們只是為我們受騙的父母感到惋惜，他們或多或少都曾經相信過。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圍繞著工作問題所產生的情感錯亂：工作的概念總是涵蓋了兩個彼此矛盾的面向，剝削和參與。以私人或社會的名義占有剩餘價值，剝削個人和集體的勞動力；在生產領域的中心組織合作關係，參與共同的工作。在工作的觀念裡，這兩個面向總是被惡意混淆：有些人以馬克思主義的修辭解釋工人的疏離感，因此否定了工人有參與的可能；另一些人

以管理學的修辭解釋這種疏離感，因此否定了工人有被剝削的可能。工作關係中的矛盾感也是由此而來，我們感覺自己受到羞辱，因為工作關係讓我們和自己所做的事變得毫不相干，但我們又同時感覺自己被喜愛，因為我們在這場戲局裡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此，毀滅是先決要素：一切都應該被破壞，所有人都必須被連根拔起，好讓工作最終成為無依無靠的我們唯一的生存方法。工作本身並不那麼恐怖，恐怖的是它有方法地在幾個世紀之內消滅了工作之外的一切：工作讓我們對任何區域、任何技藝、任何村落、任何抗爭、任何親屬關係，都不再有歸屬感；對任何地方、任何生命、任何季節、任何說話與做事的習慣，都不再感到依戀。

這就是當前的弔詭所在：工作已經大獲全勝，其他的存在方式則是一概不剩，連工人都顯得多餘。生產力的提升，企業外移，生產的機械化、自動化和數位化，這一切是如此的進步神速，以至於在商品的製造方面，必要的人力勞動量已經被縮減到近乎於零。我們生活在這種弔詭裡，活在一個只有工人沒有工作的社會裡，這個社會有的只是消遣、消費和娛樂，唯獨缺少了讓娛樂消遣成為必需品的工作。過去一個世紀，法國南部的礦場

卡爾莫（Carmaux）向來以暴力罷工而聞名，如今它已經轉型成發現角（Cap Découverte）——一個「多功能休閒中心」，可以玩滑板、騎單車，並以「礦坑博物館」著稱，專門為遊客模擬瓦斯爆炸。

在企業裡，分工變得越來越清楚，有高技術性的研究部門、企畫部門、人事管理部門、協調部門和宣傳部門，這些部門掌握了全新的自動生產過程所需的知識，剩下的就是低技術性的職位，負責維持和監控整個生產過程。前者人數少、薪水高，因此令人垂涎，以至於占據這些職位的少數人做到累死也要保住這份工作。可以說，他們是和工作焦慮地抱在一起。經理、科學家、說客、研究人員、程式設計師、開發商、開發顧問和工程師，說這些人從未停止工作真的一點也不誇張。他們就連打炮都在提升生產力。而且他們說話都像哲學家。一位法國國家人力資源部（DRH）的哲學家曾提出這樣的理論：「最有創意的企業也是擁有最多親密關係的企業。」另一位賓士汽車集團的哲學家對這番理論表示肯定：「企業的合作夥伴，是企業資本的一部分……他們的積極性、專業技術、創新能力，以及他們對客戶需求的照顧，構成了全新服務的主要內容……他們的應對進退、社交能力和情

緒管理能力，在他們的各項考績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新的考績方式將不再以工作時數為評量標準，而是以目標的達成與否和成果的品質如何為基礎。所有人都是企業家。」

凡是不能交由自動化處理的工作，皆屬於模糊不清的職務範疇，也就是說這些工作機器無法處理，所以隨便什麼人都能處理——例如搬運工、倉儲管理員、生產線工人、季節性工人等等。這些勞動力是彈性的、沒有專業分工的，工人們從一個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永遠無法在一個企業裡待太久，無法聚集成一股力量，不但從未處於生產過程的核心，簡直就是在數不完的縫隙中被壓得粉碎，然後用他們來填補尚未被機械化的漏洞。臨時工是一種再也不是工人的工人形象，他不再擁有技術，只有能賣就賣的能力，連有求必應都是他的工作。

在工作這台大機器的核心，是對它的良好運轉有效而且必要的勞動力，但是在機器的邊緣，將有大多數人會成為多餘的勞力，他們除了幫忙機器生產之外便一無是處，而且一旦他們失業而游手好閒，很可能就會開始破

壞這台機器。集體遺散的威脅是纏繞著目前這個生產體系的鬼魂。對於《解放報》(*Libération*)提出的問題「到底為什麼要工作?」，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像這位領過最低收入補助的人這樣回答:「為了我所享受的福利，我需要做點什麼。」這個問題有個更大的風險，因為我們終將發現，我們的游手好閒就是我們的工作。浮動的人群必須有事做，或是被安置。然而如今我們仍未發現比薪水更能令人服從的方法。因此，有人大力主張廢除一切「社會福利」，這樣一來，最倔強的人也只好回歸薪資的懷抱，否則他們只有兩種選擇，餓死或是吃牢飯。各種蓬勃發展的奴隸貿易和「個人服務」必須持續下去：女清潔工、維修工人、按摩業、家庭幫傭、娼妓、護理、特殊教育、具有治療效果的休閒活動、心理諮商等等。伴隨這一切而來的，是持續升高的安全規範、衛生規範、行為規範與文化規範，以及越來越短命的趕流行。其實，光是為了趕流行，就可以讓這些奴隸般的服務業變得不可或缺。在盧昂(Rouen)，停車自動售票機已經被「人力停車計時器」所取代：某個在路邊無聊得發慌的人會給你一張停車卡，如果碰到下大雨，還會提供出租雨傘的服務。

曾經，工作的秩序就是世界的秩序。眼睜睜地看著工作的秩序崩潰，讓許多人光是想到接下來的日子，就害怕得全身抽搐。今天，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生產商品以滿足經濟需求，還不如說是為了生產生產者和消費者，用盡一切方法拯救工作秩序，以符合政治需求。在這個生產變得失去目的的社會裡，自我生產正在成為一項主導性的行業：就好比一位被剝削殆盡的木匠，連個可以刨木頭的地方都不剩，只好絕望地自己刨自己。這正是我們的年輕人每天上演的戲碼：為了工作面試努力練習微笑，為了工作升遷努力把牙齒刷白，為了提振團隊精神一起去混夜店，為了事業進展而去學英文，為了再度達到性高潮而結婚離婚，為了成為領導者而報名表演課程，為了增強「危機管理能力」而參加「自我提升」訓練——某某心靈導師表示：「為每個人各別設計的『自我提升』訓練，能夠讓情緒更穩定，讓人在開放的交際場合裡更自在，思路更敏銳清晰，因此，也能讓人擁有更出色的經濟表現。」在這一小撮擁擠的人群裡，每個人都巴不得快點被上司挑中，同時又要鍛鍊自己保持自然，這是因為大家都必須學會一種能動性（*mobilisation*）

的工作倫理，唯有如此才能挽救工作的秩序。具備能動性，就是不把工作當成一件自己的差事，而是一種自身的可能性。假設某個失業的人，某天突然不玩穿孔和刺青而改上髮廊，開始積極地「規畫」未來，在工作上努力證明自己就像大家所說的「很好用」，他便成功地表現了他的能動性。能動性，就是感覺自己和自己輕微地剝離，是把我們從構成我們的一切當中最低限度地抽離出來，是把我從工作的主體變成客體的詭異情境，使得我販賣的不是我的工作能力，而是我販賣我自己，老闆付我薪水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我是什麼，因為我的社交手腕特別細膩、因為我擅長交際、因為我會微笑又會推銷。能動性就是社會化的新形式。能動性讓工作中矛盾的兩極合二為一：我們參與了對自己的剝削，我們剝削了對一切的參與。我們就是自己最理想的中小企業，自己的老闆和自己的產品。無論我們有沒有工作，我們都必須累積人脈，累積資歷，累積「工作網絡」，簡而言之，累

今天，工作其實是為了生產生產者和消費者，以符合政治需求。

積做人的「資本」。人們幾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發布全球動員令，無論對抗的是癌症、「恐怖主義」、地震，還是無殼蝸牛都一樣。這些現象只是證明了掌權者的意志力有多麼強大，能夠在工作名存實亡之後，讓我們還願意繼續接受工作的統治。

因此，今天的生產工具有兩種功能。一方面，它是一座巨大的機器，能夠在身體上和精神上動員所有人，把人類過剩的能量榨得一乾二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台挑選淘汰的機器，把生存權分配給願意服從多數的人，剔除掉那些「危險分子」，因為他們用另外一種方式過活、他們不服從。一方面，我們讓幽靈復活；另一方面，我們要活人去死。這就是今天生產工具所擁有的政治功能。

為了超越工作和反對工作而組織起來、集體反叛動員的體制、展現一種只有在不動員的散亂無序裡才存在的生命力和嚴謹，這些都是我們來日無多的文明所不容許的罪惡——但也正是我們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Quatrième cercle

第四圈

不斷延伸的都會邊緣

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我們擁有的是大都會。
混雜著輕快的曲調、伸縮警棍和棉花糖，
權力的監控完美地融入了商品的景觀。
貧民區是唯一還有活力、讓人還能活下去的地方，
失業群眾讓這些廢棄的空屋再度活過來，
用郊區的黑話和火焰，綻放出比拉丁區更耀眼的光芒。

我們再也不說「城市」(ville)和「鄉村」(campagne)了，更別提兩者之間古老的對比關係。在我們周遭擴張的景象，長得不像鄉村，也不像城市：它是鋪天蓋地的都市計畫，不具形體又毫無規則可循，形成一片無邊無際、無限荒蕪的地帶，一個由博物館化的超級市中心和自然公園、巨大的集合住宅區和農業開發地、工業區和別墅區、鄉間小屋和連鎖酒吧相連而成的世界。簡而言之：一座大都會(l'urbain)。過去曾經有古代城市、中古世紀城市、現代城市，就是沒有大都會城市。大都會代表的是領土的整合。與其說是在地理上讓一切彼此相鄰，不如說是把所有網絡交織在一起。

正是因為城市已經完全消失，如今城市才跟歷史一樣，變成戀物癖的對象。法國北方里爾(Lille)的手工業變成劇場表演，勒阿弗爾(Le Havre)市中心的混凝土建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人們先是把圍繞著紫禁城的北京胡同拆個精光，然後為了滿足觀光客的獵奇心態，才又在更遠的地方建了幾條假的。在法國的特魯瓦(Troyes)，人們用木結構和泥土填充製成傳統樣式的立面，然後把它黏貼在空心磚搭蓋的建築物上，簡直是一種仿冒的藝術，不禁令人聯想到巴黎迪士尼樂園的維多利亞風格商店。許多歷

史古蹟曾經是發生暴動的所在地，現在一律乖乖聽憑大都會計畫的整頓和安排，轉型成觀光旅遊景點，炒熱消費氣氛。古蹟成為被商品魔法控制的孤島，全靠市集、美學還有暴力維持魔法的效力。每年聖誕節都有矯揉造作得要命的聖誕市集，但也都有市政府出動的夜間警察和巡邏隊。權力的監控完美地融入了商品的景觀，但也不忘顯露出它權威的一面。這是一個混雜的時代，混雜著輕快的曲調、伸縮警棍和棉花糖。每個被警察嚴密監控的地方，看起來都奇幻無比！

在這種對於「歷史真實性」的喜好裡，總是參雜著對於控制的喜好；隨著這種喜好而來的，是小資產階級對於平民生活的社區所展開的殖民。小資產階級從超級市中心被趕了出來，便到平民社區去尋找別墅區裡找不到的「社區生活」。接著，小資產階級趕走窮人、汽車、移民，把每個地方弄得乾乾淨淨，把細菌通通殺光，然而他所消滅的，正是當初他來到這裡想尋找的。一張市政府的海報上，印著一位清潔人員把手伸向一位治安警察，以及一串標語：「蒙托邦（Montauban），清潔城市」。

為了面子，都市設計師現在不談「城市」，城市已經被他們摧毀了，他

們改說「都會」；基於相同的理由，他們也不談「鄉村」，鄉村早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在緊張焦慮、無依無靠的人群面前展開的一片風景，是在農民逐漸消失的今天，一段放在舞台上供人欣賞的過去。人們大肆行銷每一塊「領土」，地面上的一切都必須被增值、指定為歷史古蹟。冷冰冰的空虛不斷擴大，連最偏遠的鄉鎮也不能倖免。

大都會讓城市和鄉村同時死亡，它座落在所有中產階級的交會地帶，位居中上階層的銜接地段，它帶領大批人潮從鄉村出走，使得鄉村不斷地被「外環都會化」(périurbanisation)，以便都會的邊緣被無盡延伸。整片大地正在變成一面巨大的玻璃櫥窗，這個時候，當代建築的犬儒主義合乎時宜地出現了。無論是一間中學、一家醫院，還是一棟影音圖書館，都不過是同一主題的不同變奏罷了，呈現的都是透明、中性、統一。在設計上，根本不需要考慮這些蔓生的建築物是蓋來做什麼用的，它可以被蓋在這裡，也可以被蓋在任何地方。蓋在法國第一大的商業區拉德芳斯(La Défense)、第二大的拉帕迪厄(La Part Dieu)、第三大的歐羅里爾(Euralille)，那一圈又一圈的辦公大樓是做什麼用的？法文有句俗話說得好：「新得過火」(flambant

neuf)，一語道破了這些新大樓的用途和命運。一八七一年五月，群情激憤的暴民放火燒掉了巴黎市政廳，一位蘇格蘭遊客親眼目睹了熊熊燃燒的怒火、如何享有光彩奪目的權力：「……眼前的景象美得教人難以想像，真是太壯觀了！我不否認，巴黎公社的那群壞蛋實在很恐怖，但他們也實在是了不起的藝術家啊！而且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創作！……我曾在義大利看過地中海的蔚藍潮水拍打著阿瑪爾菲城(Amalfi)的遺址，在橫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Pendjab)地區看過錫克教神廟的遺跡，遊覽過羅馬和其他風景名勝；但沒有任何東西能和今晚我的雙眼所見相比。」

當然，在大都會的版圖裡，仍舊保有幾塊城市的殘骸和鄉村的殘渣。不過，城市和鄉村的生命力並沒有消散，這股生命力將流放地占領下來，建造了自己的社區。於是弔詭的情況出現了：表面上最無法住人的地方，反而

在許多超大型市中心裡，貧民區是唯一讓人還能活下去的地方。

才是唯一適合居住的環境。一棟被非法占領的老公寓，比起只是用來擺擺傢俱、修修裝潢、以便等待下次搬家的豪宅，總是顯得更有人味。在許多超大型市中心裡，貧民區都是唯一還有活力、讓人還能活下去的地方，儘管毫無疑問，也是生命最容易受到威脅的地方。貧民區是世界級大都會電子化布景的反面。在巴黎北邊的郊區，小資產階級紛紛離棄集體住宅、搬進獨棟別墅，是失業群眾讓這些廢棄的空屋再度活過來，用郊區的黑話和火焰，綻放出比拉丁區[1]「更耀眼的光芒」。

大家對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那場大火有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是極端的剝削引發了暴動，其實剛好相反，暴動來自對土地全然的占有。燒掉幾台汽車可能只是因為一時不爽，但是要讓暴動四處蔓延，讓警察連吃一個月的敗仗，就必須掌握組織動員的技巧，而要達成戰略上的默契，則必須準確地了解地形，並擁有共通的語言和共同的敵人。無論相隔多少公里、多少個禮拜，都無法阻擋戰火延燒，就在最毫無預警之處，第一道火焰的餘燼釀成後續的大火。暴動者的耳語躲過了監聽系統。

1 編註：拉丁區係為巴黎著名學府區，也一向是學生抵抗運動和抗議遊行的敏感區。

大都會是潛在衝突連綿不絕的戰場，國際列強對伊拉克的巴士拉(Bassora)、索馬利亞的摩加迪休(Mogadiscio)、巴勒斯坦的納布盧斯(Naplouse)發動的侵略戰爭，只不過是潛在衝突的白熱化。對軍隊來說，打仗最怕碰到城市，要打的話就得用大規模的圍攻戰術，而大都會在這方面完全可以被視為一場大戰。武裝衝突只是戰爭大勢已定的一個時刻而已。這些由國家發動的戰爭，就像是為了填補大都會的治安黑洞而一再重覆的治安工程——「無論這個黑洞是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紐約的南布朗克斯(Bronx du Sud)、大阪的釜崎(Kamagasaki)、墨西哥的恰帕斯州(Chiapas)，還是巴黎近郊的拉庫內夫(Courneuve)」。「國家干預」不全是為了打勝仗，甚至也不是為了恢復秩序和安定，而是為了維繫一種社會治安從未受到損害的安全感。如今，戰爭不只發生在與世隔絕的他方，它衍生成了一系列細微的軍事活動和維安措施，以確保「安全」無虞。

警察和軍隊像哥倆好一般合作無間。一位犯罪學家曾要求法國鎮暴警察組成小巧靈敏的專業化編制。軍事機構向來是各種教訓懲罰方式的開創者，

如今則反過來懷疑起這種階級化的管教模式。一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官員說，為了訓練組織的精銳部隊，他們運用了「一種參與的方法，讓每位成員共同分析、準備、執行、評估一項軍事行動。每一次計畫都用好幾天的時間反覆討論，並根據訓練過程和接收到的最新資訊做調整……沒有什麼比共同發展一項計畫更能凝聚向心力，使得每個人的行為都來自於他對團體的認同感」。

武裝軍隊不只融入了大都會，也塑造了大都會。這就是為什麼，納布盧斯戰役以來，以色列士兵把自己封為國家的建築師。巴勒斯坦游擊隊利用危機四伏的巷道戰抵抗敵人，反倒迫使以色列士兵學會在都會鬧區以垂直和水平的方式進攻，打穿牆壁和天花板以便行動自如。一位在以色列國防部任職、學習哲學出身的軍官如此解釋：「敵人用傳統、古典的方法詮釋空間，而我拒絕聽從敵人的詮釋、掉入他們的詮釋陷阱。……相反，我要突襲敵人！這就是戰爭的本質。我必須贏得勝利……這麼說吧，我採取了一種能夠讓我穿透圍牆的方法學……我就像一條蟲，在前進的路上把阻礙全部啃光。」而都會不只是衝突的劇場，更是突圍的手段。的確，這令我們想起

布朗基(Blanqui)所做的建議，特別是他站在了暴動陣營的立場。布朗基叮嚀未來巴黎的暴動者，打街壘戰的時候，必須將街邊的房屋層層包圍，才能保衛自己的陣地；必須將所有的牆壁都開一個大洞，把空間打通；必須打掉建築物地面層的樓梯、在天花板上穿孔，才能提防埋伏在周遭的政府軍；必須把門板拆下來當做窗戶的屏障，並在每一層樓規畫一個良好的射擊位置。

大都會不只是都會化的團塊，不只是城鄉衝突的極致，它更代表了生命和無生命物的大量湧現。它是一股潮流，流經由光纖電纜、高速火車路線、人造衛星、監視攝影機所組成的網絡，推湧著這個世界加速衝向死亡。它的能動性令所有人無從抵抗地隨它擺布，並動員著每一個人。在這股潮流中，我們遭受資訊污染，被互相敵對的勢力撕扯。但我們只能隨波逐流、加速衝刺。於是，等待變得困難，就連在頻繁的班次間隔等待一班地鐵也如此困難。

移動工具和溝通媒介的多樣化，不斷地將我們從此地和此刻抽離出來，讓我們總是渴望身在他方。搭乘高速鐵路、區間快車，或者只是撥一通電

大都會令我們無從抵抗，讓等待變得困難，讓我們總是渴望在他方。

話，都是為了讓自己感覺已經到了別的地方。這種能動性令我們失根、孤絕、流離。它之所以還不至於令人無法忍受，是因為它創造了移動式的私人空間，方便攜帶的內在世界。個人就像泡沫般輕盈，但並不破滅，而是在潮流中載浮載沉。宅男宅女們並沒有破繭而出，而是帶著繭殼移動。從一座車站到另一座車站，一棟購物中心到另一棟購物中心，一家商業銀行到另一家商業銀行，一間飯店到另一間飯店，到處都是人們早已見怪不怪的怪物，以至於本來陌生的東西成為唯一熟悉的事物。繁華的大都會是一架巨大的攪拌器，它隨機選取某些特殊情境，再拼裝成琳瑯滿目的花樣。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市中心不再是性質彼此相似的地點，而是特殊情境的供給站，我們從這一站換到下一站，選擇這一站放棄另一站，根據消費的喜好選擇酒吧的風格、人的風格、設計的風格和存在的風格，就像在點選iPod的播放清單一樣。「只要有一台mp3播放器在手，我就是全世界的主宰。」

要在這個同質性越來越高的環境裡生存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改裝自己的內在世界，但就像小孩子堆疊的玩具屋，蓋出來的總和推倒的一模一樣。也像是魯賓遜在荒島上複製了他那充滿市儈的世界，只不過我們的文明本身就是這座荒島，而我們則是幾十億拼命爬上岸的人。

其實，大都會就是個潮來潮去的建築群，人類史上還未出現過如此脆弱的組成方式。它靈活、精密，但是脆弱。都會的邊界一旦因為流行疾病的迅速傳染而突然關閉、糧食供應一旦出現不足、通訊網路一旦被有計畫地封鎖，大都會的整面布景便隨之倒塌，再也無法遮掩後台裡血腥殺戮的戰爭場面。如果這個世界不是被它的毀滅緊跟在後，它不會跑得這麼快。

緊密交錯的網絡組織、各種科技環環相扣的底層結構、四處擴散的建築物，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大都會免於癱瘓。即使被核子彈轟炸，網路也不能斷線。大量流通的資訊、人和商品，一律必須受到嚴格管理，追溯來源和流向，以便大都會運作順暢、保證倉庫裡貨物齊全、商店裡沒有偷竊行為、機艙裡沒有恐怖分子。這全都要感謝電子標籤、生物特徵護照和DNA鑑定的功勞。

然而，大都會在發明上述這一切的同時，也發明了毀滅自己的方法。一位美國安全專家曾提出警告，讓伊拉克游擊隊學會如何運用新的通訊科技，是美軍的一大失誤。美國的侵略戰爭沒有帶給伊拉克多少民主，倒是在當地架設了無線電通訊網路。就這樣，美國帶給了伊拉克一樣能夠打敗美國的武器。行動電話和上網地點的增加，讓游擊隊發明出許多過去不曾出現的組織方法，使得美軍的這場仗變得更難打了。

每個網絡都有它的弱點，只要我們設法鬆開其中幾個環節，交通就會癱瘓、防護網就會產生內爆。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四日晚間發生的那場歐洲大停電是最好的證明：只要一條高壓電纜出狀況，一大塊的歐洲就會沉入黑暗。要在大都會裡製造突發事件、使得其他的可能性能夠被開啟，首先得做的就是打斷大都會永遠急切的節奏感。泰國的叛亂分子總是先炸毀發電系統，就是這個道理。同樣地，法國二〇〇六年因反對《首次聘僱就業法案》(CPE)[2]而引發的一連串抗爭行動，就是利用罷課癱瘓大學，進而癱瘓經濟市場。二〇〇二年十月發生的美國碼頭罷工潮亦然，工人們為了保住三百個工作機會，在十天之內癱瘓了西部海岸的主要港口。美國的經濟體十分

2 編註：《首次聘僱就業法案》允許企業與二十六歲以下的青年，簽訂一份具兩年試用期的非定期合約。在試用期內，資方可將員工解僱而無須說明理由，資遣費並少於其他舊式的合約。

依賴從亞洲進口的貨源，每封港一天就多增加數十億美元的損失。只要一萬人，我們就能撼動世界第一大國的經濟體系。誠如某些「專家」所言，要是這場罷工運動持續一個月以上，我們說不定會看見「美國回到經濟大蕭條的時代，東南亞的經濟噩夢成真」。

Cinquième cercle

第五圈 經濟改革方案的碎裂聲

我們終於懂得這個道理：經濟並沒有陷入危機，經濟本身就是危機；
就業機會並沒有萎縮，而是工作量太大；
令人喘不過氣的，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經濟成長。
我們都是經濟的產物，一代又一代地被馴服、
被改造成自動生產又樂於消費的主體。
經濟是一種政治。

三十年來，各種「危機」不斷，失業群眾擴大，國家成長停滯不前，卻還有人要我們相信經濟。的確，這三十年間也有過幾次中場休息，讓人產生可以鬆一口氣的幻覺：第一次中場休息在一九八一到八三年之間，我們幻想左派執政可以真正為人民謀福利[1]；第二次中場休息是一九八六到八九年的經濟熱潮，我們幻想跟著投資者和投機客的腳步一夕致富；第三次中場休息是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一年的網路普及，我們幻想只要上網就能找到一份虛擬的工作，同時幻想著一個多元族群但團結一致的法國——多元文化又有教養的法國，一定可以抱回每一屆世界盃足球賽的冠軍獎盃。結果，我們把僅存的幻想都用光了，我們見底了、乾枯了，要不就是被掏空了。

歷經千辛萬苦，我們終於懂得這個道理：經濟並沒有陷入危機，經濟本身就是危機；就業機會並沒有萎縮，而是每個人的工作量太大；壓得令人喘不過氣的，不是經濟危機，而是經濟成長。不能否認，像經文般一長串的股市行情數字，有些人聽起來就像聽拉丁文彌撒一樣感動，多麼幸運，我們之中還有這樣的人存在——讓我們可以不用理會那群只靠偷拐搶騙、非法走私，或是最低收入補助過活的人；那群無法對工作產生認同感、整天

1 編註：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獲選法國總統，是法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左派政府。

只想著及時行樂的人；那群邊緣人、弱勢者，以及所有被視為少數、其實數也數不清的人；那群深怕莫名其妙就被整個社會大規模遺棄的人，尤其是退休沒事可幹的人，和遭受無情剝削、卻仍然任勞任怨的工人。我們不用理會他們，儘管這群人和我們一樣，是受到股市行情波及的人。

我們無法不理會的是，先是一個又一個的國家，然後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陸，都陸陸續續失去了對經濟的信仰。大家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會駕著波音客機霸道地飛來飛去，世界銀行集團只會讓我們吃足苦頭，然而西方國家日益嚴重的經濟空轉，這些集團卻完全避而不談。從幾內亞到俄羅斯，從阿根廷到玻利維亞，經濟的神聖地位和神職人員一樣面臨嚴重的信用破產。有一則關於世界銀行集團的笑話是這麼說的：「請問，一千多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葬身海底，第二天新聞的標題是什麼？」答案是：「世界有救了。」另一則俄羅斯的笑話則是：A和B是兩位經濟學家，有一天A問B：「你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嗎？」B回答：「當然，我來跟你解釋。」A火大了：「不對！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解釋有什麼難的！我也是經濟學家，要解釋我會自己來！我把問題再重複一遍：你到底了不了解究

竟發生了什麼事？」神職人員總是能夠偽裝得天衣無縫，假裝自己是抨擊教條的異端。最近在「經濟科學領域」裡流行一種學說，這種學說自稱為——這可不是在開玩笑——「非自閉的經濟學」(économie non autistique)，力圖將經濟學內部各種被歪曲的事實、各種花招和摻假的痕跡清洗乾淨，並主張經濟學最明確的角色，就是炒熱掌權者以冠冕堂皇的理論布置成的聖壇，幫忙用斯文的語氣包裝高壓的命令，最後再像自古以來的宗教一樣，為這一切提出解釋。因為真正難以承受的苦難，是沒有什麼原因和理由可解釋的苦難。

金錢不再萬能，對有錢人如此，對窮光蛋亦然。百分之二十的德國年輕人被問到未來要做什麼時，回答「藝術家」。工作不再是人類非忍受不可的生存條件。許多企業裡的會計員都承認，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價值在哪裡。惡名昭彰的商業市場本來還想為它的邪惡說一則動聽的故事，它說了十年，最後卻說出了一部充滿暴力和暴發戶的寓言。進步在每個地方變成了災難的同義詞，這已經是常識了。一切都在經濟統治的世界裡消失無蹤，彷彿

在重演前蘇聯總理安德洛波夫主政的蘇聯末期[2]。只要對這段時期稍有了解的人，就會很容易在我們的主政者呼籲人民要有堅強意志的時候、在加速飛奔到我們完全不知道會奔向何處的未來裡、在所有告訴人民無論如何要相信「改革」的政令宣導裡，聽見柏林圍牆開始碎裂的聲音。社會主義集團的瓦解帶來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成功，這整個跨國集團其實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它的瓦解表示了這種形式的破產。同樣地，蘇聯的滅亡並不是人民起義反抗的結果，而是國家的特權階級露出了他們真實的嘴臉。因為一旦社會主義宣布投降，一大部分的統治階級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切斷他們對人民應盡但過時的義務，以私有制和民主之名，更全面地控制過去已經被他們控制的東西。以前，工廠裡的工人常說：「反正國家只是假裝付我們薪水意思一下，我們也假裝工作意思一下。」後來，露出真面目的寡頭政權回應工人：「你不喜歡假裝？那我們就來真的！」就這樣，原物料、基礎工業、整個複雜的軍事工業網絡、銀行、夜總會陸續被私有化，貧民潮和移民潮相繼湧現。就如同安德洛波夫時代的人民不再信任蘇聯，今天的人民不管是在會議廳、工廠，還是辦公室裡，都找不回一點對法國的信任。大老闆們

2 編註：安德洛波夫(Andropov)曾努力對工業和農業進行改革，但並無效果。

和主政者們異口同聲地說：「那我們就來真的！」為了貫徹「經濟的鐵律」，他們毫不手軟，半夜先把工廠遷走，清晨再對員工宣布關閉工廠，然後毫不考慮地派遣憲兵特勤部隊去鎮壓罷工——例如「科西嘉地中海國家渡輪公司」的罷工事件[3]，以及二〇〇六年發生在雷恩（Rennes）的民眾占領郵件處理中心事件[4]，皆以此告終。當權者用謀殺行動來管制眼前的這片荒蕪，為「新經濟」打好基礎。

事實上，我們都是經濟的造物。我們一代又一代地被馴服、被安撫、被改造成自動生產又樂於消費的主體。結果，我們努力要遺忘的一切，現在反而顯得更清晰了，那就是：經濟是一種政治。而今天，這種政治可說是一種在人性變成多餘的群體裡，適者生存的政治。從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Colbert）到拿破崙三世，再到二次大戰後的戴高樂，經濟之於國家一直都是政治，獲得經濟利益的資產階級對此一清二楚，反抗經濟剝削的無產階級就更不用說了。只有這群奇特的中間階層群眾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是一團怪異的物質，由沒有任何力量也不做任何表態的人所組成——也就是

3 編註：二〇〇五年法國「科西嘉地中海國家渡輪公司」員工因抗議公司民營化而罷工，連鎖導致全國大罷工。

4 譯註：二〇〇六年時，為了工時和市場自由化問題，學生與郵件處理中心員工共同占領郵件處理中心，癱瘓郵務運作。

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相信經濟就是現實，因為經濟讓他們的中性立場受到保護。小生意人、小老闆、小公務員、職員、老師、記者，這群位居中間地帶的中間人在法國形成了一種非階級（non-classe），一種由大眾組成的透明社會黏著劑，他們一心只想在歷史的風暴之外安穩地過完他們小小的私人生活。他們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派，天生是偽善的捍衛者，讓自己總是處於半睡半醒之間，這樣才能對爆發在周遭的戰爭視而不見。這也是為什麼，法國許多反對陣營提出的解決方案，常常只是發明了新的空想。近十年來的「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和他們虛晃一招的托賓稅就是一個好例子[5]，他們成立的時候宣稱自己是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團體，創造出來的卻正是一個全球化的政府組織，成天喊著要用「真實的經濟」對抗金融市場，骨子裡充滿了對國家的懷舊情感。這場鬧劇要鬧多久隨他們高興，反正他們也變不出新把戲。一場空想接著又是一場空想，然後有些人又想出了逆成長（*décroissance*）這個概念。如果說「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試圖透過一連串教育宣導課程挽救經濟的科學價值，逆成長則是為了挽救經濟的道德感。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

5 編註：「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是一個提倡課徵托賓稅的團體。托賓稅（taxe Tobin）為James Tobin提出的觀念，希望藉由課徵全球統一的金融交易稅，抑制投機活動。

> 回歸往昔的經濟模式這種論調，恰好為高科技業者提供掩護。

是降低經濟成長。減少消費，減少生產。我們要知足常樂、改吃有機食品、每天騎腳踏車、戒菸，購買任何產品都要嚴格檢查一遍。我們要快樂地過最艱苦的生活，心甘情願當個頭腦簡單的人。「我們將會發現，真正美好的財富是友善的社會關係，和一個健康的世界。」「自然是我們的資本，請勿過度使用。」「我們要邁向一種「健康的經濟」。」「拒絕混亂的合理化。」「拒絕製造社會危機，全力擁護民主和人道主義。」簡而言之：我們要變得更節制，更經濟。我們要回到爸爸爺爺那一輩的經濟模式，回到小資產階級的黃金歲月，回到一九五〇年代。「當一個人養成節儉的好習慣，他的所得便能完全補償他為工作所做的付出，並使他可以隨心所欲地享受公共的社交生活，或是個人的私密生活。」

在富有異國情調的露天咖啡座上，一位插畫家穿著純手工羊毛衫，和朋

友一起喝著水果雞尾酒。在座的每個人是那麼能言善道，愛開玩笑又不失分寸，不會太吵又不會沒話可聊，看著對方面帶微笑，自我感覺很難不好。大家心想：我們是多麼文明的一群人哪！接下來，有人要去整理社區的花圃，有人去上陶藝課，有人去參加禪修班，有人去看動畫電影。我們同樣擁有正確的情感，一起發明了新的人性，變得比之前更聰明、更細膩。而且，我們是對的。關於人類文明的未來，蘋果電腦的想法和逆成長的主張幾乎一模一樣。回歸往昔的經濟模式這種逆成長分子的論調，恰好為高科技業者提供掩護，讓他們躲在過去的迷霧後面大幅度地攻占未來。在歷史裡，根本沒有回到過去這回事。鼓勵大家回歸往日生活，永遠只是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有感而發的一種表達方式，本身就是最具有現代感的時間意識。像逆成長這種概念，必然只有被《廣告終結者》(*Casseurs de pub*)那種看似反廣告、其實完全是廣告業者所創辦的雜誌，拿來設計雜誌封面的主視覺。不要忘了，發明零成長理論的專家、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6]的會員，這批人本身都是政府機關的員工和工業家，他們的理論基礎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遠端遙控學者所做的研究。

6 編註：羅馬俱樂部是一個著名的未來學民間學術團體，其於一九七二年發表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做了世界性災難即將來臨的預測，造成轟動。

逆成長理論、廣告和高科技的結合絕不是偶然。這三者一直走在同一條行軍的隊伍裡，為了尋找經濟的解決方案而並肩作戰。過去的資本主義為了自己著想，徹底攻陷了關係緊密的傳統社會；如今的資本主義邁入重建的階段，依據有利於自己的作戰位置架設新的社會網絡，而當代大都會的人際互動關係就正在孵化這片網絡。資本主義曾經毀滅了大自然，現在它以同樣毀滅性的方式，瘋狂地投入鋪天蓋地的建設工程，讓每個環境受到監控，到處安裝防範各種意外發生的感應器。資本主義開創了新的人性，自然需要搭配新的經濟模式。新的經濟模式不想成為獨立於個人存在的一塊領域，而是變成緊貼著存在的一層薄膜、變成發展人際關係的必需品；新的職業定義是自我的職業化，新的資本論是人類的資本化；新的生產觀念是利益關係的生產，新的消費觀念是生活情境的消費；最後，新的價值觀，就是創造能夠總結一切生命意義的價值。目前還在孕育階段的「生物經濟學」[7]把全地球當作一個封閉的管理系統，試圖找到能夠衡量所有生命價值的科學根據。等到這種科學正式誕生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嘆口氣說，過去我們如何用欺騙性的指標虛構了美好的時光——譬如用國內生產毛額的

7 編註：生物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研究生物學與經濟學之間複雜關聯。

成長衡量人民的幸福——現在我們終於贏得了人民的信任。

「重新發現生命裡每個非經濟層面的價值」，這就是逆成長理論的指導原則，同時也是資本改革的進程。低碳生態村、監視攝影機、心靈成長團體、生物科技和社交生活，這一切都屬於同一個正在發生的「文明進程」，一座從地底浮現的總體經濟。它的知識模型就是遙控理論、系統科學，換句話說，系統的控制學。打從十七世紀開始，為了強力執行經濟統治，讓人屈從於它的工作倫理和它的貪得無厭，凡是遊手好閒的人、乞丐、巫師、瘋子、享樂主義者、窮人和流浪漢，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被驅逐出境，只因為這類人的存在狀態違反了獲取利益和節制浪費的法則。新經濟的實現還是得靠舊有的淘汰機制，篩選出聽候差遣的自願者，劃定出方便管制的區域範圍。新經濟宣稱世界陷入了混亂，篩選的時刻到了，然而這場混亂也可以是我們勝利的時刻，一舉消滅新經濟這一切可惡的計畫。

Sixième cercle

第六圈 環境問題是二十一世紀經濟的王道

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是建立在管理上。

他們說：如果我們還想挽救美好的文明生活。

唯有減少消費，才能繼續消費。

這就是當今世界的邏輯，

滿口保證要和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

其實只是延續了過去的歷史。

環保是本年度的重大發現。三十年來，我們把環保問題留給綠黨解決，在星期天取笑環保人士的大驚小怪，好在星期一放心地繼續汙染環境。結果呢？環保問題還是回過頭來把我們困住了。從廣播電台到暑假發行的流行歌曲都在大談環保，因為十二月居然出現了攝氏二十度的高溫。

四分之一的魚類從海洋裡消失。剩下的看來也活不了多久。禽流感進入全面警戒狀態：政府保證會從空中射下幾千隻候鳥，避免疫情擴大。

最新研究顯示，母乳所含有的汞，比起政府限定的牛乳含汞量高出十倍。連從菜市場買來的蘋果都會造成食物中毒，咬一口就嘴唇腫脹。生活中每個最小的動作都有毒。有人三十五歲就死於「慢性疾病」，還好，我們遲早有一天會把疫情控制住。不過得加快腳步了，至少得趕在我們被送進安寧病房之前找到解決辦法。

我們必須承認：面對大家高談闊論的這一切「災難」，我們沒有太多感覺。至少，在諸多災難預測還沒真的兌現之前，我們實在沒什麼感覺。災難也許和我們息息相關，可是與我無關。這才是真正的災難。

根本沒有什麼「環境災難」，環境本身就是一場災難。所謂的環境，就是當人類失去了一切之後，唯一剩下來的東西。那些棲身在小社區、山村、工廠裡的人，那些在街道、戰場上的人，這些人擁有的不是「環境」，而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裡頭充滿了危險、朋友、敵人、各種生活和死亡機能、各式各樣的生命體。本來這就是一個互相牽連的世界，只是我們和每個人、每個場所之間的依存關係，有著性質和程度上的差異而已。但是如今，我們成為被極端剝削的孩子和最新一批的流亡者，在一棟又一棟的水泥方塊裡出生長大，在超級市場裡採收水果，透過電視螢幕偷窺世界新聞：這一切都是為了擁有一個自己的環境。我們正親眼目睹自己的滅亡，卻只感覺到氣氛不太一樣。我們對於災害持續擴張感到非常憤怒，但卻只曉得上網補充百科全書的條目。

我們只剩下環境這個僵化的概念，因為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是建立在管理上，換句話說，是建立在莫名其妙上。只要和世界保持這種關係，我們便不覺得，樹林間颯颯作響的樹葉、從屋子裡飄散出來的油炸氣味、閃耀在

溪流上的波光、學校教室裡傳出的喧鬧聲、夏夜潮濕的水氣是我們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裡，只有我和我的環境有關係；環境包圍著我，但不是我的一部分。我們全部變成地球資產董事大會上排排坐著的與會者。沒有人能夠想像比這更接近地獄的畫面。

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地方足以被稱為「環境」，除了今天的大都會之外。播音員的聲音被數位化，電車的汽笛聲被二十一世紀化，泛著藍光的路燈活像一根巨大的火柴棒，路人把自己打扮得像拙劣的時尚模特兒，監視攝影機無聲轉動著鏡頭，進出地鐵站時清脆的刷票聲，超級市場一字排開的收銀機，辦公室的電子打卡機，高科技的網路咖啡館，無所不在的電漿電視、快速道路和乳膠製品。從來沒有任何一面像大都會這樣的布景，能將台上穿梭往返的生靈消融於無形。從來沒有任何地方，像大都會那麼自動化。從來沒有任何社會脈絡比大都會更冷漠，並且反過來要求所有在裡頭討生活的人們表現得同樣冷漠。說穿了，所謂的環境，就是大都會特有的一種和世界的關係，它將這種關係織成天羅地網，讓任何東西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

我們面對的狀況如下：曾經，我們的父親被僱用來摧毀世界，現在，我們被派遣的工作是去重建世界，而且還得是一個能夠獲取暴利的世界。君不見，新聞記者和廣告業者總是興致勃勃地追蹤地球暖化的每一個最新數據，在這種病態的熱情背後，是新綠色資本主義冷酷的微笑。早在一九七〇年代，新綠色資本主義就預告自己即將到來，可是我們等到二十世紀都過完了，它還是沒來。萬萬沒想到，它真的出現了！環保，就是它！替代性的解決方案，也是它！拯救地球，還是它！不必懷疑：連綠色和平組織都沒有新資本主義來得綠！環境才是二十一世紀政治經濟的王道。從今以後，針對每一次新冒出來的災難，都會隆重推出一系列的「工業解決方案」。

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曾說，他打算在大氣中的平流層噴灑數百萬噸的金屬塵，以此對抗氣候暖化。美國太空總署多年來一直憤憤

環境是大都會與世界的特有關係，它讓生靈消失，讓人民冷漠。

不平，覺得自己苦心研發的反導彈防禦系統是多麼偉大的構想，最後卻只能被陳列在冷戰時代的胡思亂想博物館裡；現在它又跳出來發誓，可以在月球軌道外圍擺設一面巨大的反射鏡，這樣就能保護我們免受紫外線的危害。其他關於未來的幻想包括：一種光吃生物燃料，就可以從聖保羅一路跑到斯德哥爾摩的汽車；長期被欺壓的農夫所做的一場大夢則是，他們要把地球上的每一片沃土，全部變更成種植大豆和甜菜的農田。當然，還有環保汽車和再生能源，以及刊登在時尚雜誌光滑的內頁裡、香奈兒最新商品廣告的旁邊，卻一點也不會讓人覺得尷尬的環保常識和建議。

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告訴我們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和環境相比，它是人類最重要的全球問題。全球問題，也就是只有全球化的組織才握有解決辦法的問題。我們跟這些組織可熟了。在過去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這些團體成了各種災難的首領，他們最擅長的就是用最小的代價，讓災難換個名目持續下去。就說法國電力公司吧，明明是回鍋的核能計畫，他們卻下流無恥地硬說是解決世界能源危機的最新方案。由此可見，新解答和老問題可以完全一模一樣。

於是，從國務祕書辦公室到另類咖啡館的小包廂，從過去到現在，人們談論焦慮的詞彙永遠一模一樣，說來說去，總之就是要你動起來。不是為了重建家園，那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事；不是為了拯救衣索比亞饑荒，那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事；不是為了努力工作，那是一九九〇年代的事。不，這一次是為了環保，我們的環境將由衷感激您所做的一切。高爾、逆成長團體、生態主義者尼可拉・宇洛[1]，這些人都體現了共和國的精神，被奉為偉大不朽的靈魂，善盡職責地讓左派小團體和每個人年輕時都有過的理想主義死而復生。他們就像義和團一樣義憤填膺，像慈善團體的義工一樣義不容辭，不計一切代價要我們相信「生態環境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他們把自己那坨黏答答的罪惡感丟到我們疲憊的肩膀上，督促我們耕耘自己的花園，為自己的垃圾做好分類，並且在享用完餐桌上豐盛的屍骸之後，不要忘記回收剩下來的殘渣，製成有機肥料。

我們必須提防核能外洩、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過量、冰山融化、颶風、傳染疾病、世界人口過剩、水土流失、大批物種瀕臨滅絕……凡此種種，皆為我們應盡之責任。他們說：「每個人都要從生活習慣的改變做起」，如果

1 編註：尼可拉・宇洛（Nicolas Hulot）為法國知名環保主義者、電視名人與作家，積極推動各種環境運動。

我們還想挽救美好的文明生活。唯有減少消費，才能繼續消費。唯有生產有機商品，才能繼續生產。唯有先約束自己，才能約束別人。這就是當今世界的邏輯，滿口保證要和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其實只是延續了過去的歷史。這就是他們的花言巧語，一心想說服我們加入本世紀最偉大的工業挑戰。驚嚇過度如我們者，常常就這樣帶著脫離混亂的希望奔向別人的懷抱，卻忘了製造混亂的、和張開雙臂的是同一個人。

環保不只是總體經濟的運作邏輯，也是資本主義的新道德觀。體制內部的危急狀況越是緊張、篩選過程越是嚴苛得令人難以忍受，我們就越渴望新的標準出現，讓淘汰機制照舊運行。從古至今，美德都是敗德發明的概念。如果沒有環保的概念，我們就難以解釋為什麼如今會有這兩種飲食習慣存在：一種是「健康有機」的吃法，屬於有錢人和他們的小孩；另一種簡直像毒癮般的吃法，屬於賤民和他們胖死活該的後代。反正，最值得效法的就是全球超級資產階級的生活風格，他們連賣弄風騷都能小心避免「對環境造成傷害」。沒有任何東西比環保擁有更大的權力，讓控制的範圍迅速擴張，

教所有反對聲音全部閉嘴。

貨品來源追蹤、資訊透明、資格認證、環境稅、環境優先權、國家水資源警察，這一切預言了環保在今天的特殊地位。環保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因為賦予它權力的是自然、健康和公共福利。

「當新的經濟和新的態度成為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所有強制措施便再也不需要強制執行了，」某位電視上的名嘴說。只有像他那麼勇於胡說八道的人，才能理直氣壯地說出那麼麻木不仁的話：一方面呼籲我們要起身行動，全然地表達「對地球的歉意」；一方面又要我們全然地麻痺自己，保持文明和理性的態度面對問題。控制好你自己，這就是新的環保禁慾主義，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參加這場苦行，才有資格在解救地球的行動當中和體制談判。我們必須忍受飢餓，從前是以經濟之名，現在則是以環保之名。所有馬路都有可能被改建成自行車道，甚至有一天，我們的收入也

滿口保證要和過去一刀兩斷，其實只是延續了歷史。

很可能得到合理的保障，因為健康的環境和生活都有利於工作，促進經濟成長。有人說，人只要自己管好自己，就不用去管環保是否變成了獨裁，這種人在說謊：良好的自我管理和環保獨裁互為因果，我們則是陷入了因果循環。

在人和環境之間，永遠有警察存在。

環保論述裡的一切都必須被重新推翻。譬如說，環保人士口中的「災難」是指現行體制在人事物方面的管理疏失，然而在我們看來，正是因為這個體制運作得完美無缺，才會導致災難來臨。歷史上最大的一波發生在亞熱帶地區的饑荒是在一八七六到一八七九年間，這段時間剛好碰上了全球性的乾旱，然而，這段時間同時也是殖民擴張的全盛時期。當農民生活的世界和農耕技術一起被消滅，人類因應糧食短缺的辦法便跟著消失了。絕不只是缺水，就能讓亞熱帶的大地上布滿幾百萬具乾巴巴的屍體，真正的原因是殖民經濟的快速擴張。地球上所有看似生態浩劫的災難，其實都在向我們證明，我們和世界之間形成了一種毀滅性的關係。我們在這種關係中被消耗殆

盡，以至於面對任何系統故障或氣候異常，我們都不堪一擊。在二〇〇四年的南亞大海嘯裡，當海嘯的巨浪逐漸逼近，遊客卻還在踏浪玩水，而住在島上的獵人和農夫早已察覺苗頭不對，趕緊跟著飛離的鳥群從海岸逃走了。今天環保的弔詭在於，它以拯救地球為理由，但真正拯救的卻是經濟基礎，而正是如此穩固的基礎把地球變成一顆荒涼的行星。

這個世界正常規律地運作，讓我們忘記日常生活的剝削本身就是一種災難狀態。環保人士所說的「災難」，只不過是暫時把我們的注意力從這種狀態中移開，讓我們在所剩不多的快樂時光裡為自己還活著感到慶幸。其實，我們大可以快一點用光石油存量，斷絕國際之間的資本流通，打亂大都會的節奏，為社會全面失控而熱烈歡呼！「民眾回到野蠻狀態」又怎樣？「地球遭受威脅」又怎樣？「人類文明結束」又怎樣？任何失去控制的場面，都比裝模作樣地危機管理更有意義。從現在開始，不要再去詢問永續發展的專家，期待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良心的建議。只有當社會運轉失靈，系統發生短路，所有問題最合理的解決方式才會一一浮現。想想看，簽署京都議定書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幫地球降溫，還是讓烏克蘭和羅馬尼亞這些國家，

可以靠著出售溫室氣體排放配額振興經濟？想想看，如果不是因為冷戰結束、蘇聯垮台，逼得卡斯楚必須經濟獨立，古巴怎麼會從一九八九年搖身一變，成為今天「有機農業」的世界大國？反過來說，為什麼偏偏是在窮困的非洲，而不是在其他工業發達的國家，汽車修理的技術可以普遍到成為一種全民藝術？想想看。

危機的迷人之處，在於危機一旦發生，環境就不再只是環境了。危機迫使我們和現況重新取得聯繫——即使取得的是危險關係也好，它讓我們重新感受現實的脈動。它使環繞在我們四周的不再是風景、一覽無遺的展示圖、虛構的劇場，而是我們賴以生存、創造、學習的一切。我們不會再被那些三句不離「災難」的人唬住，他們自己就是災難製造者。管理階層的人整天只會空想，彼此討論著如何對體制發出有力的一擊，又能「造成最小的傷害」；剛好相反，我們認為最實際的反抗策略，就是要「造成最大的傷害」，最好大到把整個體制搞垮，證明我們有多強悍。

二〇〇五年的紐奧良，卡崔娜颶風過境後沒幾天，在末日般的氛圍當

中，生命重建的工作在四處漸漸展開。面對毫無行動的公權力，看到政府只會忙著打掃「法國區」(Carré français)這樣的觀光地段、為街上的商店進行消毒，城市裡貧窮的居民感到格外無助。[2]於是，被遺忘多時的抗爭形式，又再度重生了。不管政府想用如何強制的手腕驅離居民，也不管白人至上主義者如何趁機散播「獵殺黑鬼」之類的種族仇恨言論，許多居民硬是不肯棄守家園。他們拒絕成為被迫遷離的「氣候難民」。在昔日的黑人武裝抗爭組織黑豹黨[3]號召之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紛紛加入反迫遷的行列，一種自發性的抗爭組織就這樣出現了。過沒幾個禮拜，公共醫療診所正式成立。從看診的第一天開始，這間看似鄉下醫院的診所便提供免費、但是優良的醫療服務，源源不絕來到這裡的志工更是幫了大忙。到了今天，這間診所已經成為平時抗爭的基地，大家時常聚在這裡抵擋政府出動的怪手，防堵國家把整塊社區剷平，把整座城市賣給房地產商炒地皮。從公共食堂、糧食供應站、街頭義診、臨時動員，到建立緊急收容所，大家一輩子慢慢累積的實用知識，都在這裡派上用場。而且，這裡不需要制服，也不用警報器。

誰要是在災難發生之前造訪過紐奧良的這些社區，見識過居民是如何被

2 編註：紐奧良市絕多數人口為黑人，風災中最慘重的貧民區「下九區」更以黑人為主。

3 編註：黑豹黨(Black Panther)是一個活躍於七〇年代、由非裔美國人所組織的民權團體，主張武裝自衛和社區自治。

剝奪了快樂的權利，對統治他們的國家如何充滿了不信任，卻又如何普遍地擁有一種靈活的行動力，便不會對災後的紐奧良所展現的可能性感到吃驚。相反地，只有被我們蒼白貧血的日常生活、沙漠一般荒涼的住宅區完全困住的人，才會對災後居民的意志力感到懷疑。我們必須撥開自己經年累月規格化的生活，重新挖掘出被埋在底下的各種可能性，因為這些被遺忘的可能性是我們唯一的機會，防止自己和這個世界一起陷落。因為我們仍然有機會，重建我們所熱愛的生活。

Septième cercle

第七圈 我們揹著的這具屍體

我們面對的不是社會危機，而是文明滅亡；

我們身上揹著一具屍體，但無法就這樣擺脫它。

文明是否已死，那是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決定。

決定是種政治行動。

讓我們決定文明已死，連同它的死法也包括在內：

只有決定，才能將我們背上的屍體卸下。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座世界第一大的屠宰場，一舉解決掉城市和鄉村裡大部分的無產階級，以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名義讓他們去送死。這幾年來，所謂的「反恐戰爭」在表面上也是基於同樣的名義，派出大批的特種部隊展開暗殺行動。不過，兩者之間的平行關係就結束在這三個字：「表面上」。今天，我們不再可以二話不說，就把自以為是的「文明」搬到別人家裡。陽光下每一面塗滿標語的牆上，我們再也找不到「自由」一詞，如今的它總是拖著長長的陰影出場，那是道名為「安全」的陰影。至於名氣最響亮的「民主」，則已經完全溶解成一條又一條的特別法條文了——例如，美國正式立法恢復使用酷刑，以及法國「使司法適應犯罪發展」的《貝爾本二號法》(La loi Perben II)，造成了司法暴力的強化、司法保障的弱化。

短短一個世紀，自由、民主、文明全部退回到假設階段。情況走到了這個地步，國家領導人只剩下一件事好做，就是在物質、道德、象徵、社會等每一個層次上，捏造出這些假設仍然可以被映證的條件，虛構出一個自由民主運作完善的文明空間。只要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辦法就是好辦法，即

使是最不民主、不文明、反自由的辦法也一樣。上個世紀就是這樣過去的：民主總是比法西斯更有理由永久地統治世界；文明總是在華格納的歌劇和鐵娘子的演說聲中，發動毀滅性的侵略戰爭；自由則是在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暴跌的那一天露出真面目，銀行家因自由市場大蕭條而跳樓自殺，接下來是一整個工人家庭跟著餓死。我們就直說吧！打從二次大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起，操控群眾、間諜戰、限制公共自由、各種警察權限的不斷擴充，全都是為了鞏固民主、自由和文明而發展出來的手段。時至今日，這些手法的演化邁入了最新階段，我們終於選出了有史以來第一位社會黨的巴黎市長貝特朗・德拉諾埃(Bertrand Delanoë)，卻看著他只是完成了前人未了的都市安全措施、加派警力管理貧民區，並且以小心選擇的詞彙解釋說：「在此，我們打造了一個文明的空間。」該說的都說了，該毀的也毀了。

儘管文明問題聽起來大得像個哲學問題，但其實它一點也不哲學。文明並不是超然於生命的形而上。每個最平凡、最個人的生活細節，都有被文明

規訓過、占領過、殖民過的痕跡。文明同時掌握了我們最廣泛和最私密的面向。在法國，文明和國家密不可分。當一個國家越是強大，歷史越是悠久，她所扮演的角色就會越多樣化，彼時國家不再只是傳統定義的上層建築或社會框架，而會發展成一種決定人民性格的主體形式。法國正是如此，她深入地滲透了每一個法國式的主體、數百年來閹割著自己的人民。瞭解了這一點，我們便不會訝異於，在法國的精神病院裡，病患對於世界的妄想總是和政治人物有關；我們總是很有默契地認為，我們一切病痛的根源就是我們的領導者；我們是如此樂於在這些領導者的背後說他們的壞話，而正是因為我們只敢偷偷地說，這些壞話和鼓掌歡迎他們成為我們的主人，在效果上也沒什麼分別。在法國，我們關心政治，不是因為政治是外在的現實，而是因為政治是自我的一部分。我們奉獻給政治人物的，和我們被奪走的，是同一條生命。

如果說法國有什麼特色，那一定是從這種主體性的閹割來的。就算是令全世界讚嘆不已的法國文學，也是動過手術的結果。在法國，文學是專為去勢者量身打造的娛樂空間。文學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是一種代替品，讓人

們不至於無法面對真實的自由全然消失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政客和文人可以連續好幾個世紀猥褻地互拋媚眼，熱衷於借穿彼此的衣服。這也是為什麼，法國的知識分子總是地位越低說話越大聲，並且總是在某個決定性的時刻突然啞口無言，不知道是該為了存在的意義而繼續說真話，還是留在這個圈子裡繼續往上爬。

根據文學專家的權威觀點，現代文學是跟著波特萊爾、海涅、福婁拜（Flaubert）一起誕生的，是對於一八四八年六月政府軍血腥鎮壓革命群眾的某種反抗[1]。現代文學的形式，是從巴黎造反群眾的鮮血裡誕生的，是拒絕保持沉默的文人對於大屠殺的反應——憂鬱、矛盾、唯美主義、頹廢皆由此而來。法國人在他們的法蘭西共和國面前總是顯得如此地多愁善感，一旦觸動了這股神經質的感傷，隨便一塊墨漬都顯得價值連城，任何荒淫無恥之徒都可以翻身成為尊貴高雅的文人。弔詭的是，正是這種感傷讓我們越來越難以感受革命犧牲者所體現的意義。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發生的那幾天，光是武裝衝突就死了一千五百多人，成千上萬的犯人在監獄裡未經審判就被處死，而國民議會在聽到街壘戰的最後一道障礙已被移除時，所喊

1 編註：一八四八年二月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成立，六月時，巴黎工人階級爆發革命，但旋即被當局派兵鎮壓。

出來的第一句話正是：「共和國萬歲！」一八四八年的大屠殺和血腥鎮壓巴黎公社一樣，讓我們的記憶在出生時便染上血印，無論文學藝術可以引發多麼偉大的淨化作用，都無法將它清洗乾淨。

法國哲學家科耶夫（Kojève）曾於一九四五年寫道：「直到今天，法國和法國人民在政治理想上的對外『正式』說法，仍舊是民族國家，一個『團結一致的共和國』。但是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從靈魂深處意識到這種理想的缺陷，她知道按照嚴格的定義來說，『國族』的概念在政治上早已不合時宜。這種不合時宜的感覺從未達到一個高度，成為清楚明白的概念：法國既不能、也一直不願意將這種感覺條理分明地公開表達出來。而且，正是因為法國在國族主義上有過非常輝煌的成就，對於這個國家來說，要全盤承認、坦然接受『國族的』歷史階段已經結束的事實，並為這段歷史做出總結，才顯得格外困難。過去，這個國家從一顆一顆的零件架構出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然後把這套意識形態的架構輸出到全世界去，現在要他承認所有的零件都已經過時了，的確是很殘酷的一件事。」

半個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以及民族國家的消失，形成了某種我們可以稱之為法國式不適應症的問題核心。它是一種我們文謅謅地命名為「政黨輪替」的間歇性痙攣，就像鐘擺一樣左派發作完了換右派，右派發作完了換左派；就像躁鬱症患者經過了狂躁階段，緊接著又是抑鬱階段，每個階段的結束都正在開啟下一個階段；就像在法國，人們一下子對個人主義發表最雄辯的批判、一下子宣揚最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或者一下子對群眾展現無比的慷慨，一下子又覺得他們很煩。只有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2]裡，這種不適應症曾被暴動的狂熱短暫地治癒過，除此之外，從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法國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國家、國族、共和國的時代結束了，法國則被嚇傻了，畢竟它為這些理念已經奉獻了多少青春。前總理若斯潘（Jospin）才說了一句簡簡單單的「國家不是全能的」，就在國內引發了一場大爆炸，而其實還有一場更大的爆炸即將發生，因為法國人遲早會發現國家全是無能的。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像傷口上的膿瘡不斷擴大，一種潛伏的憤怒正在不斷加溫。我們必須為國族的時代舉行一場告別式，否則法國的時間錯亂就無法解開，革命的可能性也將持續被國家沒收。

2 編註：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乃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當時法國的各工會亦聲援發動總能工。

無論未來每一屆的總統大選結果如何，選舉唯一的功用，只是讓法國一再地幻滅，讓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幻影破裂，使得某些事件有可能繼續發生。例如反對《首次聘僱就業法案》的社會運動，這在別的國家看來彷彿是一九七〇年代躲過的一場噩夢，而我們就是要讓噩夢成真。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其實都不想去投票。也難怪，法國的選舉投票率總是在西方世界裡吊車尾。

今天，西方是美國陸軍一邊把音量開到最大聽著重金屬樂，一邊開著M1艾布蘭主力戰車向伊拉克的費盧傑(Falloudja)猛烈進攻。西方是在蒙古大草原上迷路的觀光客，一邊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一邊緊捏著手中的信用卡，彷彿這是他最後的一線生機。西方是為了夾殺商場對手而去上圍棋課的企業主管。西方是在流行服飾、潤膚乳液、年輕男孩之中追求幸福的年輕女孩。西方是來自瑞士的人權運動者，忙著到世界各地表達和抗爭者團結一致的決心，只不過他總是在抗爭失敗了才出現。西方是不在意擁有多少政治自由的西班牙人，他只要有性愛自由就夠了。西方是對現代藝術如癡如醉的

藝術愛好者，從超現實主義到維也納行動主義都被他奉為天才，因為這些藝術家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比賽誰能對準文明的臉吐痰。最後，西方是在佛教裡發現意識控制理論的系統工程師，是在印度哲學裡為了他的最新發現找靈感的量子物理學家。

西方是用盡種種詭計，才從各種關於西方沒落的預言存活下來的文明。就像資產階級勢必否認資產階級是一種階級，這樣才能從工人到大老闆、再到整個社會都被中產階級化。就像資本勢必得先以新資關係的名義犧牲奉獻，才能獲得認可成為最主要的社會關係，以至於如今除了經濟資本之外，我們還要有文化資本和健康資本。就像基督教勢必得先以宗教信仰的態度犧牲奉獻，才能成為一種獲得永生的情感結構、一種對人性和同情心囉嗦個沒完的教誨、一種只有對軟弱的人才有用的命令。就像以上種種，西方先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創造具有獨特性的文明，才能強迫世人接受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它的詭計可以概述如下：一個即將潰散的整體犧牲了它的內容，以便讓它的形式得到永生。

原子化成碎片一般的個人得救了，因為心理諮商的「靈性」療法讓他看

起來還像個完整的人。父權體制得救了，因為它讓女人同樣充滿了最糟糕的陽剛特質：意志力、自我控制、冷漠無情。分崩離析的社會得救了，因為社交和娛樂就像一種傳染病蔓延開來。這一切純屬於西方過時的虛構，它用來維持性命的招術也在一點一點地瓦解自己。

根本就沒有「文明衝突」這回事。我們有的只是一種臨床上呈現死亡狀態的文明，它必須靠人工儀器才能維持生命，全地球的空氣中都散播著它身上的惡臭和瘟疫。到了這個地步，連它也無法相信自己還有任何「價值」了，所有對它的肯定反而都會被它當作下流的行為，或是一種挑釁，必須加以拆除、解構，回復到一切皆可疑的狀態。今天的西方帝國主義就是相對主義，就是「你有你的觀點我有我的觀點」，就是只敢斜眼瞪人，對於那些愚蠢、原始、自大到以為還有什麼可以相信、隨便什麼都予以肯定的人即使氣得要命也沒轍。這種相對主義就是把問題變成一種教條，是學院裡的知識分子和文學教授彼此像共犯一樣地眨眼睛。後現代的理論家根本沒有任何激進的批判，他們的批判只不過是把現成的虛無和不確定感打包起來。過

去一個世紀，最要不得的是囂張地為否定而否定，而今天，最可恥的就是堅定不移的肯定。

沒有任何社會秩序可以持久地建立在一切皆非的原則上。於是，我們只能儘量小心。我們今天把「安全」的概念運用在每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我們希望將每個場所、每個行為，甚至每個人，固定在一個其實誰也不會服從的理想秩序裡。對於世界，「一切都不是真的」等於什麼也沒說，但是對於西方的真實概念，這句話卻道盡了一切。西方人所理解的真實，並不是一種生命或物體的屬性，而是生命或物體被再現的狀態。只要事物的再現和我們的經驗相吻合，那就是真實的。科學就是這種普遍真理驗證法的最後帝國。問題是，一切最平凡無奇和最值得探究的人類行為，都是建立在一個無法被均質化的事實基礎上，一切實踐活動的起點，都是一種事物和再現無法被區分的狀態，因此，一切生命都包含了某種西方的概念所無法理解的真實成分。當然，西方人也會說某個人很「真實」，不過十之八九是用來嘲笑那個人太天真。正因如此，被殖民者眼中的西方人一律都是騙子和偽君

警察和哲學只是表面上看起來有所不同，其實它們是西方知識的兩種方法。

子。正因如此，人們所羨慕的不是西方人，而是西方人所擁有的東西，例如先進科技——而西方人只配被別人鄙視而已。我們無法在中學裡教學生薩德(Sade)、尼采和亞陶(Artaud)，自己卻不先把這種西方式的真實觀念廢除掉。沒完沒了地抵制一切斷然的肯定，小心翼翼地防範一切終將浮現的確定感，這就是西方知識分子經年累月在做的事。警察和哲學只是表面上看起來有所不同罷了，其實它們是西方知識的兩種方法。

不難理解，這種相對性的帝國主義很容易在隨便任何一種空洞的教條主義、列寧馬克斯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新納粹主義裡，找到適合它的對手：它們全都像西方人一樣，混淆了肯定和挑釁。

在現階段，就連最嚴肅的社會論戰都不願意承認，我們面對的不是社會

危機，而是文明滅亡；這使得這些爭論自己淪為文明的共犯，只為了讓文明天長地久。社會論戰甚至成為時下的一種策略，表面上是批判社會，事實上是徒勞地挽救文明。

情況就是如此。我們身上揹著一具屍體，但我們無法就這樣擺脫它。其實，我們不必等到文明正式結束，等到有人正式宣判它的死亡。文明是否已死，那是只有歷史學家才會感興趣的問題。歷史學家要尋找的是事實，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決定。事實是一種修辭技巧，決定是一種政治行動。讓我們決定文明已死，連同它的死法也包括在內：只有決定，才能將我們背上的屍體卸下。

Deuxième partie

第二部 為新世界而戰

EN ROUTE!

上路吧！

六十年來的生活，
已經將我們麻痺，
削弱我們對現實的決斷力。
不需期待、憤怒，
我們處於文明崩塌當中，
現在必須拿定主意了。

革命，我們甚至不再知道它們是從何而起。六十年來的和平[1]與對於歷史性動亂的暫時懸置，六十年來民主的麻醉與對於事件的管控，都削弱了我們對現實的某些直斷感知以及對當前戰事的感受。我們必須尋回這種感知，一切才能開始。

沒有什麼好再憤怒的，對於那一條這五年來公然違憲的《日常安全法》[2]。要合法地對法律框架內部徹頭徹尾的破裂提出異議是無用的。因此，我們必須組織起來。

沒有什麼好再參與的，無論是在這個或那個公民團體中、在極左派這個或那個死胡同中，或是在最終的聯合騙局裡。所有聲稱反對現有秩序的組織，它們自己更像受到操縱的傀儡般，具有微型國家的形式、習慣和語言。所有想以「另一種方式從事政治」的企圖，迄今為止，除了無限期延長這些偽狀態之外，別無貢獻。

沒有什麼好再回應的，對於每日的新聞。但必須瞭解，每項資訊都像是在懷有敵意的策略下進行的一種操作，等待著被解譯。這種操作正企圖在此處或彼處，引發某種類型的回應。而我們必須視這種操作為包藏在這些新聞

1 編註：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後距今已過了六十年。

2 編註：二〇〇一年法國實施《日常安全法》（loi sur la Sécurité quotidienne），此法案係因應九一一後國際反恐氛圍所訂，其賦予了政府機關更大的干預權力。

下真正的訊息。

沒有什麼好再期待的——天光乍晴、革命、核子啟示或一場社會運動。持續等待下去是一種瘋狂。這場災難不是即將來臨，而是已經存在那裡了。我們已經處於文明崩塌當中，現在必須拿定主意了。

不再等待，這是某種進入革命邏輯的方法。這是在我們統治者的聲音中，重新去聽見恐懼發出的輕微震顫——恐懼從未離他們而去。政府從來都以萬千託辭去推遲你加入人群的時刻，而他們的行為從來都只有一種目的，就是為了不要失去對人民的控制。

我們從一個極端孤立的點出發，極端的無奈。一切都等著透過革命程序來建立。一切似乎都比革命更有可能發生，但是，沒有什麼比革命更加必要。

SE TROUVER

聚首

在我們身邊發生、經歷的才是真理，

而對真理的堅持終能讓我們找到朋友。

當人們聚首、相處融洽並決定一起結伴而行，

這個過程就是公社。

當某些人擺脫個人束縛，開始一切只靠他們自己、

開始衡量他們在現實中的實力時，公社就慢慢成形。

專注於我們所經歷的，以此為真。由此開始

一次相遇、一個發現、一場大型罷工活動、一場地震：所有這些事件都是從真實中產生，同時改變著我們在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相反地，那些於我們顯得無關緊要的、不會改變我們的，也不會牽涉任何事物的某個客觀狀態，根本不配獲得真理之名。在每一個動作、每一次實踐、每一段關係、每一種情況的背後，都有一個潛在的真相，儘管我們習慣去規避、管理造成這個時代中許多特有的偏離狀態之事，但事實上，所有事息息相關。生活在謊言裡的感覺也是一個真相。這意謂著不要放棄，甚至就由此出發。真理不是對於世界的一個觀點，而是使我們與世界緊密連結之物。真理不是我們掌握的某物，而是撐持著我們的東西。它創造了我又將我拆解，構建了我並將我析離成為一個個個體，它離我很遠，但透過了經歷與我相連。

依附其中的單獨個體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他的某些同伴。事實上，所有的革命程序都是從一個我們絕不放棄的真理開始。在八〇年代的漢堡，曾經有

少數居民占據了一棟房子，並且決定，此後若要驅逐他們就必須從他們身上輾過。我們見到被坦克和直升機包圍的街區、持續好幾天的巷戰、浩大的遊行——以及最終舉白旗的市長。喬治・甘廣（Georges Guingouin），「法國首位馬基團員[1]」，他的游擊生涯是從一九四〇年拒絕被占領受到肯定後展開。在當時，對於共產黨而言，他不過是一個「住在樹林裡的瘋子」——直到這些生活在樹林中的狂人變成了兩萬人，並且解放了利摩日（Limoges）這個地區。

在所有政治情誼之前，不要退縮

關於情誼，我們被灌輸的是一個中立的概念，像是一種無關緊要的情感。然而，所有情感的投合都是在一個共同真理中的投合。所有的相遇都是在一個相互肯定中的相遇，甚至是對破壞的肯定。在一個堅持不放棄某些東西、而經常性地導致失業的時代，或是為了工作必須說謊、接著又為了維護謊言而工作的時代，人們的互相聯繫並不是無意的。有些人從量子物理學

1 譯註：馬基團員（Maquisard）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對抗德國的反納粹游擊隊隊員。

出發，發誓要找出各個領域中的所有相關影響；這些人聯繫的方式，並不會比那些領導反對農產品加工多國化運動的同志們更少政治意味。遲早，他們都將被帶往叛逃，以及戰鬥。

勞工運動的先驅先後有了工作室和工廠可供聚首。他們透過罷工來自我肯定，同時揭穿那些破壞罷工的人。他們那些引起資本主義政黨與工黨爭端的薪資收入，足以聯繫全球各處的支持者與戰線。而我們，有全部的社會空間可以聚首。我們可以透過那些桀敖不馴的日常行為自我肯定，並揭穿那些破壞的人。我們對這個文明的厭惡，足以聯繫全球各處的支持者與戰線。

不要期待組織。不要信任所有現存的圈子，並且不要成為其中之一

在徹底退出的過程當中，人們相信組織的情況並不少見：政治組織、工會組織、人道組織、協會等等。甚至我們可能會去相信某些誠懇卻絕望的人，或者熱情卻狡猾的人。組織的吸引力在於它們表面上的穩定可靠——它

們都有一段歷史、一處總部、一個名字、許多資產、一位領袖、一套策略及一部論述。然而，它們當中空洞的架構，就像它們要移植對其英雄起源的尊敬時、所遭遇的障礙一樣多。對所有的事，就像對它們的每個層級一樣，組織關心的首在於它們能夠像組織般地生存，別無其他。而它們一再的背棄，常常使它們喪失了與自己基礎的聯繫。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在當中有時可以遇到幾位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在相遇時所得的承諾，只有在組織以外的地方才得以實現，而且必然地，是反組織的。

更可怕的是各種圈子，以它們的軟性質地、它們的八卦和非正式的階級結構存在。所有的圈子都該避離。它們當中的每一個都像被指派用來壓制真相。文藝界用來壓制書寫的事實。自由主義的圈子壓抑直接的行動。科學界要人們記住，從今起他們的研究牽涉最廣最多。體育界則致力在其場館中展演生活的各種不同樣貌，而不是去發揚不同形式的運動。特別要遠離的是文

組織關心的首在於它們能夠像組織般地生存，別無其他。

化圈和工會圈子。它們是兩個葬身之所，傳統上所有的革命慾望都在那裡受到壓制。文化圈的任務是找出剛開始形成的力量所在，一面展示它自己，一面向你詐取你作為的意義。工會圈子的任務則是奪走你行動的活力。工會在整個法國領土上延展它們的網絡，然後齊聚在一條路上：所有一切都將成為革命性的。然而它們擁有的只是多次的失敗，以及它們所設想的苦澀。它們的耗損，如同過多的無力感，都使它們不再能夠掌握現狀的可能性。此外，它們對於這些也談論得太多了，以至於產生了一種不幸的消極態度；這樣的情況使它們在治安上顯得很不可靠。既然在它們身上期望什麼都是徒勞無用的，那為它們的僵化感到失望就太愚蠢了。就讓它們自行毀滅吧。

所有的圈子都是反革命的，因為他們唯一從事的，就只是保持其差勁的舒適性。

建構公社

公社，是當人們聚首、相處融洽並決定一起結伴而行的過程。公社，也

許是在離群已成為常見情形的時刻開始的。在令人窒息的嚴峻情勢下存留下來的，是相聚的快樂。也就是它讓人們言稱「我們」，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不是互相瞭解的人們組成公社，而是他們仍舊維持著分離的狀態。為什麼公社不會不斷地無限繁衍？它不會在每個工廠、每條街道、每個村落、每所學校裡無盡繁衍，直到作為基礎的委員會有重大影響力！而是接受它原本、原處的狀態。然而如果可能，衍生的公社將會取代社會機構：家庭、學校、工會、體育俱樂部等。因為，在純粹的政治活動之外，公社也無懼於組織起來，為了成員以及所有圍繞著他們的迷途者、因物質上或道德上的生存而行動。公社不會用內部和外部來自我定義——像一些團體普遍會做的一樣——它的定義是透過它們之間的聯結密度。不是由組成的人，而是由領導這些人的精神來定義。

當某些人擺脫個人束縛，開始一切只靠他們自己、開始衡量他們在現實中的實力時，公社就慢慢成形。所有自然發生的罷工都是一種公社，所有在正當基礎上由群體居住的房舍都是公社。一九六八年的行動委員會[2]，正如當年美國逃亡的黑奴組成的村落[3]，或是如一九七七年義大利博洛尼亞

2 編註：此處應係指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革命中成立的各個行動委員會。

3 譯註：美國實施奴隸制度時期，逃離僱主的黑奴（esclaves marrons），群居在山林深處，組成聚落，在當中維持著非洲住民的生活方式及語言。

（Bologne）的艾莉絲電台[4]一樣，都是公社。所有的公社都尋求成為自己的基礎，它希望解決基本需求的問題，它想摧毀所有政治上的拘束、如同毀棄所有經濟上的依賴；而當失去與奠基它的真理的聯繫時，它便退散回環境當中。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公社可以組織，不必等待人數、金援，更不必等待從不會降臨的「適當時機」。

4 編註：艾莉絲電台（radio Alice）係一九七七年義大利左派運動中的一個地下電台。

S'ORGANISER

組織起來

公社，會改變工作與生活的關係，
會盡可能為每個人釋放最多的自由時間。
不是不需要工作，而是不需要為生活而工作。
自由時間讓我們去學習，一切關於社會生活的直覺。
然後以生活實踐開始建立國家看不到的地域，
並且建立起統治者看不到的身分。

組織起來，不再需要工作

清閒的差事並不多，而且事實上，我們在當中只覺得無聊，往往浪費了太多時間。更何況，這些工作還以乏善可陳的午睡和閱讀著稱。

我們知道，個體的存在僅為了賺取他的生活，他必須以他的時間來交換些許的社會存在。從個人時間，到社會存在：這裡意謂著工作、意謂著交換市場。公社的時間一舉逃避了工作，它不靠取巧的手段運作，寧願用另一種方式。阿根廷的糾察隊(piqueteros)[1]集體實施一種局部性的基本工資，條件是必須工作數個小時。但他們並不累計工時，而是將他們的收入匯集公用，以設立服裝店、麵包店，建設他們需要的花園。

為了公社，我們需要資金，但絕不必要為了賺取生活而工作。所有的公社都有它們的祕密金庫。手段是多樣的。除了基本工資，還有各種補助、疾病救助、進修獎學金、流產保險金、各式的非法交易；更多其他獲取資金的方法，會隨著每一次控制權的移轉而誕生。我們不需要為這些手段辯護，也不必將自己置於這些資產的庇護之下，或是將它們保留在內部成為圈內

1 譯註：係為一九九〇年代末期，阿根廷被解僱的工人發起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發的全國大遊行，導致了阿根廷總統在二〇〇一年下台。

人的特權。我們必須去培養、傳播的重點是，將這些不當行為視為必要的機制，並分享其中創新的部分。對於公社而言，工作只是為了增加其他收入。另外也不要忘了，這些過程中的某些工作、訓練或適當的職務，可以使我們獲得有用的知識。

公社的要求，是盡可能為每個人釋放最多的自由時間。這樣的要求，不僅僅考慮不受工資剝削的時數。自由時間並不都是假期。清閒的時間、停工的時間、無所事事的時間以及對於無所事事的害怕，這些都是工作時間。現在，不再需要去填滿時間，而是去釋放任何「時間」都沒有的能量。路線逐漸顯露、明確，我們可以從容不迫地跟隨它，直到盡頭，直到看著它們與其他路線交會。

——公社的要求，是盡可能為每個人釋放最多的自由時間。

盜竊、培育、製造

歐洲金屬公司（Metaleurop）的前輩們願意當強盜勝於擔任獄警。[2]法國電力公司的員工將如何透過電錶作假的祕密傳授給他們的親友。「從貨車上掉下來」的商品被到處轉賣。一個如此公開宣揚自己厚顏無恥的世界，不能期待無產者能夠多麼誠實正直。

一方面，公社不能指望永恆的「福利國家」；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依靠著偷竊商品、回收超級市場垃圾桶裡的東西、暗夜裡在工業區的倉庫裡找東西、侵占救濟款、誆騙保險金以及其他的詐欺方式——簡言之就是盜竊——而長存下去。它應該關心於如何保持自身組織在程度及廣度上的不斷增長。那麼在一座工廠關閉時將車床、銑床、影印機削價出售，再用來策畫某些對抗商業化社會的計謀，沒有什麼比這些更合乎邏輯了。

今日，即將崩潰的感覺如此鮮明地無所不在，以至於在建設、能源、材料、非法活動或農業各方面進行的實驗不勝枚舉。這裡有一整套的知識與技術，等待著被剽竊、被揭除它道德上的包裝。但這套知識不過是所有

2 譯註：歐洲金屬公司是法國一家專門從事生產、加工和利用非鐵金屬的公司。二〇〇三年時無預警地遣散八百三十名工人，引發一連串爭議，並留下一塊污染嚴重的土地。

直覺、才能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打算在都會荒漠中再移入住民，並且保障他們在革命期中的生存能力，我們必須要好好運用貧民窟特有的巧思。

如何在一個流動全面中斷的情況下生活及互相溝通？如何恢復農村地區的糧食種植，直到他們能再次支持六十年來的人口密度？如何將水泥空間轉換成城市林園，像古巴為了在美國的封鎖和蘇聯的清算下維持下去所做的那樣？

培訓與養成

我們在商業民主的許可下如此消遣娛樂，現在我們還剩下什麼呢？是什麼促使我們在某天決定星期天早上去跑步？如果不是為了消磨閒暇時光、重建起工作的力氣或者「健康資本」，那又是什麼在支持著空手道的狂熱擁戴者、自己動手做、釣魚或者真菌學的愛好者？大部分的消遣娛樂都能夠輕易地擺脫它們荒謬的特性，變成娛樂以外的東西。拳擊並不是一直都是為

了在Téléthon[3]這個節目上示範演出，或是為了提供場面華麗的比賽。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處於被野蠻的移民瓜分及長時間的乾旱所帶來的飢餓當中，出現了不可計數的、由貧困農民組織起的露天拳擊俱樂部，想要奪回他們被富人或殖民者掠奪的東西。這就是義和團起義。學習和實踐我們在動亂、難以預料的時代所需要的，從來都不會太早。在現在，對於大城市的依賴——依賴它的醫學、它的農業、它的警政——使我們無法攻擊它而不危及我們自己。意識到這種脆弱性，即使未明言，也使我們對於當前的社會運動自發地自我設限，這引起了對於危機的畏懼和對於「安全」的想望。因為這樣，能工者以革命的前途換取回歸正常生活的前景。要擺脫這個命運，需要經過長時間不斷地大量、多方面學習與實驗。這意謂著要知道如何戰鬥、撬開門鎖、治療骨折及咽喉炎、建造地下電台發射器、在街道上煮食供餐、瞄準目標，以及匯集散亂的知識來建構戰爭農藝學、瞭解浮游生物的生物學、土壤的組成、研究植物間的關聯，從而尋回已失去的直覺：關於一切社會生活、關於與我們所處環境的一切可能連結、關於我們依存的環境的界限。這一切就從今天開始，從今天及為了那些我們必須得到的食物

[3] 編註：Téléthon為法國大型馬拉松式現場節目。

和生活所需要比象徵部分更多的日子。

建立地域。複製難以界定的地區

今天，愈來愈多的改革派同意，「石油危機將至」和「為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要「將經濟重新局限」，以便助於地區性的民生物資供給、縮短管銷距離、放棄從遠地進口的便利性等等。然而他們忘記的是，所有地區性經濟的本質都是地下化、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這個將經濟重新局限的簡單生態措施，意味著絲毫無法擺脫國家控制，或無保留地服從它。

現今的地域劃分是幾個世紀以來警政行動的產物。人民被驅離他們的田舍、他們的街道，然後是他們的街區，最後是他們的住所大廳，瘋狂地希望將全部生活囊括在維繫隱私的四堵牆內。關於地域的問題，對我們與對國家而言是不同的。這不意謂著要保留地域。而是意謂著地區性地增加公社、交通和互助機構的密度，期使對權力當局而言，地域變得看不見、難以界定。這無關占領，而就是地域。

每個生活實踐都會產生一個地域——進行交易的地域或狩獵的地域，兒童嬉遊的地域、戀人們或暴動的地域，農民、鳥類學家或漫遊者的地域。規則很簡單：當與某一特定區域重疊的地域愈多，它們之間的交流就更多，而權力能左右的就更少。小酒館、印刷廠、運動中心、住宅區間的空地、舊書攤、建築物天台、流動市場、烤羊肉串的攤位、車庫，都可以很容易地擺脫他們的正式身分，只要他能夠找到足夠的同謀。地區性的自我組織，在將自己的地理學與國家制定的地圖學重疊時，會擾亂後者、或將它消除。它則會產生自己的分裂。

旅行。規畫我們自己的溝通路線

公社的原則，並不是將城市及它的流動性對立於在地區的生根和緩慢的速度。組建公社的擴張運動應該同時也是城市的建構運動。我們不反對商業設施所提供的交通和通訊的可能性，僅僅要知道其局限性。在當中只要足夠謹慎，也就沒有什麼危險。互相拜訪更是安全、不留痕跡，並且能夠建立起

比任何網際網路上的聯絡人名單更堅固的聯繫。我們當中某些人被賦予的特權，是可以在整個歐洲大陸「自由行動」，以及在全世界自由行動而不會遭遇太多問題。這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手段，可以聯繫共謀的家庭。允許美國人、希臘人、墨西哥人和德國人悄悄地在巴黎重新回到共謀策略的時光，這是大都市的好處之一。

友好的公社之間經常性的交流，是防止它們枯竭及步向放棄命運的方式之一。接待同志、與他們保持聯絡並瞭解他們的創舉、思考他們的經驗、補充他們已經掌握的技術，這些對公社而言，都比那些偷偷進行、對意識的無效檢查更有價值。如果低估了在過去的這些夜晚、我們對當前戰事的意見進行交換時所發展出的決定性想法，那將是錯誤的。

逐步地推翻所有的障礙

眾所皆知，街道上充斥著缺乏公民品質的粗野行為。在真正的劣行與即將成為的劣行之間，有一股所有憲警形成的向心力，竭盡所能地維持住秩

狂亂與政治性不應該分開來看。若沒有前者，後者便只是空談。

序；相對的則有我們，也就是相反的離心運動。我們慶幸於他們出現時的狂怒和混亂。至此，不再慶祝什麼的全國性節慶最後總是失敗收場，也就沒有什麼令人驚訝的了。光彩或崩解的都會設施——然而它是從何開始？又要在那裡結束呢？——具現了我們共同的缺乏歸屬感。耽溺在虛無中，它只要求真正地回到過去。仔細看看我們周圍：一切都等待著它的時機，城市突然瀰漫著懷舊的氣息，這種情形僅僅廢墟才有。

即使這些粗野的行為逐漸具有方法性、系統性，它們還是大量出現在分散卻有效率的游擊戰中，這使我們得以回到難以控管、缺乏紀律的原初狀態。令人的錯愕的是，缺乏紀律恰恰是參與者認可的諸多軍事法則之一。事實上，狂亂與政治性不應該分開來看。若沒有前者，後者便只是空談；而若失去了後者，前者將在嘶吼聲中筋疲力竭。「激進分子」或「狂熱分子」這些語詞再次出現在政治上，並非沒有恫嚇之意。

關於方法，我們從怠工中、行動中獲取的原則如下：在最低的風險下行動，在最短的時間，造成最嚴重的破壞。關於策略，我們記得，一個被翻轉但未被壓制的障礙——例如一個被解放但無人入住的空間——很容易被另一個更堅實、且爭議較少的障礙取代。

不必再強調工人怠工的三種形式：減緩工作速度、從「有節制的行動」到「合法罷工」；毀損機器，或妨礙它的運轉；最後是洩漏企業機密。如果將層面擴大到社會工廠，怠工的原則對於從生產到流通的各方面也都適用。大城市的技術設備很容易受到攻擊：它的流動並不僅止於運載人們以及貨物，資訊和能量也透過網絡、光纖、管道等傳布著，要攻擊是可能的。阻礙社會機器的運作，必須承擔某些後果，在今天意味著重新獲得、重新創造阻斷網絡的方法。如何使高鐵路線、電力網絡無法被使用？如何找到電腦網路的弱點？如何擾亂電波以及使電視螢幕變白？

至於重要的障礙，認為不可能破壞它的這個想法是錯誤的。這其中的理想主義精神，將歸結為一種對戰爭的適應。西元前三百五十六年，

艾羅斯特拉特（Erostrate）放火焚毀了世界上七大奇蹟之一的阿泰米斯神廟（Artémis）。在我們這個徹底衰退的時代，這些神廟不再壯觀，只剩下可悲的事實：它們已經是廢墟了。

滅絕這種虛無感只是一件令人難過的工作。然而執行這個滅絕，將重新獲得新的活力。一切都有意義，一切突然間都組織起來，無論是空間、時間或情誼。用盡一切方法，找回社會經驗——我們只是標示出方向。在時代的苦難中，「遊戲人間」也許代表著——我們得承認，並非毫無道理——最後的集體誘惑。

使自己不被看見。將無名人士移置於戰鬥位置

在一場示威遊行中，一個工會人士摘下一位不知名人士的面具——他剛剛才打破一面櫥窗——並且說：「與其將自己藏起來，不如承擔起你的行為。」使自己被看見、也就是等著被發現，首先便是容易受到攻擊。所有國家的左派人士，不停地讓他們的主張——關於流浪漢、家庭主婦、非法居

留者的主張——「能被看見」、希望能因此得到支持，但他們所做的正好與他們該做的相反。不讓自己被看見，而將無名人士在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移置於我們曾被驅離的地方，並且透過共謀、夜間行動或祕密行動，安排一個無懈可擊的攻擊位置。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縱火行動提供了一個範本。沒有領導者、沒有請願、沒有組織，然而有發言、有動作、有共謀的人。在社會上什麼都不是並非一種屈辱、無人承認的悲劇——被誰承認？——相反地，是最大的行動自由。不用為他所造成的危害負責，只要利用縮寫符號——我們還記得曇花一現的塔特黑社會住宅的反警察大隊BAFT（Brigade Anti-Flic des Tarterêts）——將自己貼上這些字母縮寫，就是一種保障自由的方法。顯然，建構出一個稱為「郊區」的主體、作為「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暴動」的主事者，是統治機關最初的防禦性手段之一。只要看看這個社會中大人物的樣貌，也許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做為無名小卒的快樂。

使自己不被看見。但一股聚集在陰影中的力量永遠無法迴避。這意謂著我們的出現將被視為一股力量，在適當的時機我們才會站出來。因為我們被看見時刻愈晚，這股力量也就愈強。一旦被看見了，我們也進入倒數

我們被看見時刻愈晚，這股力量也就愈強。一旦被看見了，我們也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

計時的階段。若非在短期內使他的統治灰飛煙滅，那麼就是他毫不遲疑地將我們粉碎。

組織起自衛行動

我們生活在警察的占領之下。在大街上對於非法居留者的公然襲擊、未標記的汽車在道路上來來往往、以沿襲自殖民地統治的方法來維持城市街區的平靜，內政部長對抗「幫派」的宣言像是回到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一切每天都在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警察的占領之下。我們有足夠的動機不再讓自己被壓垮，我們有足夠的動機展開自衛行動。

隨著公社的壯大與擴展，權力運作逐漸地將它的組成視為目標。這些反擊以誘惑、操縱，並在最終以暴力的方式展現。對公社而言，自我防衛對團

體來說應該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無論是在理論或實踐方面。閃避逮捕行動、迅速集結眾人以對抗驅逐的企圖、保護我們當中的人，這些在即將來臨的時刻，都是有用的應對方式。我們不能不停地重建我們的基礎。當我們不再譴責鎮壓，我們就在為反鎮壓做準備。

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隨著對群眾中警察工作——從告發到暫時性的僱用民兵——增加的期待，警察的武力逐漸深入人群。即使是在騷亂的情況下，警察通用的介入方式就是便衣警察。在上一次《首次聘僱就業法案》的遊行中，警察的效能便是來自這些混雜在人群中的便衣，他們等待事件發生時再揭露身分：然後便是瓦斯、警棍、逮捕。這一切都與工會的糾察隊協調好了。只要他們可能現身，便足以在示威者中引起疑懼：誰是誰？並因而癱瘓整個行動。因為示威遊行並不是為了展現重要性，而是一種應對的方式，我們因此具有揭發、驅離便衣，或者在萬一有必要時，救回他們企圖逮捕的人的方法。

警察在街道上並非無敵，只是他們有辦法進行組織、訓練，以及可以不斷嘗試新式武器。相較之下，我們的武器始終是簡陋的、拼湊起來的，而且

在使用當下常常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這些武器無論如何都不是為了競爭火力大小，而是用來保持距離、轉移注意力、施加心理壓力，或者出奇不意地攻打出一條通道，取得進展。在城市游擊戰中，法國憲警備戰中心的所有創新方法，明顯地不足以、也永遠不會足以迅速應付同時在許多地區出擊、總是力求保持主動的移動式攻擊。

公社在犯罪偵查科與情報局的監視與偵查之下，顯然容易受到攻擊。在義大利對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在美國對環保戰士的一波波逮捕行動，都是監聽下的產物。所有的拘留都必須做DNA採樣，然後加入愈來愈完備的檔案資料中。一個非法占據空屋的巴塞隆納人，因為他留在他所分發的傳單上的指紋，而被警察找到。整理資料檔案的方式不斷演進，尤其是眼球辨識技術。電子身分證一旦上路，我們的工作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巴黎公社部分地解決了檔案的問題：縱火的人將市政廳燒毀，再將所有記錄公民資料的檔案銷毀。現在剩下的，就是要找出可以永久消除電腦資料的方法。

INSURRECTION

揭竿而起

不存在和平的起義。武力是必要的。
真正的示威抗爭必須是「野蠻的」，無需向警察局報備，
能夠選擇戰場，讓我們能夠繞過禁區並避免直接衝突。
我們還能決定路線，
牽著警察（包含工團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鼻子走，
而不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對革命同志而言，現實乃是以公社為基礎單位。也許，暴動的升高不是別的，而是各個公社的增生、溝通與連結。隨著事件的發展，各個公社將融入規模更大的實體中，或甚至自我分裂。如同兄弟姊妹般「生死與共」地緊密連結的集團，和為了在暴動時規畫物資和街區（乃至整個區域）的自衛而由各種群體、委員會和社團所形成的集團之間，只有層級的差別，但它們全都是公社，並沒有差異。

每個公社都只能追求自給自足，並在其內部認知到金錢的渺小可笑，或者說不合時宜。金錢的力量在於建立聯繫，它在缺乏聯繫者之間，將陌生人作為陌生人給連結起來，由此拉平一切的價值，讓一切流通。金錢聯繫一切的能力，其代價是這種聯繫的膚淺，其規則則是欺騙。懷疑乃是信用關係的基礎。就此而言，金錢的絕對權力永遠會是控制的絕對權力。在實務上廢除金錢，只能透過擴張公社來實現。並且應該確保公社的擴張不超過某個規模，因為一旦超過這個規模，它就會失去和自身的聯繫，而毫無例外地導致一個統治階層的興起。公社寧可分裂並由此擴展，也要避免此一悲劇性的結果。

阿爾吉利亞年輕人的起義，在二〇〇一年春天席捲整個卡比立亞

（Kabylie），幾乎占領了整個區域；他們攻擊憲兵、法院，以及所有代表國家的東西；暴動蔓延，直到執法力量單方面撤退、以及肉身阻止了選舉的進行才有歇息。運動的力量，在於其內部多樣化的組成部分間，瀰漫散逸而又互補——這通常只有在男性主宰得沒完沒了又無望的鄉村委員會，和其他的民間委員會之間，被部分地表現出來。阿爾吉利亞起義中一直蠢蠢欲動的「公社」，這一刻呈現出那些頭戴鋼盔、熱昏了頭的年輕人的面孔，在提濟烏祖（Tizi Ouzou）的屋頂朝警察投擲汽油彈；下一刻又呈現出老反抗軍掛在他連帽斗篷裡的苦笑；再下一刻又呈現出山里村婦堅毅不拔地執行傳統農業的能量——如果沒有他們，當地的經濟封鎖永遠不可能如此持續又有系統地進行。

盡其所能利用危機

「此外還得補充：我們無法處理全體法國民眾。因此我們得做出選擇。」

二〇〇五年九月七日，當禽流感疫情爆發時，一位病毒學家在《世界報》（Le

Monde)上如此做結。「恐怖主義威脅」、「自然災害」、「病毒警戒」、「社會運動」和「郊區暴力」等等，對社會的管理人而言，是多得無法勝數的不穩定時刻，讓他們只能透過揀選那些逢迎他們的人、並殲滅那些妨礙他們的人，來強化自身的力量。也因此，理所當然地，這也是所有其他力量互相集結與鞏固自身的機會，在它們選擇站到對立面之後。打斷貨物的流通、終止正常狀態——只要看到在一棟突然失去電力的建築裡，社會生活是如何回歸的，就可以想像在一個失去一切的城市裡，生活會變得怎樣——和警察控制，都能解放在其他情境下無法想像的自我組織潛力。這逃不過任何人的眼睛。具有革命性的勞工運動對此理解得一清二楚，並利用中產階級經濟的危機來集聚力量。今天，伊斯蘭教政黨最強大的時刻，是在他們了解到要聰明地彌補國家弱點的時候，也就是當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布梅爾德(Boumerdès)地震後提供援助，或是在以色列軍隊進犯後提供日常援助給黎巴嫩南部居民時。

一如我們先前所述，卡崔娜颶風在紐奧良所帶來的破壞，給了北美洲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邊緣勢力一個機會——透過團結所有拒絕被強行疏散的

人，獲致某種陌生的凝聚力。路邊食堂需要事先安排供應，緊急醫療援助則要求必要知識與物資的獲得，設立地下電台亦然。這其中所包含的喜悅、對個人獨善其身的超越，都彰顯了逃脫日常秩序和工作氛圍的具體現實，在在保證了這種經驗的政治豐富性。

在法國這樣一個國家，輻射汙染雲就停在國界上[1]，並且癌症研究中心就建立在歐盟指定需要報告有毒化學物質的前AZF[2]廠址上，顯然此處較需要考慮的不是「自然」危機而是社會危機。災難的常態過程最常在社會運動中被打斷。當然，最近這幾年的各種罷工，主要是給政府和企業管理階層機會，好測試他們維持不斷提高的「最低服務」的能力，使罷工止於純屬象徵的面向上——造成的傷害和一場暴風雪或是臥軌自殺相比，多不了多少。藉由撼動體制化的行動實踐，以及透過有系統地占領各機構和頑強的封鎖線，中學生在二〇〇五年的抗爭和《首次聘僱就業法案》的抗爭提醒了我們，大型運動破壞秩序和散播攻擊的能力。透過所有在其航線中所誕生的團體，我們瞥見了在什麼條件下，運動可以成為新公社湧現的場所。

1 譯註：這句話出自車諾比核電廠爆炸後，法國專家當時曾經說過，輻射汙染雲飄到法國邊界就會停止。

2 譯註：AZF，法國化學肥料工廠，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爆炸，除了二十九死兩千五百人傷的慘劇外，並造成有毒物質外洩。

破壞所有代表性機構。

推展街頭集會。

廢除代表大會

確切地說，早在與警力對峙前，所有社會運動遇到的第一個障礙，來自於兩股勢力：工會，和其他所有坐在小辦公室裡打著領帶、職業是領導和管理抗爭的人。公社、底層團隊和組織會本能地防備他們。這也是為何二十多年來，這些官僚主義反對者創造出一些因為不帶標籤而看似較為天真的的協調委員會，但事實上這些都是他們的演練場所。當一個迷途的群體試圖獲得自治時，他們只會透過堅定地排除真正的問題來停止清空自己。他們發狂，腦子發熱：不是為了對論辯的熱情，而是為了某種對辯論的迴避——出於其職業需要。而當他們那被冷漠所掮起的辯護總算在總體上有道理時，他們卻以政治意識的缺乏來解釋其失敗。必須這麼說：在法國，青年革命擁護者並不欠缺政治操弄的藝術，這顯然應歸功於托派[3]信徒各個不同分支的狂熱活動。但他們顯然無法在二〇〇五年的動亂中記取如下的

3 編註：托派（trotskistes），為托洛茨基派的簡稱，為馬克思主義下的一個派別。

教訓：只要有協調存在，就不需要協調；在已經自我組織的地方，組織就多餘了。

另一個反射動作是，連在最小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也開代表大會並進行投票。這是一個錯誤。一個簡單的投票和決定贏家的作法，都足以將大會變成一場惡夢，變成權力競逐對抗的舞台。在此我們承受的是資產階級國會式的錯誤範例。會議並非為了取得決定而設置，而是為了得以彼此闊談，令言論無目的地自由展現。

在人類的習性中，彼此聚集的需求，大概和決策的必要性之罕見一樣真切。彼此聚合回應了感受某種集體力量的快樂。決定只在某些緊急情況下是重要的，而在這些情況下實行民主無論如何都只是一種折衷的方式。在其他情況下，「決策過程的民主性」就只是狂熱的程序主義者的問題。這不在於批判大會或是廢除大會，而是在於解放其言論、姿態和個體之間的互動。只

只要有協調存在，就不需要協調；在已經自我組織的地方，組織就多餘了。

需要看到每個來參加大會的人不只是帶著他們的觀點和提案到場，還帶著他們的慾望、連結、能力、力量、悲傷，以及對他人的某種敞開，就可以明白。如果我們能夠撕碎這種對代表大會的幻想、代之以一種出席性集會（*assemblée des présences*），如果我們能擊退權威不斷重生的誘惑，如果我們能停止將決策當作終點，就有機會在我們之間產生某種大眾結合——某種集體結晶的現象——此時決策便能掌握個體，不論是其整體或僅只是部分。

這對於行動的決策而言也是同樣道理。因為若從「行動應當指導集會議程」的原則出發，將讓激烈的辯論和有效的行動變得不可能。一個由彼此陌生的人聚集而成的大型集會，必然會要求專業的行動，亦即，為了控制的需要而放棄行動。一方面，代表們依定義會阻礙他們自己的行動，另一方面，沒有什麼能妨礙他們欺騙任何人。

以形式而言並不存在理想的行動。重要的是行動會塑造形式，它會讓形式浮現，而非強加一個形式在行動上。這代表了站在相同的政治和地緣立場——像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巴黎公社地區——以及共享知識的流通。對於行動的決策而言，原則如下：每個人都自行出發偵查，訊息被統整後，決

策會自己來到我們身邊，而非我們做出決策。知識的流通會消除階序差異，從高處獲致平等。讓橫向溝通不斷增加，這是不同公社之間的最佳協調形式，以終結權威。

封鎖經濟，以我們自我組織的程度衡量我們阻擋的力量

二〇〇六年六月底，整個瓦哈卡州（Oaxaca）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市政府站領行動，反抗者占據了大型公共建築。在某些市鎮，市長遭到驅逐，公家車被徵收。一個月後，某些前往旅館和遊客住宿區的通道被阻斷。墨西哥的旅遊部長說這是「可與威爾馬颶風[4]相較」的災難。早在幾年前，封鎖就成了阿根廷反抗運動最主要的行動形式之一，不同的地方團體互相支援，封鎖這條或那條主要幹道，並透過共同行動持續威脅要癱瘓整個國家——如果他們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數年來，這樣的威脅在鐵路工人、卡車司機和電氣供應工人的手裡，是有力的手段。在法國，反對《首次聘僱就業法案》的運動中，在封鎖火車站、外環道路、工廠、高速公路、超商甚至是機

4 編註：威爾馬（Wilma）颶風，為二〇〇五年大西洋的一個超大型颶風。

場上，毫不遲疑手軟。在雷恩市，只需不到三百人，就將主要幹道封鎖了好幾個小時，並造成了四十公里長的交通阻塞。

封鎖一切，這是現今所有起身反抗現存秩序者的第一個反應。在一個去地方化的經濟中，公司運作分秒不差，價值衍生於與網絡的連接中，高速公路是非物質化的生產線上的一個環節，從外包商到外包商、直到另一個工廠組裝，因此，封鎖流通也就是封鎖生產。

但封鎖的有效程度，只能和反抗者的自給能力與溝通能力相當，只能和不同公社間有效的自我組織程度相當。一旦所有事物都被癱瘓，該如何餵飽自己？搬空店家，像是阿根廷反抗運動的情況，這有其限度；儘管消費的聖殿無比巨大，卻仍不是無底的食物儲藏室。在這段時期中，獲得某種能力好提供一個人自己基本的生存所需，這意謂著擁有生產這些東西所需的方法。在這一點上，再等待下去似乎毫無用處。讓百分之二的人為所有其他人生產糧食——今日的處境便是如此——這是歷史與策略上的荒誕。

將領土從警察的占領中解放出來。盡量避免直接對抗

「這件事表明了，我們面對的不是對社會有更多要求的年輕人，而是對共和國宣戰的個人。」一位清醒的警察對最近的衝突如此說明。從警察的占領中解放領土的攻勢已經展開，而這波攻勢可以依靠現存秩序所積聚的反對力量本身所保存的怨憤。就連「社會運動」本身都一步一步地被反抗行動拉攏過去，情況就像在雷恩市二〇〇五年的每週四晚上，狂歡群眾紛紛和法國鎮暴警察（CRS）發生衝突；或是在巴塞隆納，尋歡作樂者在路邊聚會（*botellion*）時掠劫破壞了一整個商業區。在反《首次聘僱就業法案》的運動中，我們持續地看到莫洛托夫雞尾酒[5]的一再出現。但在這點上，某些郊區行動仍然是難以超越的。特別是這個許久之前便流傳至今的技巧：埋伏突擊。像是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三日在艾皮內（Epinay）的那次：犯罪防治特警隊（BAC）[6]的部隊在接獲一起汽車竊盜警報後出發，當他們到達案發現場，其中一個小隊「被兩輛橫過馬路的汽車給堵住，三十多個手持鐵棍與其他武

5 譯註：即汽油彈。

6 譯註：BAC，全稱為La brigade anti-criminalité，創於一九九四年，為法國國家警察的一部分。

器的人對著警車投擲石塊，並用催淚瓦斯對抗警方。」在較小的規模上，想想那些在晚上關門時間被攻擊的各區警察局：玻璃窗被打破，警車被焚毀。

這是最近幾場運動所獲得的認識之一，即從今以後，一個真正的示威抗爭必須是「野蠻的」，無需向警察局報備。能夠選擇戰場，讓我們能夠繞過禁區並避免直接衝突，像二〇〇一年義大利熱那亞的黑塊行動[7]一樣，並且我們還能決定路線，牽著警察（包含工團主義者[8]和和平主義者）的鼻子走，而不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於是我們看到了，上千個意志堅決的個人推著整個義大利國家憲兵隊的車子後退，直到放火燒掉所有的車。重要的不是更好的武裝，而是採取主動。勇氣算不得什麼，對自身勇氣的信任才是一切。而擁有主動性對此大有幫助。

然而，一切都促使我們將直接衝突視為牽制敵對勢力的手段，讓我們得以爭取更多時間並且攻擊其他地方——甚至我們身邊。我們無法防止對抗的發生，但這不能禁止我們將其視為轉移注意力的手段。比行動更重要的，是行動必須積極涉入對方的組織協調中。騷擾警察，這是為了讓他們分散各處，而變得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效率。

7 譯註：黑塊行動（Black Bloc）是指一種新的抗爭方式，參與者全身穿上黑衣黑帽，完全包覆，並配戴盾牌與警棍，目的在避免個人特徵暴露，並造成集體印象。

8 編註：工團主義是社會主義下的一支，主張以工人團體來取代政府。

每個糾纏騷擾的行動都將復甦這個道理，一八四二年的這段話已足以說明：「一個警員的生活是痛苦的；他在社會中的位置和罪犯一樣既羞辱又受人鄙視……羞恥與侮辱從四面八方包圍他，社會將他從中逐出，像賤民一樣孤立他，將辱罵連同工資啐在他身上，而毫無愧疚、悔恨與憐憫……他放在口袋裡的警察證件是羞恥的證明書。」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示威的消防隊員用榔頭攻擊鎮暴警察，打傷了十五個。這是個提醒：「以助人為志業」永遠不會是加入警察的正當藉口。

武裝起來。但盡其所能讓武裝的用途變成多餘。面對武力，得勝之道在於政治

不存在和平的起義。武力是必要的：這是為了盡力使其用途成為多餘。起義指的是拿起武器，一種「武裝的持續性」，而不是通往武裝抗爭的過程。分清楚武裝與使用武力，對我們只有好處。武力是一種革命的常數，儘管在巨大轉變的時刻，武力的使用並不頻繁，也很少是決定性的，例如在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一七年十月[9]。當權力落入陰溝裡，跨過去就好了。

在將我們與他們分開的距離中，武器獲得了魅惑與令人厭憎這兩面特質，只能由支配它們來克服。真正的和平主義不能拒絕武力，只能拒絕使用武力。作為和平主義者卻無法開火，這只能算是陽痿的理論化。這種理論上的和平主義，對應的是一種預防性質的解除武裝，這是種純粹的警察操作。在現實中，只有對有能力開火的人才能認真地提出和平主義的問題。而在這種情況下，和平主義相反地應該是一種力量的標誌，因為只有從一種極端有力的位置，人們才能從開火的必要中被解放。

從一種策略的觀點來看，間接的、不對襯的行動，似乎是最有利、最合乎時宜的方式：我們不和職業軍隊正面交鋒。然而，伊拉克式郊區游擊隊的打法，在困境中拖延卻又無進攻的可能，這應該值得害怕而不是值得考慮。內戰的軍事化發展是起義的挫敗。紅軍在一九二一年是贏了，但俄國革命卻已然失敗。

我們必須要考慮國家兩種類型的反應。一種是公然的敵意，另一種則較

9 譯註：前者為法國大革命中，巴黎市民攻下王宮之日；次者為巴黎公社起義之日；最後則是指俄國的十月革命。

為隱晦而民主。第一種反應召喚的是直率的破壞，對第二種反應而言，則是精微而無情的敵意：它要的不是別的，而是我們的參與。我們可能會被獨裁統治打敗，也可能敗於被減弱為僅僅反對獨裁統治。挫敗存在於輸掉戰爭，也存在於輸掉開啟哪一場戰爭的選擇權。兩種都有可能，如同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所證明的：革命者被擊敗了兩次，敗在法西斯主義手上，也敗在共和國手上。[10]

當情勢變得嚴峻，軍隊就會占領地勢。交戰與否則較不確定。這需要國家做出殺戮的決定，而現在這已不過是種恫嚇，有點像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使用核子武器的恫嚇。總之，國家這隻野獸，儘管已經受傷許久，但卻仍然危險。總之，面對軍隊，需要數量龐大的群眾，進犯敵方的隊伍，並與士兵親善。我們需要一八七一年的三月十八日。軍隊上街，這就是揭竿而起的形勢。軍隊開火，大局便已底定。每個人都發現自己被要求要選邊站，在無政府與對無政府的恐懼中做選擇。起義是以政治力量獲勝的。在政治上，戰勝軍隊絕非不可能。

10 編註：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發生內戰，主要以政府軍對抗國民軍，前者有共產集團援助，後者則有納粹支持。

在地區層級廢除權力

對任何革命而言，重點是要使自身不可逆轉。不可逆性的實現，是在我們同時戰勝權威以及對權威的需求、同時戰勝財產以及對占有的體驗、同時戰勝霸權以及對霸權的渴望。這就是為什麼在革命的過程自身中便包含了其勝利的形式，或是其失敗的形式。破壞從來就不足以讓事物具有不可逆性。重要的是做的方式。有些破壞的方法絕對會刺激它所壓碎之物的回歸。猛烈追趕某一秩序之屍首的人可以肯定，這絕對會挑起復仇的志業。因此，在任何經濟被阻滯、警察失去作用的地方，重要的便是在推翻權力時，煽情越少越好。權威必須由審慎的從容與嘲諷來廢除。

在這個時代，革命中心的終結，回應著權力的去中心化。冬宮(Palais d'Hiver)是還存在，但比起反抗者，它更是設計給遊客攻擊的對象。今天，我們可以占領巴黎、羅馬，或是布宜諾斯艾利斯，而不需要向誰回報這個決定。占領杭吉斯集散市場會比占領愛麗舍宮[11]更有效。權力不再以世界

11 譯註：杭吉斯(Rungis)集散市場，據稱是全世界最大的食品集散市場；愛麗舍宮(l'Élysée)則是法國總統府所在地。

的某一點為中心聚集，權力就是這個世界本身，這世界的潮流和街道、它的人和規矩、它的密碼與技術。權力就是大都會的組織本身。它在自己的每個點上，都是這個商品世界完美的整體。同時，任何人在地方層級打敗它，都會產生出一股穿越整個星球網絡的震動波。克力奇蘇柏的暴動[12]讓不只一個美國家庭歡欣鼓舞，瓦哈卡州的反抗者在巴黎市中心也找得到同志。對法國而言，中心化權力的失落，意味著巴黎作為革命中心的結束。一九九五年的罷工之後[13]，所有的新運動都在肯定這一點。最無畏、最堅定的行動，已不再發生在巴黎。一言以蔽之，在單純作為一個暴動攻擊的目標上，如同一片純然為了遭到掠奪和攻擊的土地般，巴黎展現著它的與眾不同之處。入侵來自於他方，短促而猛烈地攻擊大都會支流網絡中最稠密之處。是這些散播著的狂怒在這個荒漠虛假的豐沛上劃下刻痕，而後消失。這樣的一天將會到來，首都可怖的權力凝結體將被完全毀棄，那將會是某個過程的終結，而這個過程將在各處以更為進步的方式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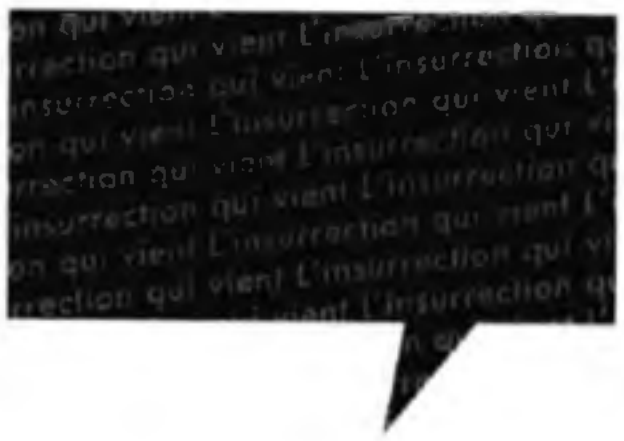
12 編註：係指二〇〇五年法國郊區暴動，克力奇蘇柏（Clichy-sous-bois）為事件導火線的兩名青少年死者的社區名稱。

13 編註：一九九五年為抗議退休金特別制度遭取消，法國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罷工。

Tout le 一切權力

pouvoir 歸於公社！

aux communes !



Postface

廣播電台不斷地向反抗者報告政府武力的撤退狀況，
一枚火箭破開了克萊沃監獄的圍牆。
已經無法確切地說「事件」開始之後，
究竟過去了幾個月還是幾年。
首相呼籲冷靜，
看來卻無比孤單。

後記

火焰燃燒的街頭……

La Rue...

在地鐵裡，我們再也看不到令人跼促不安的螢幕、如往常般妨礙行人的動作。陌生的人們彼此傾談，不再互相攻擊。同志們正在街角密商。大街上有更大的集會，正在進行嚴肅的討論。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攻擊正在展開。新的兵營被掠奪，繼之焚毀。被逐出的公寓住戶不再和市政府協商—他們直接進駐。一場清醒的發作中，一位公司經理在會議中途，殺了他為數不多的同事。文件外洩，內容包含了所有警察、憲兵以及獄卒的私人住址，導致了一波史無前例的劇烈大風吹。在鄉下的老雜貨舖酒吧，我們將生產的多餘產品帶去，並取走我們缺乏的東西。我們也聚在一起討論情勢、以及機械工作室裡需要什麼設備。廣播電台不斷地向反抗者報告政府武力的撤退狀況。一枚火箭破開了克萊沃(Clairvaux)監獄的圍牆。已經不可能確切地說究竟在「事件」開始之後，究竟過去了幾個月還是幾年。首相呼籲冷靜，看來卻無比孤單。

再版後記[1]

定調

Postface à la réédition

Mise au point

這場戰爭也是語言的戰爭。
如果人們花了如此大的力氣，以恐怖主義的理由，
將幾個年輕共產主義農夫關起來，只因為認定他們參與《革命將至》的編輯與撰寫，
這不是為了「思想罪」的罪名，
而是因為他們正代表一種行動與思想都體現在生存裡的作風，
或更確切地說，他們將字詞、行為與生活堅固地連結。

所有人都同意，事情就要鬧大了。議會場外，我們神情嚴肅或者逞好漢地承認這一切，一如昨晚在酒館裡不斷重複的，我們熱衷於風險評估。就地盤上的分區控制，我們已經作了詳細的預防性作戰計畫。那些新年慶典代表著關鍵性的轉折。「明年就不會有蠢蛋了！」為了不讓節慶被一片混亂的傳統覆蓋地黯然失色，內政部長阿利歐-馬力（Alliot-Marie）緊急派遣了三萬六千名警力和十六架直升機[2]；這位女士，在十二月的中學生示威遊行時，也曾害怕希臘暴動的傳染力，而驚惶發抖地戒備著最微不足道的徵兆。[3]在那些只是要人安心的談話背後，我們更清楚聽到的卻是，準備公開宣戰的騷亂。再沒有人能無視於它炫耀、冰冷且重實效的施行手段，它甚至不再花力氣自我介紹、說這是場調解行動。

報紙有意識地編列清單，細數這些暴起焦慮的原因。危機存在，那當然，因為有爆炸般的失業現象、一籮筐的社會方案和絕望，還有銀行交易員凱維爾或馬多夫的金融醜聞[4]。學校系統垮臺了，它不再能生產工作者，也無法將公民規格化，即使是中產階級的孩子也不受控了。大家都說，

1 編註：本篇後記係為法文版二〇一〇年再版所增。

2 編註：法國近年來於重大節日時，即會發生縱火燒車情形，二〇〇九年新年期間有高達一千一百多輛的車輛遭焚。

3 編註：前者係指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國學生為抗議教育改革而舉行的全國示威遊行；後者係指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希臘因一名少年遭警方槍殺而發生的大規模暴動。

4 編註：凱維爾（Kerviel）為法國興業銀行交易員，於二〇〇八年被控因違規交易造成銀行約五十億歐元損失；馬多夫（Madoff）為前納斯達克主席，二〇〇八年時被控以投資騙局詐騙投資人約五百億美元。

青少年的苦惱不適，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代表可以與他們相符，最好的發洩就是，焚燒汽車，並將它推向那些人們為自己方便所準備的免費腳踏車。

然而這些焦慮的原因，卻不應該顯得難以克服，畢竟這個時代的主導政權，正善於掌握與管理危機局勢。除非政府將迎戰的對象，不再視作一項危機，也非一連串長期慢性的問題、多多少少都在預料中的失常，而是一種奇特的風險，也就是這些衝突爭端的形式與處境所顯現出來的：它們是不受管理的。

＊＊＊

到處都可見這種奇特風險，與其去探討對抗行動的理由與可能性，不如去討論它呈現的問題，因為無論如何，這個對抗都會發生，而且總是會有跟隨者。想想希臘的混亂，如何會在法國的情境中產生迴響？不能因那邊所發生的事件，而認為這裡的造反，純粹是這樣簡單轉移過來的。全球性的公

民之戰，今天在每一地方都有其特異性；在法國，一個普遍的騷動情勢，則會誘發另一問題的暴燃。

希臘的鬧事者在人民的支持下，和一個衰弱無能的政府打交道。我們不應該忘記，不過是三十年前，要從一場政治暴力行動開始反抗軍閥政體、民主才又重建。[5]對絕大多數的希臘人來說，關於這場暴力的記憶並不遙遠，它至今看來仍是個明顯的事實。即使是那些地方社會主義黨的大老，也都曾在年輕時嚐過莫洛托夫雞尾酒的滋味。要回應這一切，傳統的政治可是很熟悉各種調停變動的策略，也非常瞭解如何地採取行動、然後對鬧事者宣傳一些意識形態的蠢話。若不是這場希臘戰役自己決定在街頭結束——看得出來，警察當時已完全無能應付——軍方壓制也會在其他地方上演。事實上，沒有什麼比這傳統政治更令人疲乏的、更宿命的——它和它那些乾涸的儀式、它那從不思考的思想、它那封閉的小世界。

在法國，我們那些最激昂的社會主義官僚，從來只做嚴峻的議會核心人

5 編註：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四年的希臘為軍人政權所統治，直至一九七五才建立了民主共和國。

物，和鐵板著臉的負責人，更確切地說，他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摧毀最小形式的政治緊張。這種政治手段總讓人們可以將公民和搗蛋者對立起來，也讓人可以繼續在無底容器中掏取矯揉造作的對比：使用者對抗罷工者、反封鎖者對抗綁架人質者、勇敢的人對抗社會敗類。這幾乎是一種語言學上的作戰計畫，同時還會並行近乎軍事的措施。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鬧事者，以及另一個不同背景下，二〇〇七年秋天的社會運動[6]，都提供了幾個這種手段的例子。巴黎第十大學那些同謀的學生，面對驅趕他們同學的警察時，鼓譟喊叫「去啊！藍衫軍」[7]的畫面，只不過是關於我們已被安排好的未來，那微弱的一瞥。

法國人對國家的依戀，是不用再說的——國家可說是對普世價值的擔保、對抗災難的最後一道壁壘——這種依戀已成為一門病理學，複雜得難以擺脫。它尤其是一個不知如何繼續編造下去的虛構。然而面對這則國家神話，執政者們每天多少都認為，它只是個沒用的阻礙——既然他們最終都得用武力承擔眼前的衝突。他們這群人完全沒有任何情結，輕易地便能派遣反恐菁英部隊去壓制郊區的騷動者，好比去解放一間被它的員工所占領的

6 編註：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為抗議政府削減退休福利，法國運輸工人展開大規模聯合罷工。

7 譯註：「去啊！藍衫軍」(Allez les bleus)，本為足球比賽時的標語，而法國警察制服和足球員球衣都是藍色，此處用以指警察。

革命運動並不是一種傳染病，它的散播靠的是迴響與共鳴。

資源回收中心。隨著國家保護人的外表逐漸龜裂，在那些渴望秩序和再也不想要秩序的人們之間，最原初的對抗已然發生。所有法國政治過去能夠鈍化噤聲的，現在都正脫離常軌、暴怒發作。一切被它鎮壓過的，它也將無法從中重振。在社會就要提前解體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指望行動，起碼它是為了在危機停滯後，還能回復原先必然虛無的生氣。而它也絕不會忘了將這些暴露在其他限制之下。

革命運動並不是一種傳染病，它的散播靠的是迴響與共鳴。有些在這裡組織起來的事件，便是要回應另一處事件所傳送而來的衝擊波。每一件事物都會以它自己的方式來反應現象。暴動並不是像瘟疫或森林火災的蔓延——後者只是種線性發展的進程，從最初的星星之火逐漸地擴展開來。暴動更具體，比較像是音樂，即使被驅散於時間與空間中，它的成員一樣能夠以自

己的顫動，強迫大家聽到他們的節奏。讓一切更加地厚實濃密。要讓回歸原來的正常不再被渴望，或甚至不再能被預想。

當我們談到帝國時，那些權力機構便是被指派要將局勢裡有革命傾向的變化都攔截住，以預防、外科手術的方式。因此，我們要面對的敵人並不是帝國，而是一種非此不可的節奏，一種讓現實湧出又再流逝的方法。相較於所謂世界的秩序，這毋寧可說，更是一種悲傷、沉重、充滿武力味道的世界的消散。

我們所理解的暴動群黨，是另一種組織的開端，屬於另一面的現實，從希臘到法國的郊區，這群人都在找尋對此一致的觀點。

* * *

這已是眾所周知的，危機情勢就是奉送給統治者的機會、讓他可以重新整頓。所以薩柯奇可以不帶太多說謊的神情，大聲宣布財務危機意味著「一個世界的終結」，二〇〇九年將會看到法國進入新的紀元。總之，經濟危機這把戲會是件新鮮事：創造豐功偉業的時機到了，大家一起吧，一起對抗

不平等和氣候暖化。然而對我們這個正好在危機當中出生、只認識經濟、財務、社會、自然生態等種種危機的世代，這一切卻相對地難以接受。「我們將重新出發」、「只需要勒緊褲帶一陣子」，這種話是不會讓我們從危機的打擊中站起的。說真的，公布那些悲慘的失業數據，已經無法激起法國人任何感覺了。危機成了統治的手段。這個世界，似乎只能靠著無止盡地處理自己的潰敗來維持下去。

人們想要看我們躲在國家背後，等著被動員，連帶負責對這社會還不一定會有的馬虎修補。如果想要擺脫這些，除非我們厭惡加入這種動員，更甚至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行動——終極地出擊、打倒資本主義。

正在爭戰的，並不是管理這個社會有哪些多變的方法，而是那些關於幸福的想法與他們的世界、是如此不能縮減與妥協。權力者知道這些，我們也是。激進的廢物看我們總是較多數、較難辨認的一群，絕望地想將我們塞進他們的小頭小腦中。然而，他們向我們張開雙臂，卻只為了從他們的失敗、癱瘓、衰弱的核心問題中壓制我們。這些從「過渡階段」的選舉出身的人，

只會使我們一次次地離共產主義的可能更加遙遠。慶幸的是，我們不會對背叛和欺瞞將就太久。

過去的日子給了我們太多糟糕的答案，也讓我們從中了解到，那都是問題本身就太過糟糕。

我們根本就沒得選擇：
戀物癖般地熱愛大自然　　或　　麻木地接受組織的控制
對作戰的網絡修修補補　　或　　對階級的指揮棒唯命是從
絕望地立刻做些什麼　　　　　　絕望地再等一陣子

以天堂為名義，
將當下的生活和體驗暫時懸置，　　　　行屍走肉一般得過且過，
然而天堂離我們越來越遠，　　或　　以為只要多種些胡蘿蔔，
以至於看起來更像地獄。　　　　　　便足以讓我們脫離這場惡夢。

多麼困窘的選擇。

那些組織，對於組織起來這件事就是個障礙。

老實說，在我們是什麼、我們做了什麼還有我們將成為什麼之間，並沒有差別。但無論是政治的或工會的、法西斯式的或無政府主義式的那些組織，總是很實用性地先將存在的面向分開來。接著，情況就有利於他們去介紹他們愚蠢的形式主義，好像那正是解決此種存在被切割的唯一良方。組織起來，指的並不是給無能為力一個結構。其實首要的是，去連結那些非中立的關係、那些被過分定位的關係。而組織的程度，則是由物質和精神上分享的強度來衡量。

從今以後，可以這麼說：「為了生存而實質組織，正是為了攻擊而實質組織。」共產主義的新概念開始在各地興起。在酒吧、印刷廠、非法占據空屋、樓梯間、農場、健身房等地的暗處，都能產生攻擊性的同謀關係；因為這些共謀，這世界的發展趨勢突然更被強調了。不應該拒絕這些珍貴的串通，以及他們所要求用以展現自己力量的方式。

從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時代真正的革命可能。越來越頻繁的魯莽鬥毆，便是令人生畏的一種，每一次都造就了這一類共謀關係的機會，有時曇花一現、但有時也持久不滅。可以肯定的是，那之中有一種累積的形成過程。當這一刻無數年輕人決心放棄與破壞這世界，你還是可以像愚蠢的警察一樣，去找一個付錢單位、一個老闆，或者一個不用發愁的工作。

***

兩個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和商業的虛無主義，導致了對自我、他人和對所有世界，最極端的奇異感。而個體這則虛構物，瓦解的速度就和成真的速度一樣快。身為大都會的孩子，我們來打這個賭：就是要從對生存最深層的剝奪，那總是被扼殺阻止的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才能由此展開。

歸根究柢，其實這是一部關於我們總在戰爭的人類學，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的想法所造成。

因此，共產主義就像是預先的假定，也像實驗。分享一種同情感受，也設計一種分享。是一種屬於眾人的明顯事實，也是一種力量的構成。共產主義就像模具，專門生產細心又大膽的襲擊，用以對抗統治。它就像號召也像名字，屬於所有反抗帝國壓制的世界、所有在交易王國頑強抵制的團結力量，以及所有擔當戰爭必要性的友誼。共產主義。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需要被謹慎使用的詞。不是因為在字詞的隊伍中，它可能不再流行；而是我們惡劣的敵人不僅將它用壞了，而且還一直這樣利用。我們要堅持著。

有些字就像戰場，一定得要透過全力地爭奪，才能將它真正革命或反動的意義贏回來。

背棄傳統政治意味著承擔戰爭，這場戰爭也發生在語言的領地上。或更確切地說，是關於將字詞、行為與生活堅固地連結一道的方法。如果人們花了如此大的力氣，以恐怖主義的理由，將幾個年輕共產主義農夫關起來，只因為認定他們參與《革命將至》的編輯與撰寫，這不是為了「思想罪」的罪名，而是因為他們正足以代表一種行動與思想都體現在生存裡的作風——而普遍來說，這卻不被寬容。

人們對這些人的指責，並不是因為他們寫了什麼東西，也不是因為他們抨擊了那灌溉整個大都會、神聖不可侵犯的潮流。而是因為他們可能以思想的深度與政治立場，指責了那些潮流。這裡，只要一個行動，就能根據這世界不同於帝國沙漠般的穩固，產生意義。反恐主義試圖打擊「幹壞事聯盟」形成的可能。然而，現實中真正被攻擊的，是轉變的局勢。這可能性來自於，在每個小市民背後都隱藏了某些惡意，而在每個意圖背後都有它所喚求的行動。這可能性也來自於，一個政治概念的傳播，是匿名卻又能找到彼此的、是被散布又不可控制的，它無法被收納在只自由表達的小房間裡。

幾乎不用再懷疑，青少年便是第一個粗野地指責權力的人。過去幾年，從二〇〇一年春天在阿爾及利亞到二〇〇八年冬天在希臘發生的那些騷亂，不過只是一連串的警告。已經有三十或四十年都是這樣了，那些起身反

幾乎不用再懷疑，青少年便是第一個粗野地指責權力的人。

抗父母道德的年輕人，必然會被減低為世代間的新衝突，好像這只是青春期可預見的效應。

而一個「世代」唯一的未來，就是成為上一代，循著這條不變的道路，最終就是通向墓園。

* * *

對於傳統而言，它希望一切都從「社會運動」開始。尤其是此刻，當左派無法遏止地解體、仍假惺惺地要尋回他們在街頭的威信。但是，它再也不能壟斷街頭勢力。只需要看看，在每一次新的中學生動員裡——就像左派至今還敢支持的所有運動一樣——有一道越來越深的鴻溝，橫跨在愛嘆氣訴苦的請願、暴力的程度和行動的決心之間。

這道鴻溝，我們應該拿來作為戰壕。

如果我們看著這些「社會運動」相繼而來、又彼此相互排擠，在身後什麼都沒留下，勢必得要確認，還有什麼堅持在那裡。每一次事件的導火線都能

連結上那份堅持，這堅持不因一條法律的撤銷或其他託詞所產生的荒謬時間性，便任憑自己遵守紀律。照著它自己的節奏再加把勁，我們會看到某些事正顯現著力量。這股力量不會忍受它的時代，反而是無聲無息地強加於上。

這時代不再預言崩潰，也不再是從崩潰中論證令人欣喜的可能。無論這些崩潰來得早或晚，都要準備好。用不著設想提綱來規畫革命該長什麼樣，但是要重現起義的可能，革命從不停止同時成為：青春的生命衝動和通俗的智慧。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行動，那麼沒有提綱不會造成阻礙，反倒是個機會。對造反者而言，提綱的空缺正是唯一可以保證本質的空間：保衛積極創舉的精神。還有的就是，如同維持燃燒之火，要激起和延續某些注目、某些戰略的狂熱，在現在、在到來的時刻，這股狂熱表現出具有決定性，並且是堅決意志的恆久泉源。有些問題再次出現，即使他們昨日看來還顯得滑稽或過時；我們要做的就是將這些問題奪過來，不是為了要明確地解答他們，而是為了讓他們活躍起來。此外，再度重提這些問題所能達到的效果，不會比希臘暴動的效果差：

普遍的動亂局面，要如何變成革命的形勢？警察持續地敗北，而一旦街頭被我們占奪，我們又該做些什麼？國會值得我們一直去襲擊攻占嗎？下放權力到地方的意義是什麼？如何抉擇？如何存活下去？

如何重新上路？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巴黎

Annexe

馬克思理論家安迪・瑪利菲爾德為這本重要書籍作了詳盡的註解：
「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某個地方扎根，試圖主張它自己，
從悲傷的大地中破土而出，向上伸展，脫離肥料的餘燼，
從舊世界的分崩離析中冒出頭來，綻放、重生。
這就是未來社群的理論，一份革命宣言，
一個預告資本主義滅亡的歷史記錄。」

附錄

將至的《革命將至》：新共產主義政治評註[1]

——安迪・瑪利菲爾德 撰

The Coming of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Notes on a Politics of Neocommunism

「所有人都同意，事情就要鬧大了」

二〇〇七年，一本名為《革命將至》(*L'insurrection qui vient*)的奇怪小書，在激進派出版社「法布里克」(Editions La Fabrique)的贊助下於法國出版。法文版《革命將至》一書簡單的綠色封面上，並沒有出現任何作者的名字，只有一個「隱形委員會」(Comité invisible)的屬名，透露出其罪犯的身分(Comité Invisible, 2007)。當然，罪犯(culprit)一詞，暗示著犯下某種犯罪行為，照這個說法，隱形委員會承認有罪：故意挫敗法國當權派，讓薩柯奇政府惶惶不安，而且寫下自居伊・德波(Guy Debord)[2]的《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ble*, 1970)一書出版以來最激進的書——另一本寫於大革命將至的書。

最近，美國出版商Semiotext(e) 的英文翻譯版也撼動了盎格魯—薩克遜的當權派，不但掀起一陣中產階級的狂想浪潮，也讓大家更加注意到聰明人早就知道的事：他們的新自由主義霸權其實是多麼脆弱，對政治現實的掌握度又是多麼地差。的確，正如法國《世界報》在去年(二〇〇九年)五月的精彩註解：「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一本書的力量變得如此可怕。」

「這本書相當重要，」七月時，此書在紐約聯合廣場的邦諾書店即興舉行新書發表會，一位男子這麼說。「它很重要，因為《革命將至》談的是幾乎所有東西都瀕臨

1 文章來源：Andy Merrifield. "The Coming of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Notes on a Politics of Neocommu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volume 28, 2 (2010): 202-216. Pion Limited, London, UK。

2 編註：居伊・德波，法國馬克斯主義者。

破產的現象。我們活在一個華而不實、內容空洞的世界裡。」(*The New York Times* 2009; cf *The New Yorker* 2009)當時是傍晚五點鐘，大約有一百名激進主義分子，沒有經過允許便興沖沖地在東十七街的大型書店慶祝這本書在美國的首發。一位書店員工對著現場竄動的人群宣布當晚並沒有讀書會行程時，有一個人突然跳上舞臺，開始大聲朗誦本書英文版開頭的第一句話：「所有人都同意，事情就要鬧大了。」(《革命將至》，page 154)[3]

一名警衛想要驅離聚集的人群，但徒勞無功；接著，武裝警察來了，群眾開始激動起來，拍手喝采，大聲嚷著要進去附近的Sephora美妝店，又開始喊著他們的咒語：「一切權力歸於公社！」身穿黑衫的警衛盯著狂歡者離開，幾分鐘後，群眾輾轉走進一家星巴克。「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一位啜飲著拿鐵咖啡，坐在筆記型電腦前的年輕男子說道。「但我喜歡這種刺激感。」

這場集會實在太過熱鬧，幾星期之後，眉頭深鎖的福斯新聞台(Fox News)節目《一件事》(The One Thing, 1 July 2009)主持人、保守派人士、暢銷書《常識》(*Common Sense*, 2009)的作者葛倫・貝克(Glenn Beck)顯然被惹惱了，表面上仍彬彬有禮、身穿剪裁合身的西裝、繫著紅色領帶，但幾乎有些暴躁、氣憤得發抖地譴責《革命將至》：「這是一本危險的書，」他大聲說道，「是提倡暴力革命的書。這本書反對《常識》，是內部的敵人所寫的。」

3 本文中所有附註之頁數指的是中文版本頁碼。

「當今世界經濟跌落谷底、失業率攀升，公民權被剝奪的人們已忍無可忍，就要一觸即發……從法國開始蔓延到其他國家，例如希臘，這些國家的人民沒工作、沒錢，也沒耐性了。現在，它蔓延到了這裡……幾年前我說過，歐洲就在毀滅的邊緣，而這就是另一個徵兆。即使是日本，一個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就將示威抗議視為禁忌的國家，那些對經濟現狀感到憤怒、對未來感到恐懼的年輕人，也開始上街頭、組織起來了。日本的共產黨說，他們一個月增加一千名新黨員。」

「這本書很重要，一定要讀，」貝克下結論，「因為這樣你才知道你的敵人是誰，你才知道即將要發生什麼事，然後在事情發生時充分準備。」

造反風格

《革命將至》所引發的騷動和它所掀起的中產階級集體焦慮，是來自它的匿名作者（或作者群）以及它的祕密本質。似乎，這本書最激進的地方就在於它的「隱形」、它的神祕面紗、它引發恐懼的能力，它宣稱有一群反對派——一個隱形的委員會——就在某個地方，策畫著某種陰謀，而當權者卻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哪裡。德波總是說，他越隱匿、越神祕，媒體對他就越害怕、越痛恨；他們被這個無法看透的祕密分子和謎題給嚇壞了。（Debord, 2006）事實上，《革命將至》難得受到《紐約客》（*New*

Yorker, 2009)雜誌的注意而巧妙地被形容為「造反風格」(Insurrectionary Style)，它是典型「德波式」的。[4]不過，這種風格和《奇觀社會》相比，較不露感情、較無詩意，相反的，它較冷靜、優雅、犀利，一如晚年的德波，在《奇觀社會》異軍突起的二十年後所撰寫的《奇觀社會評注》(Debord, 1991)：就像一名評論家(Boltanski, 2009)在法國期刊《老虎》(*Tigre*)裡所寫的：《革命將至》有一種灼烈的風格，「套句波特萊爾的話，它『灼烈得像冰一般』。」

正因如此，坊間有個不太可信的小小傳聞，說《革命將至》其實就是德波寫的，他沒自殺，依舊隱居在尚波(Champot Haut)的一座小村莊裡，就在那失落而孤寂的奧弗涅(Auvergne)火山腳下；說他和他的偶像亞瑟．克拉文(Arthur Cravan)一樣[5]，對製造話題與醜聞擁有好品味，這表示他的消失其實是自己一手策畫的，目的是要對這個世界進行更詳盡的調查，要去批評它，然後再祕密操縱一切，最終推翻它，而這計畫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最近不是有人在上盧瓦爾省(Haute-Loire)看見德波和他妻子，在夏日黃昏的休梅利克斯(Chomelix)閒逛？)記得他在《奇觀社會》接近尾聲時說(Debord, 1970, section 220)：那些想推翻奇觀社會的人，「必須知道如何等待」。所以，德波就是這樣，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終於宣布「革命將至」。

然而，如果大家知道真相，《革命將至》感覺擁有一顆較年輕的心：它的語調太熱烈而天真，太單純而機敏，因此不可能是由一位年老到七十好幾、不知是死是活的

4 德波(Debord, 1970)在《奇觀社會》中實際使用了「反叛風格」(insurrectional style)這一詞(第二〇六節)，它是形容青年卡爾．馬克思在其《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中的「否定風格」。德波在內文中將此觀念用斜體表示。

5 詩人、拳擊手、達達主義者，和「背棄十七個國家」的人，克拉文，在一九一八年的一天早晨，乘著一艘小漁船航向墨西哥灣；他的船緩緩航向海面，沒入地平線，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克拉文。要了解更多有關克拉文的短暫生命與不朽思想，請見Merrifield(2004)。在一部精彩的小說《亞瑟．克拉文沒被淹死》(*Arthur Cravan n'est pas mort noyé*)中，菲利普．大根(Philippe Dagen, 2006)重新創造了克拉文虛幻的飛行世界與永恆的厭惡，他在一九六〇

革命分子精雕細琢所完成。它上面有著印記，表示作者是接近精通這門藝術的「少壯派激進分子」，他(至少目前來說)沒什麼可輸的，有本錢玩得起：世界就在眼前，而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趁現在他還不會太老、太憤世嫉俗，還未受到太多失敗經驗的打擊而變得滿腹牢騷的時候。因此，目前三十三歲的獨立叛逆者，朱力安・顧巴(Julien Coupat, 1974-)，似乎最有可能是幕後黑手，而且這也逐漸成為最夯的媒體論點。一位傑出優秀、精通多國語言的哲學系學生，畢業於菁英輩出的巴黎「法國高等社科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擁有博士學位，專攻德波思想研究與情境主義理論——顧巴擁有一切智性上的條件，也擁有顛覆傳統的機敏度來完成這項工作。顧巴也同樣沉浸在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思想中，但他強烈否認《革命將至》是他寫的，也否認自己擁有像德波那麼高的天份，能創造這種隱匿性與陰謀論，能如此不露行跡地謀略大事。

自二〇〇五年以來，顧巴與數名同志共同擁有一座位於古鐵廬(Le Goutailloux)的農舍，古鐵廬是一個小村莊，和德波的小村莊尚波差不多大小，就在塔納克(Tarnac)外幾公里的地方，是一個只有三百五十個居民的村莊。那是法國最人煙稀少的偏僻地區之一，位於利穆贊省(Limousin)荒涼的米勒瓦什(Millevaches)高原上，與世隔絕，距離城市生活十分遙遠。顧巴和他的同志就在這裡建立自己的生態社區，自己的地下

年代的日內瓦讓他復活，聲稱他沒有在一九一八年被淹死，那其實只是另一個招搖撞騙者的惡作劇。

樂團Velvet Underground[6]，讓一個老農舍重現生機，讓一個凋敝的酒吧恢復活力，以合作社的方式重新整頓鄰近的一家雜貨店，協助一間行動圖書館與電影俱樂部的營運，而且參與具共產黨傳統的地方行政區日常事務，帶來自治的左翼傾向，以及一種陶然自得(可能也很邋遢)的反抗氛圍。這些年輕人(或還算年輕的人)，有不一樣的想法、不一樣的作為、不一樣的夢想，而且對於該怎麼生活，也有不一樣的實踐模式；他們對資本主義超市和勞動市場所能提供的東西已經受夠了，他們的行為讓當權者惶惶不安，威脅了當權者的現狀，因為基本上，這改變了以往主導一切的秩序。當權者一旦失去對日常生活的掌握，一旦看見它根本不了解的另一種日常生活模式，便開始焦急起來。

就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清晨，一百五十名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加上在天空盤旋的直升機，對睡夢中的村莊進行全面突襲，農舍裡的狗兒狂吠，羊群驚慌失措，雞隻也嚇壞了，警察在現場共逮捕了九個人。薩柯奇政府指控他們在靠近德國邊境的地方破壞TGV列車，並從事非法政治活動，這所謂的「塔納克九人」(Tarnac 9)立刻在巴黎法庭被指控為「以恐怖活動為目標的犯罪組織」，罪行最高可判二十年徒刑。十二月初，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除了顧巴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司法管制下被無罪釋放。二〇〇九年五月，顧巴在受到六個月的「預防性拘留」之後，最終仍獲得釋放。但是，正如顧巴在《世界報》(*Le Monde*, 2009)的一次訪問中所說，「反恐，其意義和這

6 譯註：活躍於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美國搖滾樂團「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為紐約的前龐克祖師爺，多描繪紐約地下生活，影響深遠。

個詞本身所指涉的相反，它不是一種對抗恐怖主義的手段，而是一種積極製造政治敵人做為恐怖分子的方法。」[7]

在塔納克逮捕行動後的幾天，「中央警察司法暨檢察官」的「反恐小組」在巴黎草擬了一份犯罪報告。(*Rapport de lasous-direction antiterroriste*, 2008)該報告十分引人入勝，但也很可怕。很顯然，祕密警察現在「瓦解了一個在法國的祕密自治無政府主義組織，該組織致力於以暴力活動陷國家於動盪狀態」、這個團體「是以具領袖魅力與意識形態的領導者朱力安・顧巴為核心所建立，將自己置於大型政治活動周邊」、而且迄今已「涉及破壞運輸建設的活動」(page 1)、「定期參與政治抗議活動」(page 3)，地點包括二〇〇三年於依雲(Evian)、二〇〇四年於義大利聖喬治島(Isola San Gorgio)舉行的G8高峰會；各類生態論壇、抗議反移民立法的集會；二〇〇八年九月於薩洛尼卡(Thessalonica)支持希臘激進主義抗議分子的慶祝會，以及二〇〇八年十月，歐盟二十七位內政部長開會期間，於維希(Vichy)舉行的一場集會遊行。這份報告還寫到，「這些激進主義分子」(pages 3-4)，不僅是一群取樂的「搗蛋分子」或暴動者，而是籌組了「一個富於城市游擊戰技巧，而且計畫周全、行動一致的團體」；此外，他們的言談「非常激進，而且與外國團體保持聯繫。」(page 4)

根據這份報告，祕密警察的監視發現「塔納克九人」打算破壞摩澤爾(Moselle)高速鐵路的陰謀，而且檢察官提醒陪審團，「破壞」這種作法，正是《革命將至》所倡導

7 參考德波(Debord, 1991, page 24)在原著中強調：「如此完美的民主結構建構了它自己無法想像的敵人、恐怖主義。它希望能讓敵人而不是結果來評價它。恐怖主義的歷史是國家寫的，因此它是具有教育意味的。觀眾(spectators)當然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有關恐怖主義的一切，但他們必須有足夠的知識說服自己，和恐怖主義比起來，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或無論如何都是更合理、更民主的。朱利安的父親，杰拉德・顧巴(Gerard Coupat)說：「他們把我兒子變成代罪羔羊，而其實一整個世代都已開始為了自己去思考資本主義和其錯誤的做法，去向政府示威抗議……政府把我兒子關在監獄裡，只因為一個有勇氣示威抗議的左翼分子是他們現在最不想要的，因為經濟狀況每況愈

的。然而，警方搜索顧巴的房子，並未發現任何爆炸物或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既沒有燃燒彈也沒有活動扳鉗，只有記載列車資訊的「文件」，包括列車的確切抵達及出發時間。而且，如同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在他為「塔納克九人」所寫的辯護文章（Agamben, 2008）中所說，「說得白話一點，」一切都歸結於「一份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的時刻表。」警方也沒收了「登山配備」，同樣地，「說得白話一點，」阿甘本說，意思是「一副梯子」，就是可以在任何一間鄉下屋子裡發現的那種梯子。總之，那裡幾乎沒有能將任何人定罪為恐怖分子的東西。對阿甘本來說，「這樁幽靈事件唯一可能的結論，是那些反對當前社會以及經濟問題管理方式的激進分子，被認為是潛在的恐怖分子。我們必須鼓起勇氣說清楚，當前，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和義大利）紛紛祭出我們先前斷定為野蠻、反民主的法律和警察措施……將社團組織犯罪化，允許將政治行為認定為具有恐怖分子的『意圖或傾向』。」[8]

沒有個性的革命分子

阿甘本曾撰寫過《社群將至》（*The Coming Community*, 1933）一書，正如其書名所暗示，這和塑造顧巴的政治想像力脫不了關係。[9]阿甘本表示，《社群將至》是人類之所是，也是人類之必要。但彼此團結的人群，並不在意任何如同「聯合工人階

下。自戰爭結束後，從沒有在法國發生這種事。這件事很嚴重。」（引自 *The Observer*, 2009）

8 有關《革命將至》一書以及朱利安．顧巴與塔納克九人遭逮捕的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涉及到當今激進出版品的地位：寫作（與出版）一本書是否該與實際去做被視為相等，是否在頁面上煽動他人足以被認定是有罪的行為。如今，禁止一本書可能會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倒不如逮捕它的假設作者來得容易。即使是以左派老將埃里克．哈桑（Eric Hazan）為首的出版社法布里克，也不得不面對國家的施壓。哈桑被反恐警察叫去訊問並進行四小時的虐待式質問，要他透露作者的身分。不用說，哈桑拒絕回答。

9 阿甘本在巴黎的高等研究院教過顧巴一陣子，並與顧巴合作過壽命短暫的雜誌 *Tiqqun*。

級」(united working class)的本質，阿甘本反而肯定一種「非本質共同性」(inessential commonality)，認為一個人的存在取決於他的可能性或潛能，取決於他未來能成為什麼樣的人。

阿甘本召喚我們和他，以及其他人一起進入一個神祕又模糊不清的「不可分辨地帶」(zone of indistinguishability)，一個自由與友誼的國度。套用闡述顧巴的政治理念與分析的期刊所用的字彙「Tiqqun」，在那裡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假想黨」的持卡會員。

Tiqqun，也就是「假想黨的意識器官」，源於猶太神祕哲學中的tikkun，意思是修復、轉化、療癒，這個字只在其中兩期出現過[10]：一次是一九九九年初該期的第一百六十二頁，另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十月份的第二百九十二頁；這兩篇幾乎和書一樣長的論文充滿了驚人的分析與尖銳的辯論、高密度的哲學對話，以及想像的烏托邦式渴望，使人聯想到早期的「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社團，或是「字母派」(Lettrists)於五〇年代初期開始發行的自製刊物*Potlatch*。或許，克拉文同樣短命的刊物*Maintenant*(五期)更貼近*Tiqqun*的心，它的目標有一點像*Tiqqun*的目標，或像假想黨的目標：「只是將自己呈現為一個叛逆的社群，一個『出走黨』(Party of Exodus)，一個油滑矛盾的顛覆現實。」(Thèses sur le Parti Imaginaire, *Tiqqun* 1999, page 50)無論如何，*Tiqqun*就是假想黨對中產階級現狀宣戰，並為數年後《革命將至》的蓬勃發展埋下理論與政治的種子。

10 顧巴走強硬路線、講法語的Tiqqun，不應與麥可・倫納(Michael Lerner)的猶太裔美國自由主義Tikkun混淆。

確實，在短命的*Tiqqun*期刊裡，其中一個最傑出而歷久不衰的理念，也是在《革命將至》中一再出現卻未被命名的想法，就是引人入勝的「布倫姆（綻放）理論」（théorie du Bloom）。綻放（bloom），隱含著成長的動作：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某個地方扎根，試圖主張它自己，從悲傷的大地中破土而出，向上伸展，脫離肥料的餘燼，從舊世界的分崩離析中冒出頭來，綻放、重生。因此，布倫姆理論就是未來社群的理論，一份革命的宣言，一個預告資本主義滅亡的歷史記錄。布倫姆，當然，是「假想黨」的榮譽會員，他的姓氏可以是「李奧波」（Leopold）——喬伊斯（James Joyce）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中的老百姓李奧波・布倫姆，一個處於充滿敵意與派系主義之地的外來者，他因卓越的才智與大力宣揚「愛」而被嘲笑：「我的意思是仇恨的相反。」他結結巴巴地說。（Joyce, 1946, chapter 12 "Cyclops", page 327）喬伊斯的布倫姆，在*Tiqqun*的紙頁上遊盪，如同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遊蕩一樣，幾乎是隱形地、祕密地，暗中尋找和解之道：李奧波・布倫姆的存在是隱含的、暗示性的，只在「布倫姆理論」的題詞上出現，其中還引用了《尤里西斯》裡的一句話（Joyce, 1946, page 55），文中布倫姆吃著煎腰子早餐，倒牛奶給他那呼嚕呼嚕叫的貓咪喝，並若有所思地說：「他們說他笨，他們了解我們在說什麼，多過我們了解他們的程度。」[11]

他們說我們笨，和他們了解我們的程度比起來，我們更了解他們。這就是他們為何怕我們的原因，因此，他們會恐懼多疑、會想要狂熱地調查我們、滲透我們，讓我

11　二〇〇四年，*Tiqqun*中的「布倫姆理論」以獨立書籍的形式出現（Parti imaginaire, 2004）。

們成為罪犯，並起訴我們，這就是布倫姆理論的邏輯。「布倫姆可以定義為，存在我們每個人內心裡那些超越廣告噱頭的東西，那些構成普世存在的形式，而這對於住在『奇觀社會』裡的一些特定族群，是很普遍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布倫姆一開始就只不過是個假設，但是一個逐漸成真的假設。」(*Tiqqun* 1999, page 25)[12] 布倫姆是指出人類內在潛能的信號，沒有個性的男人、女人們所能成就的未來，一個能自己決定自身價值的人，而且這價值不是來自外在的力量或任何機構與統治權力。布倫姆什麼都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只是具有某種素質的人，一種對主導秩序不感興趣而寧願不要的人。確切來說，顯然與布倫姆志趣相投的人叫做烏爾里希（Ulrich），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沒有個性的人》[13]（*Man without Qualities*, 1997）一書中的人物；或叫巴特白（Bartleby），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筆下那個消極又愛拖延的文書[14]。「同時，」*Tiqqun*（1991, page 35）說，「可以確定的是，布倫姆的內心裝著一塊商品社會的斷垣殘壁，」那是屬於奇觀社會的，因為在這個角色裡，我們發現「我寧可不要，」「我寧可不要有一點點講理」，因為我們想要做別的事。[15]

新共產主義

《革命將至》有兩個獨特之處：第一，它吸引我們前往但丁的地獄，但不是九層

12 在Tiqqun裡，德波的奇觀社會概念（spectacle）始終都是第一個字母大寫的（Spectacle）。

13 編註：《沒有個性的人》，故事發生於維也納，主人公烏爾里希，是個對外界事物採取消極背動態度的人物。

14 編註：《文書巴特白》（*Bartleby the Scrivener*）。

15 參考Melville（1990, page 19）。阿甘本於一九九三年曾撰〈巴特白，或權變問題〉（Bartleby, or on contingency, 1999）一文，是第一位在反叛者法律代書巴特白身上，注入哲學和政治觀點的當代理論家之一，巴特白的拒絕是一種安靜的否定形式與政治潛能，如最近麥可・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內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國》（*Empire*, 2000）中所強調的，亦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其《視差之見》（*Parallax View*,

地獄，而是充滿兇惡和邪惡怪物的地獄，我們每一天，一如往常地，都投身到一個骯髒的七層地獄，就在地球表面之上。這是新自由主義，反民主的地獄如今就在我們眼前。政治專業領域和「政治性」(the political)之間的缺口已如此巨大，以至於兩者不再有任何關聯，我們可輕易墜落至這兩者之間的黑暗鴻溝之中，這就是目前已經「沒有出路」的秩序——如果你按照它的邏輯、接受它的規則，或讓自己墜落，相信「我就是我」的話，就會如此。而你不是：你是被別人設定好程式的，你的身體不屬於你自己：「你不是這樣的你」。因此，那「假想的集體」(imaginary collective)指出，你(我們)應停止參與這地獄的活動，我們寧可不要，我們肯定我們的不適應，並以此做為出發點，做為交集，成為「新共犯結構」(page 25)：「我們並不消沉，我們只是在罷工。對於拒絕振作的人來說，『消沉』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過渡，是跟現狀說再見，是邁開偏行的步伐以閃避政治的收編。」(page 25)因而由此展開一場政治鬥爭，試圖建立一個能夠表達新秩序的新社區和新語言，一種具共同性(commonality)的東西，用以傳達一些積極面，一些能夠開始進行，能自尋出路、自行組織，並起而反抗的東西。這才真正是《革命將至》的第二部分，它的烏托邦元素，也是長久以來人們所提出通往天堂樂園最創新、最原創的途徑。

「很抱歉，我們對這種故事他媽的不感興趣」(page 40)為《革命將至》的一連串開場奠定了顛覆的基調，為巴特白默默叛逆的話語進行更新，把溫和魯莽與被動拒絕的

2006)中所述。比他們更早，針對巴特白所寫的有趣評論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89)為弗拉馬里翁(Flammarion)《巴特白》法文譯本中所寫的〈跋〉。德勒茲的方法是以文學為基礎，但以政治角度來看也頗為有趣，因為他在梅爾維爾的巴特白，杜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地下人，穆齊爾的烏爾里希，和卡夫卡(Franz Kafka)的格雷戈爾．薩姆沙(Gregor Samsa)之間，勾勒出激進的傳承——也就是激進的「配方」。每一個人物都沒有個性，也沒有特質，傳遞出一種「新邏輯」，德勒茲這麼稱呼它(Deleuze, 1989, page 191)：它反而是另一種引導我們找到一種和理性無關的邏輯，「巴特白沒病」，德勒茲說(page 203)：「而是美國疾病的醫生，巫醫，新基督，我們所有人的兄弟。」

螺絲釘轉動起來。一方面，它有細膩的呼號以及對溫柔親密的訴求，訴求著「一切在當代社會關係裡早已消失的事物：人情味、純樸、真實感、一種沒有劇場也沒有觀眾的生活。」(page 34)而另一方面，它亦有憤怒、火熱的要求，想看到這一切都炸毀的願望，一個對野性的呼喚，「狂野地進行一場大眾的實驗，部署新的組織，尋求新的合作」(page 35)這裡提供的是一種全新的、更具實驗性的共產主義理想，它要求自治權並厭惡國家，它對破壞的想望，明明白白地顯示其無政府主義思想；但它也暗含著馬克思主義——只是它表達的方式是淘氣的，是剽竊而多產的，它也採用了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The Grundrisse*)裡對烏托邦的描述。其中，馬克思所嚮往的是將「必然領域」(realm of necessity)——一個充滿無休止的工作和異化的嚴峻現實——用「自由領域」(realm of freedom)取而代之，用更少工作、甚至不用工作的夢想取而代之。共產主義，如馬克思說(Marx K, 1968, page 343)，是指一個國家裡「過勞的群眾不再是富人總體發展的一個條件。」個人的自由發展，「不再是減少必要工作時間相對於過勞的問題，而是將社會中的必要工作時間減少至一個絕對最低值。」減少工作能釋放出空閒時間，是對大眾都有利的手段，它以個人在藝術、科學等方面的發展為前提。

《革命將至》呼籲我們「上路吧！」(page 105)它的基礎是一種新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一個「找到彼此」的概念、一種超越狹隘「聯合工人階級」的團結性。事實上，它提供另一種品牌的馬克思主義，一個更開放、更饒富魅力的版本，甚至可能是更無

宗派色彩的版本，而且比起由狂熱分子和純粹主義者所擁護的東西，絕對是更激進和更具威脅性的版本。我們只要記得馬克思很少談到「階級」，而且他給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探究一種推翻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政、經制度的可能性。那麼，將工人階級的「歷史性使命」降級，就不等同於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使命降級，而是在說明一件最重要的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要告訴我們如何超越資本主義而生活，如何暗中破壞資本主義，以及社會的團結是如何在各種人之間凝聚起來，無論他們是否屬於「工人階級」。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做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而《革命將至》提出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它「在酒吧、印刷廠、非法占據空屋、樓梯間、農場、健身房等地的暗處興起」。(page 162)共產主義是「分享一種同情感受，也設計一種分享。是一種屬於眾人的明顯事實，也是一種力量的構成」。(page 164)藉由提倡一種新的共產主義感覺結構，《革命將至》有充分的理由發光發熱，猶如提倡一種新新馬克思主義(neo-neo-Marxism)的新奇文件，我則喜歡稱它為「神奇的馬克思主義」。(Merrifield, forthcoming)

這些日子以來，世界各地的激進主義分子不見得會以「工作」來定義自己，也不在工作的行動上取得他人認同。這些人不想藉著工作讓自己更有權力，也不想緊緊地抓牢工作。他們想要的反而是從工作中解放自己，拒絕工作的本質、內容，與(無)意義，也拒絕傳統工人運動的策略與組織形式。這就是「塔納克九人」的歷史性任務，而

《革命將至》正是他們的新共產主義宣言。很久很久以前，《革命將至》這麼說：

「勞工運動的先驅先後有了工作室和工廠可供聚首。他們透過罷工來自我肯定，同時揭穿那些破壞罷工的人。他們那些引起資本主義政黨與工黨爭端的薪資收入，足以聯繫全球各處的支持者與戰線。……我們可以透過那些桀敖不馴的日常行為自我肯定，並揭穿那些破壞的人。」(page 112)

如今，團結公社與戰線已開展至全球性規模，擴大至全面性的社會空間，更深入日常生活中。如今，這場鬥爭的目標是奪回無工作的生活並為它重新定義，它關心的是日常的反資本主義與後資本主義的共有性(communality)。[16]

阿爾貝托・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 2009)最近抨擊《革命將至》「將階級團結的瓦解，診斷為社會批判的立足點」，指出它展現一種「對馬克思階級鬥爭論述的冷漠」，而且它「將反資本主義從階級政治中脫鉤」。但是高茲(Gorz)自己對托斯卡諾的指控有一個很好的答辯，表示前者並不必然意味著後者，因為工人階級的解散並不必然表示領導反叛活動的馬克思主義已消失。而在《革命將至》中就是如此。高茲表示，「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工人階級身上所體現的負面性，不可能消失。」(Gorz A, 1982, page 68)

「它已被取代，而且已經在一個新的社會領域中獲得一個更激進的形式……它比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更具額外的優勢，因為它直接意識到自己：它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

16 你得到的印象是隱形委員會已閱讀了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的文章並同意他的看法，他告別工人階級並想將我們從工作中解放，以找到一條通往後工業化天堂的道路。「這不再是工人贏得權力的問題」，高茲在《告別工人階級》(*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Gorz, 1982, page 67)中說：「而是贏得不必再以工人的功能出現的權力。這裡所討論的權力問題和從前完全不同。(工人)階級本身已經進入危機之中。」見高茲(1982)特別有說服力的一章：〈一個新的歷史課題：後工業無產階級者的非階級〉。

如果我們相信高茲的想法，認為現在已沒有所謂工人階級這種東西，那麼，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裡國家角色為何的老掉牙論調，就變得多餘

同時主觀與客觀、集體與個人。這種非階級性涵蓋了所有因廢除工作而從生產線被開除者，或那些因智識工作的工業化(在這個情況下，指自動化與電腦化)，導致缺乏就業能力的人。它包括所有當前社會生產的冗員，這些人很可能或實際上已經失業了，無論是永久或暫時、部分或完全地失業。它是舊社會分解的結果，而舊社會是奠基於尊嚴、價值、社會功利性，以及工作的可取性。」[17]

「在所有政治情誼之前，不要退縮」，隱形委員會這麼說。(page 111)這是一個將政治力量賦予親緣(affinity)政治和情感政治的新穎觀點。

「關於情誼，我們被灌輸的是一個中立的概念，像是一種無關緊要的情感。然而，所有情感的投合都是在一個共同真理中的投合。所有的相遇都是在一個相互肯定中的相遇，甚至是對破壞的肯定。在一個堅持不放棄某些東西、而經常性地導致失業的時代，或是為了工作必須說謊、接著又為了維護謊言而工作的時代，人們的互相聯繫並不是無意的。」(page 111)

當志同道合的人找到彼此時，他們相處愉快，結交朋友，決定走在同一條道路上，一個運動便應運而生。他們會聚在一起，是因為他們寧可不做某些事，而寧可一起去做些別的事。他們會走在一起，不是因為某種抽象的理想、不是因為他們應該具有的某些特定意識、某些理論家、領導人以及政治家叫他們為了自己好而去認同的意識；相反地，他們所發動的戰爭，是針對「他們可用雙手觸摸到的東西」，正如奧

了。由於已經沒有任何明確或顯著的無產階級，應該也沒有什麼可供專政支配的人了。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彼此之間，並沒有真正的衝突緊張，他們似乎贊同亨利．列弗斐爾(Henri Lefebvre)早就告訴我們的：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就像高茲，列弗斐爾始終抱持著一個較寬鬆的馬克思主義——一個修改過的馬克思主義——即假定一個開放的工人自治，而不是狹隘的無產階級專政，受到盛宴而非生產主義所吸引，受到巴黎公社而非強攻冬宮所吸引。我們應在這回顧一件事：曾有人問列弗斐爾是否真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是，」他說。「我當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樣有一天，我們都可以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引自Soja, 1996, page 33)

雷利亞諾．布安迪亞上校(Colonel Aureliano Buendia)——一個比「全球化」觀念更早出現的反全球化者——在馬奎斯(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中所說的(Marquez G G, 1978, page 85)。

情感結合了人們，這是所有社會運動形成的原因。親緣變成了連結人們跨越國界與障礙的水泥。因渴望另一種現實，虛構它、夢想它，人們發現了與他們相似的靈魂，也許就在附近，也許在遠方；找到彼此之後，他們一起努力實現共同的願望。奮鬥變成了一種血汗的實踐，只為了實現內心深處的願望，為了實現一場友誼、一個集體的夢想，甚至是集體的幻想。因此，一路上就像滾雪球一樣，參與者發現其他人也有類似的渴望，於是規模與氣勢便聚集了起來。他們一起奮鬥，以求實現共同的夢想，或許超越工作關係，超越國家、超越工人階級的歸屬，政治參與成為一種真實的幻想。人們發現一個由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由一種夢想和一種仇恨而來、「被詢喚的」(interpellated)群體共同性，一種因當今資本社會的循環與累積系統苛待他們而生起的仇恨；一種自願退出並將自己從政治屈從中解放的夢想，一種做自己的事的夢想。當他們一起奮鬥，一起為了自己的事而組織起來，這時力量經常會以具體的形式出現。在這個程度上，「一起奮鬥以實現共同渴望」通常是指主角們遇到了一個共同的敵人。抗拒的力量會試圖中和這股力量，進而顛覆它、破壞它。當人們有力量組織他們自己的時候，組織的力量就是不需要的。

17 可以說，階級只有在一個具階級意識的統治菁英存在的背景之下，才能喚起一些有意義的東西；相反地，那些不統治的人，也就是我們大部分的人，是彼此大異其趣、各式各樣零星散亂的人們——高茲的「非階級」——那些既沒有覺察到自己的階級，也沒有動力以任何階級之名採取任何行動的人。然而，這些人往往會出於一種反抗統治階級與系統的願望而被激發，因此這個階級明顯地支持對抗那「非階級」覺得疏離的系統。正如高茲所說(Gorz, 1982, page 75)，這種非階級「無非是一個由不斷變化的一群個體所組成的模糊領域，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奪取政權，以建立新世界，而是要藉由脫離生產主義的市場規矩，以重新獲得他們自己生命的自主權。」

穿牆的方法

《革命將至》裡被審訊嚴格的薩柯奇政府用來做為犯罪證據的段落——那些討論破壞之必要、「逐步地推翻所有的障礙」(page 125)之必要的內容，認為破壞是對街頭不文明統治的有效懲罰。

「警察在街道上並非無敵，只是他們有辦法進行組織、訓練，以及可以不斷嘗試新式武器。相較之下，我們的武器始終是簡陋的、拼湊起來的，而且在使用當下常常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這些武器無論如何都不是為了競爭火力大小，而是用來保持距離、轉移注意力、施加心理壓力，或者出奇不意地攻打出一條通道，取得進展。」(pages 131-132)[18]

出其不意、祕密結社的力量，反叛、示威、祕密策畫、暗中打擊，以及一次在多個地點同時進行的力量，是對抗火力遠比我們優越的政權的關鍵因素。「使自己不被看見。將無名人士移置於戰鬥位置」(page 128)：匿名挑起恐懼與分心、散播謠言，並用在圖謀「夜間行動或祕密行動，安排一個無懈可擊的攻擊位置。」(page 129)在行動和統籌時若被清楚看見——「被發現，首先便是容易受到攻擊。」在這種情況下，黑色滑雪面罩成為名副其實無名之輩的標誌，代表隱形的巴特白之流和地下男女、以及

18 在 *Vers le cybernanthrope* 這本書的最末，列斐伏爾(Lefebvre)認為，革命將會以新風格獲勝，就靠它自家出產的東西，有組織又自動自發，有確定的願望與熱情，能以彈弓對付坦克，以網絡對付裝甲，並以鬧治鬧。(Lefebvre, 1971, pages 211-213)

那些想要掩飾內在特質、沒有個性的人、不想在公眾露臉的人、不願成為社會魁儡的人，他們堅持：「只要看看這個社會中大人物的樣貌」，隱形委員會戲謔地說，「也許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做為無名小卒的快樂」。(page 129)

談到這裡，我想到戴著黑色面罩的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他在墨西哥恰帕斯州(Chiapas)的叢林被監視著，英雄馬科斯的薩帕塔黨人(Zapatistas)身分，象徵著基層的反叛，反抗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只要需要，馬科斯就一直保持蒙面，直到不再需要偽裝，直到威脅結束，直到能夠安全暴露自己，直到他的「裸露」使他換得自由，而非公平的遊戲為止。「為什麼要藏起你的臉？」有記者曾這麼問過馬科斯，當時薩帕塔剛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奪下墨西哥最南邊一州的一座重要城鎮。「你有什麼不敢露臉的？」這位「副頭」(El Sup)[19]曾想過要摘下他的面罩，但人們卻突然大叫「不要，不要，不要！」因此，面罩依舊戴著，魅力依舊延燒，一個偶像正在成形。[20]在面罩的背後，馬科斯摒棄了他自己的自我，創造出另一個自我，一個普通男女的、力圖反叛的非我：「在社會上沒沒無聞，並不是件什麼屈辱的事。」《革命將至》和他意見一致，「在社會上什麼都不是並非一種屈辱、無人承認的悲劇——被誰承認？——相反地，是最大的行動自由。」(page 129)

權力、財富和統治單位都位於大都市，因而大都會是一個從事祕密破壞的明顯標的。大都市的技術性基礎設施，是最容易受到襲擊，最容易被劫持、占領，被摧毀、

19 譯註：馬科斯的暱稱。

20 面罩事件記錄在瑛納・彭切・德理昂(Juana Ponce de León)對馬科斯選集《世界就是我們的武器》(*Our Word is Our Weapon*, 2001)所作的「編者註」(Editor's note, 2001)裡。

損害的。一旦破壞工作、阻撓工作、干擾工作、破壞機器、企圖掌控等種種行動力組成了一個有效的運作模式，變成阻礙生產和癱瘓經濟的有效武器；那麼，二十一世紀城市運作的空間、大都會循環的領域、無盡而盲目的商品與人的流通：資訊、能源、汽車、通訊等，都成為廣義層面的「整體社會工廠」，這些，都是可以被予以破壞的對象；電力網絡、光纖傳輸系統、能源網絡，現在這些都可以被攻擊、被摧毀，以建設比這種「無望的流通」更清醒的東西：

「阻礙社會機器的運作，必須承擔某些後果，在今天意味著重新獲得、重新創造阻斷網絡的方法。如何使高鐵路線、電力網絡無法被使用？如何找到電腦網路的弱點？如何擾亂電波以及使電視螢幕變白？」(page 127)

就這樣，「讓一切都動不了」成為批判性、負面性的一種反射原理，把巴特白主義(Bartlebyism)帶回激進生活中，讓那些反叛當今秩序的人們做為一部分武器。諷刺的是，經濟體越是讓自己變得虛擬——越多價值從這循環與生產的互聯性生出，它的基礎設施越是「去本地化」、「去實質化」、「恰好夠用(零庫存)」——就越容易被打倒、被阻撓、被重新定向。最近在法國發生了反《首次聘僱就業法案》運動，這是第一個讓年輕人的工作合約更無保障的國家法律，「在封鎖火車站、外環道路、工廠、高速公路、超商甚至是機場上，毫不遲疑手軟。在雷恩市，只需不到三百人，就將主要幹道封鎖了好幾個小時，並造成了四十公里長的交通阻塞。」(pages 141-142)布朗基也

是，他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發現城市空間不僅僅是衝突發生的劇場，也是一場革命的手段與賭注，更是能夠建立路障和砲塔的游擊戰戰場，能夠占領建築物並應用穿牆術的地方。[21]

「不存在和平的起義，」(page 145)《革命將至》這麼說。「武力是必要的。」同樣的，和薩帕塔分子一樣，參與者知道，「這是為了盡力使其用途成為多餘。起義指的是拿起武器，一種『武裝的持續性』，而不是通往武裝抗爭的過程。分清楚武裝與使用武力，對我們只有好處。武力是一種革命的常數，儘管在巨大轉變的時刻，武力的使用並不頻繁，也很少是決定性的。」(page 145)

革命可以成為一股政治力量而獲得勝利：「在政治上，戰勝軍隊絕非不可能。」(page 147)首先，最重要的是，把地方層級的力量除掉，行動就從這裡開始，向外擴散，就像一隻蘋果裡的蛆，由內而外吃掉蘋果，阻斷循環，在街頭對抗，進行破壞與顛覆，進行組織與癱瘓行動，擴大自己的地盤，並讓所有行動成為不可逆轉。但是，在任何鬥爭中，至關重要而該永遠關切的問題是：「因對軍事是如此仇恨，如此努力對抗他們又經常想著他們，你最後變得跟他們一樣壞。沒有什麼生命中的理想，值得你投入這麼多。」[22]

21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85)因其具威脅性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理想，而在牢裡消磨了大半輩子。他在一八三〇與一八四八年期間的革命年代成年。馬克思與恩格思很崇拜布朗基的文章與行動主義，而馬克思將他視為「法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心與腦」。(Marx, 1955, page 25)要獲得布朗基在建築物上設置壁壘的革命戰術和錦囊妙計，見他寫於一八六八年的文章〈武器製造指南〉。(Instruction pour une prise d'armes, Blanqui, 1955)

22 這句話是蒙卡達將軍(General Moncada)在《百年孤寂》(Garcia Marquez, 1978, page 135)中對奧雷利亞諾・布恩迪亞上校所說，擔心這是因為上校痛恨專制，而變成了馬孔(Macondo)最殘酷的暴君。

公社萬歲！

只有當一個運動有能力創造正面、有秩序、有組織的東西，且生活在戰爭中同時也知道如何與眾人和睦相處，才有能力去否定、去癱瘓、去精心安排混亂。《革命將至》的核心，也許就是它最具革新性的核心，是呼籲人們建立新解放地區、新公社，以及「多種不透明地帶」。將自己歸屬於自己覺得最真實的東西，書中敦促讀者，體驗相遇的喜悅——與那些已掙脫個人束縛並接受「正常」行為模式的人相遇的喜悅。「然而，」隱形委員會問道，「令人感到奇怪的不是互相瞭解的人們組成公社，而是他們仍舊維持著分離的狀態。為什麼公社不會不斷地無限繁衍？它不會在每個工廠、每條街道、每個村落、每所學校裡無盡繁衍？」(page 115)每一次，當一群人決定依靠自己，用他們的集體力量來制衡外部敵人，即反動力量時，公社便再一次取代了社會的主導機構。每一個公社即同時是一個領域上和政治上的實體，既是一個社會大環境背景卻也是一個瞬間，是一個空間也是一個潮流；一個公社的集體力量，強大的程度是透過「聯結密度。不是由組成的人，而是由領導這些人的精神來定義。」(page 115)

此外，公社將自己組織起來，讓人們不需要再工作。這給了情境主義者著名的口頭禪「永不工作！」(ne travaillez jamais!)一個新的觀點(Merrifeld, 2005, chapter 1)，因為它清楚區分了努力工作與不謀生——不出賣一個人的身體和心智，不浪費掉一天

中大部分的時間做一些令你討厭、令你昏昏沉沉、充滿疏離感的事情——這兩者的意義。二十一世紀的公社成員，不願意拿自己換取薪酬，反而喜歡使自己成為無用的勞動商品，卻是有用的工人，一個有意願以有意義、有生產力的方式為他自己和公社工作的人。公社的成立，是因為夢想的匯集、因為夢想的力量，夢想回到土地、靠土地過生活，以有機方式耕種而不貼上有機標籤，烘烤麵包、養山羊、創造小本企業、建設新的房舍和城市生活。而在實踐自己夢想的同時，這些人發現了其他相同的人，有類似的夢想並確實採取行動，他們看到彼此，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敵人，他們正在灌溉一種新的社區，以積極的由下而上的意願為根基，而不是基於毫無價值、來自上層的施捨。

確實，公社需要錢，需要某種形式的市場，即使它只是一個黑市，也必須想盡辦法「盜竊、培育、製造」(page 120)，也確實必須找到它自己招搖撞騙的伎倆，以便維持下去。它的「具體勞動」必須按照生產和交換計畫來制定，也同樣必須被承認；然而這裡的生產和交換，是「簡單而透明的」，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Capital*)一書中所說。而且它也含括在一個由生產者和分銷者組成的協會之內，其中所有人都公平地買賣。從薪資勞動中解放，並非意味著休假去，什麼事都不做，只是閒晃著；公社不是一個嬉皮公社：「清閒的時間、停工的時間、無所事事的時間以及對於無所事事的害怕，這些都是工作時間。現在，不再需要去填滿時間，而是去釋放任何『時間』都沒有

的能量。」(page 119)

一個公社要能夠生存，自我組織總是需要不斷擴張，可以同時占據並成為領地；公社需要增加其成員的數量、流通的節點和各種團結方式。最理想的地點，就是公社本身的領土界線變得無法辨識，「對權力當局而言，地域變得看不見。」(page 123)基本的規則是，「當與某一特定區域重疊的地域愈多，它們之間的交流就更多，而權力能左右的就更少。」(page 124)小酒館和酒吧，體育設施和車庫、荒地和二手書店、建築屋頂和臨時的街頭市場，「都可以很容易地擺脫他們的正式身分，只要他能夠找到足夠的同謀。」最終，這種地方的自我組織「在將自己的地理學與國家制定的地圖學重疊時，會擾亂後者，或將它消除」，直到公社「產生自己的分裂。」(page 124)

如何中斷城市的流動，然後在廢墟中、荒涼的鄉村，過度建設的城市中建立新的公社，如何恢復在地的糧食生產，打造城市菜園，如同古巴為了抵擋美國的封鎖和蘇聯的壓迫所做的？小小的魯賓遜．克魯梭群島(Robinson Crusoes)，如何形成一個巨大的解放新大陸？《革命將至》說，公社將為自己找到答案，否則他們會被無情地摧毀，沒有其他可能。「假想黨」是從一個極為弱勢、相對孤立的地方開始的，它也知道這一點。革命只能從基層開始：「一切似乎都比革命更有可能發生，但是，沒有什麼比革命更加必要。」(page 107)

所有的跡象、竊竊私語，小道消息、傳聞、暗示，都顯示這些想法正逐漸生根、成形，顯示他們呈現了未來主義者所憧憬的現實：從塔納克的成員到希臘的憤怒學生，從法國貧困郊區的不滿青年（薩科齊指控他們為racaille ——敗類）到抗議《首次聘僱就業法案》的公民，從生態社區開始萌芽，蔓延至歐洲鄉村，至拉丁美洲城市的違章建築住戶與無地農民運動，《革命將至》似乎是在描述一個已然來臨的革命。而在美國後布希時代那預告世界末日般的災難裡，《革命將至》也造成了轟動，這種另類的未來令人們興奮，而且這不僅僅只發生在星巴克的櫃檯前，與此同時，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譯版顯然也正在進行中，已準備好要攻入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區，也許能夠在那裡引發革命中的另一場革命。

但是，就目前而言，《革命將至》所策畫的是一場真正的還是想像中的革命，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這本書具有不容置疑的能力，能夠激勵、挑釁，煽動、刺激人們，它啟發人們、撼動現狀，並激怒當權者——那些害怕失去權力，已顯露出權力搖搖欲墜、已受到這本奇怪小書威脅的人。隱形委員會所呼籲並懇求實行的實驗性公社是激進的，不只因為他們的現實理念，也是因為他們的希望理念：他們標誌出一條道路，讓人們可以通過它聚在一起，讓彼此找到一個「希望的網絡」，這種想法是神祕

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十分重視的。在他偉大的希望讚歌三部曲裡的一開始，布洛赫(Bloch, 1986, page 75)描述了「赤裸的奮鬥和願望」，它在我們內心翻騰，首先以一種「渴求」、一種「期待的牴觸情緒」(an expectant counter emotion)的形式向外展現，敦促我們，讓我們繼續保持著希望。很快地，這種「牴觸情緒」在我們內心燒毀殆盡，變成了一種「飢渴」，這即是反叛意識形成的來源，「對現存的壞狀況說不，對在前方縈繞的更好未來說是。」

《革命將至》點燃了激情的辯論，內容不僅針對革命的性質，也針對革命性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可從本書打破形式主義的束縛，以勾勒出一個更具原始概念的馬克思主義，一個更加充滿活力、更富挑戰性、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揚棄舊有受信賴的教義、揚棄那支撐著殘障老人的拐杖。它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個從上層強加而來的抽象革命模式，從上而下壓在那些可能(或可能不會)將自己認同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相反地，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式的願景，一種告訴人們如何在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期待的牴觸情緒。由此立場出發，這是一種不會也無法普遍適用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地方的實踐方式——至少短期內是如此；它只適用於一些人，那些人基於他們自己的認識與感受，自願選擇退出，決定過一個不同的生活，去創造由志同道合的冒險家所組成的後資本主義公社，這些人願意在實際作為上、在精神上同舟共濟，但同時也能拓展個人的自我：他們讓生命的計畫變成一

個綻放的生命。這種馬克思主義會從日常生活中獲得滋養，並在基層持續下去，尤其是當公社結交朋友、建立關係，在理論與行動上都步調一致時、當它擴大網絡，強化其核心密度時。很快地，一個公社可能凝聚成另一個公社，並相互交流彼此的知識與勞動，一段時間後，更多人自願選擇退出並加入公社，將彼此的熱情匯聚在一起。

不用多久，曾經是個別的、零散的公社，以更加擴散的模式、更密集的社區形式存在，充滿嶄新且有如萬花筒般的各種可能性：這就是革命進化的方式，革命如何扎根的方式。它不像森林大火的星火燎原，或猛烈強攻任何冬宮，或來自一個以線性路線擴散的火花，這革命不透過必要的「歷史的」邏輯，而是發出共鳴，「暴動更具體，比較像是音樂，即使被驅散於時間與空間中，它的成員一樣能夠以自己的顫動，強迫大家聽到他們的節奏。……要讓回歸原來的正常不再被渴望，或甚至不再能被預想。」(pages 158-159)經過一段時間後，人們開始跳舞，隨著音樂搖擺，這快活的經驗變成了本能，一種超越任何一種語言、甚至話語的世界音樂，無論在身體上或智識上，有些東西被吸收了，也被理解了，它是住在森林裡的瘋狂男女的巨大喧鬧：

「喬治．甘廣，『法國首位馬基團員』，他的游擊生涯是從一九四〇年拒絕被占領受到肯定後展開。在當時，對於共產黨而言，他不過是一個『住在樹林裡的瘋子』——直到這些生活在樹林中的狂人變成了兩萬人，並且解放了利摩日這個地區。」(page 111)

參考書目

Agamben G, 1993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 Hard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MN)

Agamben G, 1999, "Bartleby, or on contingency", i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Ed. G Agamben, translated by D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pp 243 – 271

Agamben G, 2008,"Terrorisme ou tragi-comédie" *Libération* 19 November, http://www.liberation.fr/societe/0101267186-terrorisme-ou-tragi-comedie

Beck G, 2009 *Common Sense* (Threshold Editions, New York)

Blanqui, 1955, "Instruction pour une prise d'armes", in *Blanqui – Textes choisi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pp 214 – 220

Bloch E, 1986 *The Principle of Hope – Volume On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Boltanski L, 2009, "Situationist inheritors", http://tarnac9.wordpress.com/2009/05/12/situationist-inheritors/

Comité invisible, 2007 *L'insurrection qui vient* (Editions La Fabrique, Paris)

Dagen P, 2006 *Arthur Cravan n'est pas mort noyé* (Grasset, Paris)

Debord G, 1970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F Perlman (Black and Red Books, Detroit, MI)

Debord G, 1991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M Imrie (Verso, London)

Debord G, 2006, "Considérations sur l'assassinat de Gérard Lebovici", in *Guy Debord: Öuvres* (Quarto Gallimard, Paris) pp 1539 – 1577

Deleuze G, 1989, "Bartleby, ou la formule", in *Bartleby* Ed. H Melville (Flammarion, Paris)pp 171 – 203

Gorz A, 1982 *Farewell to the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 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Press, London)

Hardt M, Negri A, 2000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Joyce J, 1946 *Ulysses* (Modern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Lefebvre H, 1971 *Vers le cybernanthrope: contra les technocrats* (Denoël, Paris)

Le Monde 2009, "Entretien avec Julien Coupat: la prolongation de ma détention est une petitevengeance", 25 May;

interview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at http://tarnac9.wordpress.com/2009/05/28/interview

Marcos S, 2001 *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Ed. J Ponce de León (Serpent's Tail Books, London)

Márquez G G, 1978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ranslated by G Rabassa (Picador, London)

Marx K, 1955, "Lettre au docteurWatteau", in *Blanqui–Textes choisi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page 25

Marx K, 1968 *Grundrisse, livre 3: chapitre du capital* (Editions Anthropos, Paris)

Marx K, 1975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rogress Books, Moscow)

Melville H, 1990 *Bartleby* (Dove Books, New York)

Merrifield A, 2004, "The provocations of Arthur Cravan" *The Brooklyn Rail* (June), http://www.brooklynrail.org/2004/06/books/

Merrifield A, 2005 *Guy Debord* (Reaktion Books, London)

Merrifield A, forthcoming *Magical Marxism* (Pluto Press, London)

Musil R, 1997 *Man without Qualities* (Picador, London)

Parti imaginaire, 2004 *Théorie du Bloom* (Editions La Fabrique, Paris)

Ponce de León J, 2001, "Editor's note: traveling back to tomorrow", in *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S Marcos, Ed. J Ponce de León (Serpent's Tail Books, London) pp xxiii – xxxii

Rapport de la sous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direction antiterroriste de la direction centrale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auprocureur de Paris, 2008, http://trucadire.com/files/documents/PV-SDAT.pdf

Soja E, 1996 *Thirdspace* (Blackwell, Oxford)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2009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Semiotext(e), Los Angeles, CA)

The NewYorker 2009, "Insurrectionary style", 16 June

The NewYork Times 2009, "Liberating lipsticks and lattes", 18 June

The Observer 2009, "France braced for rebirth of violent Left", 4 January

Toscano A, 2009, "The war against preterrorism: the Tarnac Nine and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Radical Philosophy*

March/April, number 154
Žižek S, 2006 *Parallax View* (MIT Press, Cambridge, MA)